

影响你一生的世界名人·九

最具影响力的  
谋略奇才

(上册)

邢春茹 主编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影响你一生的世界名人/邢春茹主编.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07.3

ISBN 978 - 7 - 80711 - 716 - 2

I. 影... II. 邢... III. 名人 - 列传 - 世界 IV. K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6743 号

---

辽海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北京海德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1960 千字 印张：110

责编：于文海 陈晓玉 2007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定价：396.00 元（全 20 册）

## 前 言

马克思曾经说过：“文学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

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政治以及哲学、宗教和道德等社会科学具有密切的关系，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能深刻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面貌。文学的功能是以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是用具体的、生动感人的细节来反映客观世界的。优秀的文学作品能使人产生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觉，并从思想感情上受到感染、教育和陶冶。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以语言为工具来塑造艺术形象的，虽然其具有形象的间接性，但它能多方面立体性地展示社会生活，甚至表现社会生活的发展过程，展示人与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人物的心里精神世界。

作家是生活造就的，作家又创作了文学。正如高尔基所说：“作家是一支笛子，生活里的种种智慧一通过它就变成音韵和谐的曲调了……作家也是时代精神手中的一支笔，一支由某位圣贤用来撰写艺术史册的笔……”因此，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是社会生活的雕塑师。

文学作品是作家根据一定的立场、观点、社会理想和审美观念，从社会生活中选取一定的材料，经过提炼加工而后创作出来的。它既包含客观的现实生活，也包含作家主观的思想感情，因此，文学作品通过相应的表现形式，具有很强的承载性，这就是作品的具体内容。

文学简史主要指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这跟各国历史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历史的发展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时代背景，而文学的发展也形象地记录了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

总之，学习世界文学，就必须研究世界著名文学大师、著名

文学作品和文学发展历史，才能掌握世界文学概貌。

为此，我们综合了国内外最新的世界文学研究成果和文学发展概况，编撰了“世界文学知识大课堂”丛书。本套书系共计20册，包括《中国文学发展概论》、《中国文学大家》、《中国文学精品》、《世界古代文学发展概论》、《世界古代文学大家》、《世界古代文学精品》、《世界近代文学发展概论》、《世界现代文学发展概论》、《西欧现代文学大家》、《南北欧现代文学大家》、《中欧现代文学大家》、《俄苏现代文学大家》、《美洲现代文学大家》、《亚非现代文学大家》、《西欧现代文学精品》、《东南欧现代文学精品》、《中北欧现代文学精品》、《俄苏现代文学精品》、《美洲现代文学精品》、《亚非现代文学精品》。

本套书系内容全面具体，具有很强的资料性和系统性，是广大读者学习了解世界文学的良好读物，也是广大图书馆珍藏的良好版本。

本书由萧枫同志主编，参加编撰的还有宋涛、张林、李雪、胡元斌、窦俊平、廖海丽、聂丽、寻美琴、李娟、鹿清斌、王德雪、张立立等人，在此对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 目 录

吕 尚 .....	1
所罗门 .....	3
管 仲 .....	5
范 蠡 .....	8
孙 武 .....	11
吴 起 .....	14
亚历山大 .....	19
鬼谷子 .....	22
孙 臆 .....	27
田 单 .....	30
韩非子 .....	34
李 斯 .....	37
汉尼拔 .....	43
萧 何 .....	46
张 良 .....	50
陈 平 .....	53
晁 错 .....	57
周亚夫 .....	59
刘 彻 .....	66
赵充国 .....	69
刘 秀 .....	76
荀 攸 .....	79
吕 蒙 .....	84
诸葛亮 .....	89

## 影响你一生的世界名人

---

查士丁尼一世 .....	96
房玄龄 .....	100
长孙皇后 .....	105
狄仁杰 .....	109
李光弼 .....	116
刘 晏 .....	122
赵 普 .....	126
寇 准 .....	132

## 吕 尚

吕尚，又称吕尚、姜子牙、姜望、太公望、姜太公，是我国古代治国用兵的奇才良将。传说著名的兵书《六韬》即为吕尚所著。

吕尚的远祖曾帮助大禹治水，功绩显著。夏朝时期，姜氏部落在吕地（今河南南阳西）安居，即以封地吕为姓，后来分散。其中一支在东方沿海定居，吕尚即这支姜族后代。吕尚出身贫寒，生活在商末贵族荒淫残暴的时期。吕尚曾在商都朝歌（地名）当过屠夫，杀牛卖肉，又在黄河边的孟津开过酒店。目睹商末官员的贪暴和下层人民困苦悲惨的生活，吕尚的心中播下了匡济天下的种子。他暗下决心，勤奋好学，钻研兵法，经过一番艰苦努力，学到了一身治国用兵的本领。在政治腐败的商朝，出身微贱的吕尚虽有才学却无处发挥。此时，商朝西部的周国，从太公厉当政时代即开始搜罗人才，不论出身，惟贤是用。文王当政以后，更是遍访人才。吕尚闻知，认为施展自己本领的机会到了。于是，年已古稀（70岁）的他背起行囊，跋山涉水，历尽辛苦，从东部来到周国。

吕尚听说周文王经常到渭水边打猎，于是整日在附近的小溪旁钓鱼，盼望着有一天能在这里和周文王恳谈。一天，文王果真带着一行人马来到这里，他发现柳荫下的小溪旁有一位白胡子老头正在钓鱼，很很好奇，就上前和他攀谈起来。吕尚虽是喜在心头，脸上却平静如水，他认真地回答了文王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他们从钓鱼谈到打仗，从家事谈到国事，从政治谈到军事。两人越谈越投机，越谈越兴奋。文王满心喜悦地说：“我父亲太公在世时，就盼望着能有一个像你这样文武精通的人来辅佐周国，今天总算是让我盼到了！”于是，文王亲自扶吕尚上车，一同回到

宫中。因他是太公盼望的贤人，人们尊称他为“太公望”或姜太公。文王封他为国师，负责全国的军政大事。吕尚尽心尽力地辅佐文王：帮助周国灭了许多小国和部落，与文王共商国家军政大计。文王的功绩浸透着吕尚辛劳的汗水。

文王去世，其子武王继位。武王仍重用吕尚，称他为“师尚父”。武王即位第四年，举行了一次八百诸侯会师孟津的演习，吕尚任总指挥。演习声势浩大，振奋人心，众人皆以为可一举灭商，独吕尚和武王认为时机尚未成熟。两年后，武王决定伐商，占卜结果不利。当时正值风雨交加之际，文臣武将认为此时出兵有违天意，吕尚却力劝武王出兵伐纣。武王遂定伐纣，果然一举获胜。战后，武王论功行赏，以吕尚功劳最大，封他到东方营邱（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北）任齐国诸侯。

营邱临东海，荒芜，人少兽多，文化落后。营邱附近的莱人甚至出兵阻击吕尚，被吕尚一举击溃。吕尚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齐国逐渐强盛起来。到了周成王当政时，又授给齐国更多土地。于是，“东至海，西至河（古代，“河”单指黄河），南至穆陵（淮河以南），北至无棣（辽宁西部）”，这片广大的土地，均属吕尚势力管辖。在吕尚的苦心经营下，齐国很快成为东方大国。吕尚此时已一百多岁，终因年迈体力不支，在营邱逝世。

## 所罗门

所罗门，希伯来统一王国的开创者——大卫王的幼子，希伯来国家鼎盛时代的国王。

在历史传说中，所罗门被看成是古代理想的英明君主。在一些文学作品中，所罗门往往是智慧的化身和平的象征。其实这些描述在很大程度上是违背史实的。

在大卫当政的最后两年，所罗门与父亲共同执掌国政。大卫去世后，所罗门杀死了自己的哥哥及其支持者。圣经中把所罗门描述成正直的法官，实际上，他是一个贪图权势、爱慕虚荣的人，只要有谁阻碍他前进，即使是自己的亲人也毫不手软，更不用说其他的政敌了。

所罗门登上王位之后，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了与埃及、腓尼基诸城邦和一些邻国结好的政策。这就保证了对重要商路的控制，有利于商业的发展。他娶了一位埃及的公主为妻，因此得到一座城市作为陪嫁品。他还与其他阿拉伯南部的王国联姻，又得到许多宝石和金子等贵重物品。在与其他国家的友好交往中，所罗门得到了来自非洲和阿拉伯地区的黄金、白银、宝石、象牙、香料和木材等物品。这一切都促进了希伯来工商业的繁荣。

所罗门曾带兵向南部扩张，征服了红海沿岸的一些地区。在北方，他曾入侵过赫梯新王国，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军粮城。

在内政方面，所罗门把国家按地域划分为 12 个行政区，每个行政区有一个总督负责收税。

大约公元前 963 年，所罗门大兴土木，征调了 18 万民工，耗费巨资在首都耶路撒冷的锡安山上，为犹太教徒崇拜的上帝耶和华建造圣殿。经过七年时间，这座圣殿终于建成。它面朝东，由门厅、主殿和圣堂三部分组成。主殿长约 30 米、宽 10 米、高 15

米，四壁和所有设施上都涂了一层厚厚的金粉，这使大殿光彩夺目、金碧辉煌。墙壁上还雕有长着三对翅膀的天使和奇花异草图案，这些图案雕刻得栩栩如生。装有犹太教的象征——圣经的柜子，被安放到幽暗而神秘的圣堂深处。每逢传统的宗教节日，各地的犹太教徒纷纷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朝拜。圣殿的建成还轰动了周边各国，各邻国的朝拜者络绎不绝，这就扩大了希伯来神教的传播，同时也对希伯来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后来圣殿虽然两次遭焚毁，犹太人也被迫背井离乡，但是犹太教却成了维系民族生存的纽带。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耶路撒冷的圣殿遗址始终是漂泊四方的犹太人心中圣地。

所罗门以其广泛的建筑活动著称。在他统治时期，除了修建圣殿之外，还为妃子们建筑了很多豪华的宫殿。外表的繁华，使所罗门的王国看起来繁荣昌盛，但是，这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内部的危机。从居民成分看，国家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土地肥沃，经济发达，为以色列人所占据。南部经济落后，是犹太人聚集所在。由于所罗门的父亲大卫的王朝在南部，政治上处于优势地位，所以沉重的赋税大多落在北部以色列人身上，这自然引起以色列人的强烈不满。另外，邻国埃及也不愿自己身边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存在，所以他们支持以色列人的分裂活动，这使国内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所罗门统治末期，北方出现了以耶波罗安为首的分裂活动。所罗门非常恐慌，他下令捉拿耶波罗安并企图处死他，但是没能成功。耶波罗安逃到了埃及被保护起来。等所罗门一死，他立即回国起兵，从此统一的希伯来国家一分为二：南方由大卫王朝继续统治，称犹太；北方则称以色列。

所罗门的政绩虽然不多，但是一提到耶路撒冷的圣殿，人们多数会想起所罗门的名字。文学作品和传说中的所罗门是神奇而伟大的。无论历史中的所罗门是什么样子，善良的人们都愿意相信传说中的所罗门是真实的。

## 管 仲

管仲名夷吾，仲是他的字。颍上（今安徽西北部）人。春秋初年的大政治家。现存《管子》八十六篇，有些为后人假托。

管仲和鲍叔牙幼年时代就是好朋友。后来，管仲去辅佐公子纠，鲍叔牙则去辅佐齐国公子小白，即齐桓公。小白继承君位后，鲍叔牙立即向他举荐管仲执掌国政。齐桓公不仅不计私仇，还对管仲格外尊重。相传当管仲从鲁国来到齐国时，桓公沐浴三次，并三洒香水，亲自去城外迎接。管仲感慨万分，他说：“开初我仕途不得志时，曾和鲍叔牙合伙经商。每次分利时，我都多取一些，鲍叔牙并不认为我这是贪婪，因为他知道我家里贫困。我也曾为鲍叔牙出主意，但都失策了，可他并不认为我愚蠢，他知道那是时机不利。我也曾几次仕于君主，但都被主人摒弃了，可鲍叔牙不认为是我不贤，而是我没遇到明主。我几次上阵作战，都避死而逃，鲍叔牙并不认为我胆怯，他知道我家有老母需要奉养。我的主人公子纠被杀，公子的大臣都自杀了，可是我宁肯受囚被辱不肯死节，鲍叔牙并不认为我无耻辱之心，他知道我不耻于小节而耻于不能建功名于天下。真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牙呀！”于是，真心诚意地担任了齐桓公授予的职务，尽心尽力，夙兴夜寐。

管仲认为：“仓廩（lǎn）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所以改革必须先着眼于经济方面，同时，也相应地注意到政治和军事。管仲对农业税制的改革实行“相地而衰征”的分配形式。从而废除了集体无偿耕种“公田”的劳役税制，改为所有土地一律按土质好坏、面积大小，征收不同等级的实物税。“相地而衰征”首先是分“公田”为“份地”，改集体耕作为个体生产。通过“均地分力”，农民就可知道产量的多少直接关系到自己家庭生活

的好坏，才能不怕劳苦，自觉地劳动。管仲还提倡“本末并重”，即将工商与农业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因地制宜地实行多种经营，使得鱼盐、山林、川泽之利大兴。他也很重视工农技术的发展，实行各类人员专业化。管仲认为物质条件是一切社会生活的基础，人们努力去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是社会的普遍现象。“夫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远千里而不怨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波逆流，乘威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止；深渊之下，无所不如焉。”这些思想对后世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在政治方面，管仲令士、农、工、商四种人分区居住。把全国分为二十一乡，其中工三乡、商三乡、士农合占十五乡。工商专心于本业，不服兵役。士农乡平时“食田”、耕田；一有战事，士则充当甲士或小军官，农则为兵卒。士农乡中以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各级行政机构都有负责人。战时，各级行政负责人又成为军官。每户出一壮丁，每五丁为一伍，每五十丁为一小戎。每二百丁称为一卒，每二千丁称为一旅。全国十五乡即为十五旅，每五旅合为一军，全国共有三个军。齐王与两大贵族各率一军。从上述情景不难看出，齐国的行政组织实际上是兵民合一的组织。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军事防卫，国家都拥有坚固的内部结构。

在官员管理上，管仲命令各人恪守职责，不准懈怠。若有违军令不尽责者，可一可二，再三必定严惩。还令各级官吏随时举荐贤才，否则就是“蔽明”、“蔽贤”，也要治罪。经过改革，几年之后，齐国成为了当时最富强的国家。

管仲为齐桓公制定的政治方针是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征讨不服，平恤患难，以武力和德望称霸天下。一次，桓公因蔡姬之事欲出兵伐蔡。管仲见劝阻无效，便建议桓公先以楚已三年未向天子纳贡为由伐楚。获胜归来，再以蔡国不参加伐楚为由出兵。齐桓公听之，亲率诸侯联合伐楚，迫使楚与各诸侯签订盟约，诸侯皆服。

## 最具影响力的谋略奇才

---

从公元前 685 年到公元前 645 年，在管仲执政的 40 年间，他一直秉承谦恭的态度，并屡次约束桓公要不骄不躁，出师有名，亲贤者远小人，为齐国称霸立下了汗马功劳。

## 范 蠡

范蠡是一位具有浓厚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一生大起大落，由布衣客到上将军，由流亡者到大富翁，以其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深谋远虑的策略，辅佐勾践兴复濒于灭亡的越国，灭亡称霸诸侯的吴国，创造扶危定倾的奇迹，是春秋末期又一位杰出的谋略家。

范蠡，字少伯，又名鸱夷子皮、陶朱公。原为楚宛三户（今安徽宣城）人，先后移居越、齐二国。生卒年月不详，大约活动于楚平王、越王勾践、齐平公在位的年代（公元前五世纪后期至公元前四世纪前期）。青少年时代就失去父母，同兄嫂一起过着贫苦的生活。他曾经拜计然（又名辛文子）为师，研习治国治军的方策，博学多才，“有圣贤之明”，但是怀才不遇。因而“倜傥负俗”，行为怪异，被视为狂人。直到遇见具有识才之明的文种，范蠡的生活才发生突然转变。

文种当时是楚国宛陵的地方官，早就听说当地有贤者，但未能找到。范蠡的怪异行为引起了文种的注意。文种派手下官吏去见范蠡。官吏回报说，他患有疯癫病，是一个狂人。文种不以为然地一笑，说：“吾闻士有贤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讥；内怀独见之明，外有不智之毁。此固非二三子所知也。”就是说，“大智若愚”，具有独特才能的人才往往被人讥笑、诋毁为狂妄无知，一般人难以认识他的真实面目。于是决定亲自驱车拜访。范蠡避而不见。文种不因碰壁而灰心，再三前去拜访。范蠡看到文种确是一片诚心，料定文种必然再来，就对他的兄嫂说：“今天有客人来，请借给衣帽一用。”过了一会儿，文种果然来了。二人一见如故，“终日而语，疾陈霸王之道”，“志合意同”。此后交往日益加深。当时已出逃吴国的伍员（伍子胥）派人邀文种去吴国。文

种与范蠡商量何去何从。范蠡分析楚、吴、越三国形势，认为当时正处于吴越争雄之时，吴越之间矛盾日益激化，楚越之间存在着联兵伐吴的关系，“霸业创立，非吴即越”。他还认为，“君子逢时，不入讎邦”，犯不着为伍子胥报杀父之仇而“失故国之亲”。因此，他建议去越国，并表示愿意和文种一起去。于是，二人先后离楚入越，受到越王允常重用，被任命为大夫。范蠡从此登上政治、军事舞台。

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病亡，他的儿子勾践继位。范蠡和文种继续得到重用，主持越国军政。公元前494年，勾践得知吴国加紧练兵，准备伐越，决定先发制人，出兵攻吴。范蠡认为越国实力不充足，准备不充分，时机不成熟，劝勾践改变决定。勾践不听，坚持出兵，以舟师进攻吴国的震泽（今江苏太湖）。吴军迎战越军于夫椒（今太湖夫山、椒山）。结果，越军大败。勾践率残余越军退守会稽山，被吴军团团包围。这时，勾践方才悔悟，对范蠡说：“当初不听你的话，致遭如此失败。现在该怎么办？”范蠡认为，为了避免亡军亡国的结局，唯一的办法是求和图存，等待时机，另谋兴复。勾践采纳了范蠡的方策，派文种到吴国求和。经过多方努力，始得吴王夫差允许。自此以后，范蠡先是随勾践到吴国当人质，过了三年忍辱负重的奴仆生活。被遣返回国以后，又协助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振兴越国，伺机灭吴。从公元前482年开始，范蠡以上将军之职，辅佐勾践组织和指挥灭吴之战。经过六年奋战，终于攻陷姑苏，灭亡吴国。然后乘胜北进，与中原诸侯会盟，取代吴国的霸主地位，横行江淮，称霸中原，国势达到鼎盛阶段。

在欢庆胜利的时刻，范蠡采取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行动。根据长期的观察体验，范蠡认识到，“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如果继续留在越国，说不定哪一天就要灾难临头。于是决定辞官退隐。当越军凯旋到达五湖（今太湖）时，范蠡就婉言提出辞退的要求，说：“为人臣者，君忧臣劳，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会稽，臣所以不死者，为此事（指灭吴称霸）也。今事已济矣，蠡请从会稽之罚。”（《国语·

越语》) 勾践假意挽留, 软硬兼施, 说: “你听我的话, 我就与你分国而治; 不听我的话, 就杀掉你和你的妻子儿女!” 范蠡的态度也强硬起来, 说: “我知道了。你实行你的命令, 我照我的意志办事!” 遂携带财宝和从人“乘舟浮海以行”。勾践乐得除去一个潜在威胁, 并不追寻, 同时又划会稽周围三百里为范蠡俸邑, 用良金铸造范蠡塑像, 装出怀念功臣的样子。范蠡写信给文种, 劝他早日离开越国。信中说: “飞鸟尽, 良弓藏。狡兔死, 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 可与其共患难, 不可与共安乐。子何不去?” 文种见信, 称病不朝。有人诬告文种将要“作乱”。勾践借机“赐剑”文种, 说: “子教寡人伐吴七术, 寡人用其三而败吴, 其四在子, 子为我为先王试之!” 文种遂被迫自尽。越国赖以兴复的两大功臣, 就这样落了一走一死的下场。

范蠡从海上到达齐国, 就定居在那里。为了表示对吴国忠臣伍子胥的敬慕和怀念, 改名鸱夷子皮。(鸱夷是一种鸱鸟形状的革囊。伍子胥被迫自杀后, 被吴王夫差装进革囊, 投入江中。) 他和儿子“耕于海畔”, 没过多久就“致产数千万”。齐国君认为范蠡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要任命他为相。范蠡认为这并非好事, 喟然兴叹: “居家则致千金, 居官则致卿相, 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于是, 把相印归还齐君, 把财产散发给友邻, 移居于中原地区的交通、贸易枢纽陶(今山东定陶), 自称陶朱公。在这里度过了他一生的最后岁月。他一面从事农牧业生产, 一面经营商业贸易, 不久又“资累巨万”, 成为闻名遐迩的大富翁。

范蠡从楚到越, 由越到齐, 无论是治国治军, 还是经营农商, 谋必中, 战必胜, 事必成, 表现了非凡的毅力和才能, 以“勇而善谋”、“能屈能伸”著称于世。所以,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 “范蠡三徙, 成名于天下”。(以上引语, 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灭吴兴越之战, 是一场扶危定倾、转败为胜的战争, 因而也是一场依靠坚强毅力和正确谋略取胜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 作为主要决策者和指挥者之一的范蠡, “勇而善谋”, “苦身戮力, 与勾践深谋二十余年”, 对取得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决定性贡献。

## 孙 武

孙武（生卒年月不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人。后在吴国任职将军，著有兵法十三篇，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最伟大的军事理论家。

孙武原是陈国公子完的后裔。陈宣公时国内发生内乱，陈完逃奔齐国，被齐桓公用为“工正（管理手工业生产之官）”，后改姓田氏。田完四世孙田桓子，任齐国大夫，他以新的封建剥削方式与齐公室争夺劳动力，据说民众“归之如流水”，成为齐国新兴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田完五世孙田书，是孙武的祖父。因“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山东博兴）”，所以其后人改姓为孙。这样的家族，对孙武进步军事思想的形成，有一定影响；齐国又是政治、经济、文化都较发达和军事理论人才荟萃的国家，这对孙武研究军事，也提供了方便的条件。齐景公十六年（公元前532年），齐国发生“四姓之乱”，田、鲍两姓与栾、高两姓贵族，为争权而相互攻战，孙武出奔吴国。吴王阖闾即位后，吴行人（主宾礼大臣）伍子胥推荐孙武与阖闾，献兵法十三篇。“每陈一篇，王不知口之称善，其意大悦”。因而被任为将军，与伍子胥共同辅佐阖闾，整军经武，备战图霸。

吴王阖闾三年（公元前512年），阖闾准备大举攻楚，孙武认为“民劳，未可，待之”。遂用伍子胥“三师肆楚”，俟其“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的方针，组织三支部队，轮流袭扰楚国。阖闾四年（公元前511年），孙武与伍子胥率军攻楚边邑，“拔六（安徽六安北）与潜（安徽霍山东北）二邑”。七年（公元前508年），楚军攻吴，孙武等率军反击，在豫章（大别山东、巢湖西、淮南江北一带）大破楚军，并攻占楚国巢邑（安徽桐城、安庆间），俘楚大夫公子繁。九年（公元前506年），楚攻蔡国（河南

新蔡)，蔡求救于吴。孙武认为这是攻楚良机，遂建议与蔡、唐（湖北随县西）联盟，尔后即佐阖闾率军大举攻楚。吴军沿淮水西进，至淮油（蔡国附近淮水湾曲处）弃舟登岸，深入至汉水地区，大破楚军于柏举（湖北麻城东，一说汉川北），又乘胜追击，连战连胜，攻占了楚都郢（湖北江陵西北），创造了春秋时期千里进军，攻占大国首都的战例。后至吴王夫差十二年（公元前484年），吴军大败齐军于艾陵时，孙武可能仍任将军，所以《史记》说吴国“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可见孙武不仅在军事理论上有着辉煌的成就，而且有近三十年的军旅生活和战争实践，确实是我国历史上的伟大军事家。艾陵战后，孙武的好友伍子胥被夫差所杀，孙武的结局也不得而知。据《越绝书》记载，他的坟墓在今江苏吴县东门外。

孙武所著《孙子兵法》十三篇，是我国，也是世界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军事理论名著。它比色诺芬（公元前403年～前355年）的、被欧洲公认为是古希腊第一部军事理论专著的《远征记》，不仅成书早，而且学术性强。它的内容几乎涉及到军事理论中的各个分支学科；而且贯穿着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它是孙武在总结商、周，特别是春秋以来数百次战争经验的基础上写出的，对我国军事理论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茅元仪曾评价说：“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这虽有溢美之嫌，但它确实说出了《孙子兵法》在几千年封建社会军事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其实，它的一些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不仅在封建社会，就是在现代，也仍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和指导意义；在中国，以至在世界军事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和享有崇高声誉。

早在唐朝武则天执政时期，日本留学人员吉备真备就将《孙子兵法》带回日本讲授。法国于1772年，由约瑟夫·阿米欧在巴黎翻译出版。以后英、德、俄等国也相继翻译，世界各大国均有译本流行。苏联军事家米里斯坦因评价说：“在这本著作中，孙子总结了当时中国奴隶主所进行的战争的丰富实践，奠定了古代中国军事科学的基础。日本现代军事评论家小山内宏说：“《孙

子》的确是一部东方产生的，可以夸耀于世界的有关战略的书。……就其内容来看，同现代西欧战略论相比，也毫不逊色。……《孙子》不仅是一部战略论，还是一部具有深刻涵义战争哲学，甚至对现代战略战术也有极大的启示。”美国军事理论家、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约翰·柯林斯说：“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孙子》十三篇可与历代名著、包括二千二百年后的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媲美。今天没有一个人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他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的当前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重大的意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诺曼底登陆战中担任盟军集群司令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在六十年代访问中国时，曾提出世界上所有军事学院，都应把《孙子兵法》列为必修课程的主张。美国国防大学，就已把《孙子兵法》中的主要内容，作为战略学的教材。由此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 吴起

吴起（约公元前440年～前381年），卫国左氏（山东定陶西）人。曾任鲁国将军、魏国西河郡守及楚国令尹。著有《吴起兵法》。他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军事将领和军事理论家，与孙武齐名。史称“吴有孙武、齐有孙臆，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擒）敌立胜，垂著篇籍”。郭沫若也誉他为“在中国历史上是永不会磨灭的人物”。

吴起出身于没有政治特权的“千金”之家，青年时即怀有在政治上飞黄腾达的强烈愿望，曾破家游仕，但未能达到目的。不仅家资耗尽，且遭乡邻耻笑。二十五岁时离家求学，并向母发誓，不为卿相，决不返家。先就学于曾申，攻读儒学。后因他敢于冲破儒家思想的束缚，不奔母丧，被曾申断绝了师生关系。当时各国之间战争频繁，极需军事人才。吴起遂适应形势要求，改学兵法。在齐国攻鲁时，鲁穆公姬显用吴起为将，命其率军抵御。他大破齐军，初露头角。但战功并未给他带来荣誉与地位，反而遭到贵族们的疑忌与排斥。他们散布流言，说任用吴起，对鲁不利。姬显听信谗言，将吴起辞退，吴起于是离鲁去魏。

魏国当时正进行变法革新运动。魏文侯魏斯（一说名都）曾向臣下了解吴起的为人。大夫李克说：“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魏斯是新兴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在人才思想上认为不应以“小恶掩其大美”。吴起既有杰出的军事才干，就可用其所长，遂以吴起为将，命其率军攻秦，经过大约两年的时间，陆续攻占了临晋（陕西大荔东南）、元里（陕西澄城南）、洛阴（陕西大荔西南）、郃阳（陕西合阳东南）等地。秦军退守洛水，黄河以西至洛水的大部地区，为魏所有。据说以后还曾参加了超越赵国攻灭中山的战争，建立了巨大的战功。

由于吴起善于用兵，战功显著，又深得士心，在相国翟璜推荐下，魏斯任命吴起为西河郡（吴起攻占的黄河以西地区）守（军政长官）。西河是与秦国接壤的军事要地，南北狭长而东西纵深甚小，易受秦攻而难于固守，背后又阻于黄河，一旦发生战争，很难及时得到支援，必须独立作战。所以魏斯才在此建郡，并任命吴起为军政长官。

吴起治军以身作则，“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野营时，他仅以树枝遮顶，稍避霜露，不搞特殊。据说卒有生疮者，他为其吮脓，卒母得知后大哭。人问其故，她说：“往年我丈夫生疮，吴公曾为其吸脓，不久即英勇战死，今吴公又为我儿吸脓，不知他将死何处！”这段故事，颇具传奇色彩，但不论细节是否属实，吴起带兵能“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因而深得军心，则是可以肯定的。吴起“爱兵”，是他治军的一个侧面；另一侧面，则是严刑峻法。据说在一次对秦作战中，一卒未奉命令就奋勇进击，斩获敌首两级而还，吴起不仅不赏，反而命立即斩首。军法吏劝谏说：“此材士也，不可斩”。吴起说：材士不假，但不遵守我的命令，就必须处死。吴起的“爱兵”和“严法”，其目的都是要士卒“感恩”和“服威”，以为他卖命。

吴起在魏国创建了我国最早的、从应征人员选募常备军的兵役制度，为魏国建立了一支勇敢善战、体质强壮、行军速度及耐力都极好的“武卒”部队。成员全部经过严格的选拔考试，合格的标准是：全副甲胄，携带戈、剑、弩、矢和三日口粮，由拂晓至中午，必须行军百里。录取后按各人特长进行编组，将具有善使兵器、善于疾走、勇于冲锋等特点的人，各编一队。凡入选士卒，享受特殊待遇，不但免去全家赋税，而且另行分配土地房屋。这是我国军事史上，第一支具有职业化和专业化性质的军队。

吴起在西河期间，为了令出必行，曾采用了故意示信给赏的手段。据史载：秦军在与魏接壤处建一哨所（亭），吴起欲将其拔掉，但又恐强攻不下反对附近农民耕种造成危害，而小小哨所，又不便征集军队，遂派人置一车辕于北门外，下令说：“有

能徙此南门之外者，赏之上田上宅”。有人照办，吴起立即按令给赏。又置一石柱于东门外，下令“有能徙此于西门之外者赏如初（如上次）”。群众争先搬取。吴起认为士心已可用，遂下令“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国大夫，赐上田宅”。至进攻时，人人争先，“于是攻亭一朝而拔之”。据《吴子兵法》说，吴起在魏，“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胜负不分），辟土四面，拓地千里”。这可能有所夸大。但《史记》所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向”，则为事实。总之，吴起镇守西河郡时，确曾出色地完成了魏斯所赋予他的战守任务，建立了辉煌的战绩，证明他是一位非常卓越的军事将领。他的军事理论，也主要是在魏国的长期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魏文侯五十年（公元前396年），魏斯病死，武侯魏击继位。一次吴起随魏击乘船沿黄河视察，魏击说：有如此险要的山河，国家焉得不强。大夫王错随口附和，说这是国家强盛的原因，“若善修之，则霸王之业具矣”。吴起斥责王错不应阿谀奉承，说“山河之险，信不足保也，是霸王之业，不从此也”。接着又用三苗、夏桀和商纣虽有山河之险，但因“为政不善”，终于为大禹、商汤和周武王所灭的事例，说明他们“城非不高也，人民非不众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恶故也”。强调国家强弱“在德（好的政治）不在险，若君不修德则舟中之人皆敌国也”。吴起这段话，反映了他对战争的基本看法。他认为战争是“禁暴救乱”的手段，用以消灭桀纣那样的暴君乱政，并认为战争的胜败，在于为政的善恶（即战争的正义性与政治条件）。这比孙武“兵者国之大事”，“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的战争观，又前进了一步。

正当吴起在西河力图向外发展时，又遭到朝中贵族们的忌恨与反对。以王错为代表的一些大臣，终日在魏王面前诽谤吴起，终于使魏王产生怀疑，下令召吴起返朝，免去西河守职。吴起回魏都后，魏相公叔与王错等设谋陷害，吴起在为魏的强大尽心竭力地工作了二十多年后，为避祸，不得不逃至楚国。此时大约五十七岁。

楚悼王熊类久闻吴起才名，又正值谋求改革图强之际，遂任

命吴起为北部边防要地苑（河南南阳）守。一年后，又升为楚国最高军政长官的令尹，辅佐熊类进行政治、军事改革。吴起改革的中心，是从政治、经济上打击、限制旧贵族势力，加强军队建设，“砥砺甲兵，时争利于天下”。其具体措施，主要有四：其一，针对“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上佰（逼）主而下虐民”，以致“贫国弱兵”的弊病，“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其二，针对楚国地广人稀的特点，变相收回旧贵族现有土地，强迫他们率其所属“往实广虚之地（迁至未垦地区）”。其三，“绝灭百官之禄秩，捐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即裁减官吏，减少俸禄开支，用以建设军队。其四，取缔贵族招引、畜养食客，结党营私，制造反对改革的舆论，使全国思想、舆论统一于改革。在熊类支持下，吴起“罢无能，废无用，捐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将节约的大量财力、物力，用于建立一支“战斗之士”、“选练之士”的精锐常备军队。经过吴起的变法革新，楚国很快强盛起来，“南收扬越，北并陈蔡……兵震天下，威服诸侯”，不但击退了魏、赵、韩的进攻，而且于楚悼王二十一年（公元前381年），救赵攻魏，“战于州（河南温县东北）西，出于梁门，军舍林中（河南尉氏西），马饮于大河”，深入到黄河以北的地区。

正当吴起意气风发地为楚国的强大而积极经略之际，全力支持他的楚悼王熊类突然病死。因丧失特权和损害了既得利益的旧贵族们，乘机作乱，向进宫治丧的吴起发动袭击。吴起仓促遇变，自知不免，遂一面大呼“群臣乱王”，一面伏身王尸。贵族们箭射吴起，也射中了王尸。楚国法律有“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的规定。楚肃王熊臧即位后，依法“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结果“夷宗死者七十余家”。战国末期人称赞说：“吴起之智，可谓捷矣”。但吴起的尸体，也终被车裂肢解，吴起死时约六十岁，在楚共约四年。

吴起一生为鲁、魏、楚三国建立了巨大的功勋，但由于他是一个站在变法前列的改革者，所以在三国都遭到旧贵族的强烈反对和迫害，并终于为此而丧生。这正是社会大变革的战国前期，

新旧两种势力相互斗争的反映。吴起虽然“身败”而死，但并未因此“名裂”。他在政治、军事上的业绩，一直为后人所景仰。例如他离开魏国后，公孙痤为魏将，统率吴起训练的部队击败韩、赵联军。魏击欲“赏田百万禄之”，公孙痤推辞说：“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挠撓而不辟者，此吴起余教也，臣不能为也”。后人称赞吴起统率和训练的军队团结巩固、纪律严明，说：“食人炊骨，士无反北之心，是孙臆、吴起之兵也”。称赞他指挥艺术卓越，说：“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此外，他的军事理论名著《吴起兵法》，也和《孙子兵法》一样为历代军事家们所推崇。早在战国末期，就已是“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西汉前期，也是“吴起兵法世多有”；汉武帝刘彻对霍去病就“尝欲教之孙、吴兵法”；东汉尚书仆射大将军鲍永，也曾“观孙、吴之策”；南北朝时前汉第一、二代皇帝刘渊和刘聪，都是自幼即诵孙、吴兵法；至宋代，更被编入《武经七书》，定为国家武学（军官学校）必读教材。在国外也有广泛的影响。日本奈良时代（约公元前750年前后）太宰大貳（官职）吉备真备，曾开课讲解《孙子》和《吴子》兵法，并运用书中原则，指挥军队，迅速消灭了惠美押胜的叛军，因而升为中卫大将。在近代，英、法、俄、德等国，都有《吴子兵法》的译本。

## 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公元前 356 ~ 公元前 323），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马其顿军事统帅、国王、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自幼受到严格的宫廷教育，思想敏锐，才智出众。他酷爱兵法，很小就跟随父亲四处征战。公元前 336 年，其父腓力二世遇刺身亡，他年仅 20 岁便继承王位。继位后，他以严厉手段平定宫廷内乱，从事军事改革，发展了古希腊的方阵战术，创建了既能乘马又能徒步作战的“龙骑兵”；对外，他继续其父的扩张行动，大规模地对亚洲、北非进行侵略性远征，史称“亚历山大东征”。以马其顿军队为核心，他于公元前 334 年率领着庞大的海陆军发动东征，对实力强大的波斯军队实行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先后取得伊苏斯战役、高加米拉战役的胜利，攻占了埃及、巴比伦、波斯、米底等国的大片土地，创建了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公元前 330 年，他又马不停蹄地沿着里海南岸继续东进中亚，途经安息、大夏和粟特，直到印度河上游的旁遮普地区才班师。公元前 324 年春，这位征战多年的大军统帅终于回到巴比伦。但这时他的病情已相当严重，于次年 6 月病死。他死后，他用武力建立起来的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很快分裂瓦解。

公元前 336 年，腓力二世遇刺身亡，亚历山大继位，时年 20 岁。因腓力二世猝死，宫廷骚乱，北方部落起义，希腊反马其顿派领袖乘机重新组织反马其顿同盟，意欲将年轻的亚历山大政权扼杀在摇篮中。马其顿王国内忧外患，形势十分严峻。亚历山大果断地采取行动，迅速予以还击。在希腊同盟还未组织起来时，他已兵临希腊，犹如从天而降。他效仿腓力二世当年的做法，在科林斯召开全希腊大会，名正言顺地成为马其顿、希腊联军的最高统帅。

对希腊的制服，是亚历山大所采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措施，也是他东征能够取得胜利的可信保证。公元前 334 年春，他以马其顿、希腊联军最高统帅的身份，巧妙地利用希腊人的力量，组织起强大的东征军，以波斯人曾蹂躏过希腊圣地，参与谋杀腓力二世为借口，向波斯帝国宣战，大规模的对亚洲、北非的侵略性远征由此拉开战幕。

亚历山大率军渡过赫勒斯滂海峡，进入亚洲，在马尔马拉海南岸的格拉尼科斯河附近与波斯军队首次交锋。波斯大军在河流的右岸高地上严阵以待，以逸待劳，占地利之势，而马其顿军长途跋涉，疲惫不堪。亚历山大为鼓舞士气，亲自率领一支骁勇善战的骑兵，强行渡河，迅猛进攻。波斯军队死伤累累，很快败北。亚历山大首战告捷，打开了向小亚细亚进军的道路。此后，在小亚细亚他没有遇到大规模的抵抗。

公元前 333 年秋，亚历山大在叙利亚的伊苏斯附近与波斯军队发生了第一次激战。亚历山大以重装方阵和重装骑兵迅猛异常地向波斯中军发起进攻。双方激战正酣，大流士三世首先动摇，弃阵而逃。波斯大军随即崩溃。

公元前 332 年春，亚历山大继续向南推进。许多腓尼基城市不战自降。对被征服地区，亚历山大采用恩威并施、宽猛相济的政策。攻下腓尼基各地不久，他就率军进入埃及。他利用波斯统治下人民的不满情绪，以解放者自居，同时，审时度势，随机应变。他特别注意拉拢埃及的祭祀阶级，因为他深知，埃及的阿蒙祭祀集团在埃及政治上居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经济实力雄厚，在民众中影响较大。因而慷慨馈赠，甚至在沙漠中艰难跋涉，饱受煎熬，亲自去西瓦绿洲祭祀阿蒙神庙。因而，亚历山大得到了埃及祭祀集团的支持，被宣布为阿蒙神之子，从而成为埃及法老的合法继承人。

公元前 331 年春，亚历山大由埃及出发，经巴勒斯坦、叙利亚，侵入美索不达米亚。在尼尼微附近的高加美拉村外与波斯军队进行了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命运的大战。

高加美拉一役，亚历山大消灭了波斯的有生力量。之后，亚

亚历山大几乎未遇抵抗占领了波斯行都巴比伦、波斯首都苏撒和波斯古都波斯波利斯，进行了惊人的掳掠和洗劫。不久，亚历山大追踪大流士到帕提亚和巴克特里亚，大流士三世已被杀。亚历山大追擒大流士三世的当地总督比索斯，以其背叛君主罪处以死刑。波斯的阿黑门尼德王朝遂亡，亚历山大取代了波斯帝国的统治。

其后，亚历山大进军中亚，虽遭中亚人民抵抗，但仍占领了中亚的一些地方。公元前 327 年，亚历山大又进军印度，利用印度诸国的矛盾，占领了印度河流域的一些国家。他还企图征服恒河流域，但因士兵厌战和畏怯印度摩羯陀国的强大，被迫退兵，公元前 325 年回到巴比伦城。历时 10 年的东征就此结束。经过大规模的军事征服，亚历山大建立起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帝国。它的版图西起希腊、马其顿，东到印度河流域，南临尼罗河第一瀑布，北至药杀水，首都巴比伦。

亚历山大是著名的军事统帅，可以说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发动的侵略战争虽给欧、亚、非人民带来了很大的不幸，但在客观上，东征为东西方文化、政治和经济交流创造了条件。在帝国广阔的领域中，西亚、中亚、埃及甚至印度等地的各民族与希腊各城邦间的经济、贸易、文化的联系普遍加强，其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富都是前无古人的。

## 鬼谷子

鬼谷子是个很神秘的人物，战国中期的纵横家鼻祖，有说是齐国人，也有说是楚国人，也有说根本无此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传统说法姓王，名之利，也有说姓刘名务滋。隐居于颍川（今河南禹县）阳城（今河南省登封县东南告成镇）的鬼谷，因自号“鬼谷子”。

最早记述鬼谷子的是司马迁。据《史记·苏秦列传》和《史记·张仪列传》载：苏秦者，东周雒阳人也，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张仪者，魏人也。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太平御览·礼仪部》载，“周有豪士，居鬼谷，号为鬼谷先生。”苏秦、张仪去见他，他说：“我将为你们两个讲述最精深的道家。”于是，二位沐浴更衣，不食荤酒，整洁口身，斋戒已毕，去见鬼谷子，鬼谷子向他们讲述了《捭阖》、《符言》等篇。王嘉《拾遗记》载，苏秦、张仪未发迹前，穷困潦倒，但却勤学不辍。他们在途中看到圣人之文，便将文章抄在手掌中及大腿上，晚上回到家再折竹为笔，将掌股中之文录于帛上。搜罗好书，无物可盛，便剥下树皮制成书囊。一天，一位先生出现在苏秦与张仪面前，询问他们为什么如此勤苦学习，苏秦、张仪反问：“你是何人？”这位先生回答：“我居住在山谷中，人们称我为鬼谷子。”后来，苏秦、张仪游说四方，再次遇到鬼谷子，并向他求教，鬼谷子从怀中掏出三卷书，教他们权诈之术，苏秦、张仪自此持鬼谷子之学终身。这位鬼谷子就是司马迁笔下的鬼谷先生。东汉王充《论衡》载，苏秦、张仪跟鬼谷子先生学了一段后，有一天，鬼谷子在地下挖了一个坑，说：“下到里边去，什么时候道理说得我涕泣沾襟，你们到各国去游说国君，就能成就功名。”苏秦、张仪果然下到坑中，充满感情地向鬼谷子讲述纵横捭阖、争霸天

下的道理，说得鬼谷子涕泣沾襟。苏秦、张仪得鬼谷子真言，果然成为战国著名的纵横家，成就了功名。

后来，二人又去见他，他正席地而坐，表情严肃地说：“我告诉你们两个保全启身的道法。”苏秦说六国合纵，最后被反间致死。苏秦、张仪同师鬼谷子，但苏秦自己说本事不如张仪。张仪自己也说过自己的权谋不及苏秦。张仪在游说各国时，力陈苏秦合纵谋略的短处，以证明自己的连横谋略的正确，战国历史证明，最终是连横谋略取得了成功。在中国民间，也有传说鬼谷子是大军事家孙臆的老师。《尚友录》载，孙臆和庞涓同学兵法于鬼谷。正因鬼谷更赏识孙臆，把一部天书传给了孙臆，引起庞涓忌恨，才发生了一系列动人心魄的历史故事。

有一个人叫来鹄（不知何时人）说：“鬼谷子教给人诡秘欺诈，言语便捷，富于鼓动性，发人阴私，奸邪刁滑，六国时期真正掌握此术的，只有张仪、苏秦而已。”例如《捭阖》、《飞箝》，捭阖是分化或拉拢之术，飞箝是揣摩人之好恶，待其竭情无隐，加以箝持之术。现实社会中的一些现象，是鬼谷子之术潜移默化，自然流传而形成的。

鬼谷子说：“人之不善而能矫之者，难矣。说之不行，言之不从者，其辩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辩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自而分，能入乎人之心，如此而说之不行者，天下未尝闻也。”刘向说，这是善于说辩的具体方法。

《鬼谷子》一书，虽然在《史记》、《说苑》等书中被引用，但直到《隋书·经籍志》，才把《鬼谷子》录于目录。因而，有的学者认为它是苏秦假鬼谷之名而作，也有学者认为是后人伪书，但也有坚信《鬼谷子》绝非伪托的学者，千百年来，莫衷一说。虽然如此，《鬼谷子》一书自魏晋以来广为流传却是谁也不否认的事实。

而《鬼谷子》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是与鬼谷子的“奇变诡伟”的谋略分不开的。不管鬼谷子是传说人物；还是实有其人，他都是一个古代谋略家。

立身御世，远害就利。从一定意义上讲，人类的行为都是为了远害就利，因而，远害就利是人类谋略的基本特征。《鬼谷子》告诉人们如何运用谋略，在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如何进行政治统治，以远害就利。《鬼谷子》认为，一种小小的缝隙，它会发展形成较大的漏洞，再进一步发展，就可形成为大缝隙。鬼谷子以此引申为政治斗争中的防患于未然。这是他关于在变幻不定的政治风云中，进行有效统治的重要思想。他说，始有征兆，可抵而塞，可抵而隙，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就是说，在缝隙刚要出现的时候，一定会有某种迹象，缝隙一出现，就要严严实实地把它堵塞，这刚出现的缝隙被阻住，使其发展蔓延的势头减弱并最终让它销声匿迹，经过这一番努力，缝隙被堵，隐患消除。这是堵塞缝隙的道理。他认为，政治统治的道理也是如此，能否有效防止社会动乱是关乎国家存亡的大事，必须给予极大的关注。“事之危也，圣人知之，独保其用。因化说事，通大计谋，以识细微。经起秋毫之末，挥之于泰山之本。其施外兆萌芽孽之谋。意思是，当事态出现不稳定的迹象时，智慧过人者往往能先觉察。这些“圣人”能洞察事理，并能发挥他们独特的作用，根据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势，细致入微地阐明事理，施计用谋，采取有效的措施。任何事物，都有一个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最鼎盛的时候恰恰是从不起眼的细小萌芽开始的。微不足道的力量可以发展到不可估量，甚至可以使巍峨的泰山发生动摇。“圣人”们教给人们防患于未然的谋略，正是从这种事理中悟出来的。这是治国理政，为君为臣必须牢牢把握的。人类社会分化离合，纷乱安定，都是常事，作为统治者，应该时时警惕，留心观察，那些深谙此道，并能审时度势，熟练运用这一谋略的人，可以称为上智贤明的圣人，是最优秀的统治者。面对复杂的局势，他们冷静观察，韬光养晦，不惊不乱，适时抓住遏制混乱局势的时机，筹谋划策。或者因势利导制止混乱，或者快刀斩乱麻，迅速收拾残局，以顺利实行自己的统治。《鬼谷子》毫不掩饰谋略的功利性和权谋术势的实用性，把政治谋略发展到相当的高度，当然，他关于政治谋略的论述，含有投机和诡密，这是不

能苛求的。《鬼谷子》为纵横家提供了谋略理论和方法。苏秦、张仪正是在把握这些谋略的基础上，才长于权变，游说诸侯以成就功业的。

辩论的奇变诡谲是鬼谷子谋略艺术的另一大特征。他以独具风格的诡辩术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论辩理论，也为战国时期的“游士”、“策士”、“谋士”等游说权谋者提供了一套诡辩理论。苏秦、张仪是成功运用这种辩论术的典型。《鬼谷子》第一篇就是《捭阖》，“捭阖”，指开合，指战国时纵横家分化、拉拢的游说之术。鬼谷子把“捭阖”看作权谋之本，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大谋略，大智慧，即计谋的最高法则。“纵横、反出、反复、反忤，必由此矣。”（《鬼谷子·捭阖第一》）《鬼谷子》中的《捭阖》、《反应》、《权篇》等等，都很深刻地论述了诡辩制胜的方法、原则。捭阖篇中说，“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阖之者，闭也、默也、阴也。”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作周密的思考，其中最要紧的，是不可忽略哪怕是最微小的事情。用“捭”之术，要把对方的实际情况了解深透，用“阖”之计，就要使对方感到你与他同心同志，这样才能使计谋成功。因此，要注意观察对方，权衡轻重利弊，弄清对方采取什么计谋。“或捭而出之，或捭而纳之”；“或阖而取之，或阖而去之”，要灵活多变，不可生搬硬套。捭阖之术要求对事物变化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预测。长生、安乐、富贵、尊荣、显名、嗜好、财货、得意、情欲等，都是可以公开向别人说的，为阳；而死亡、忧患、贫贱、屈辱、弃损、失利、失意、刑戮、诛罚等，是属于隐秘的，是阴，所有这些都用来试探对方的志向与意志，欢乐与欲求，思虑与智谋，这就是运用“捭阖”之术的基本法则，是游说他人的谋略。由此可以看出，在磊落光明的人前，只能谈论崇高；与阴险狡诈的人，只能谈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这样就可无所不出，无所不入，无所不克，可以游说于人，可以游说于家，也可以游说于国，游说于天下。

对于神秘人物鬼谷子的真伪，对于《鬼谷子》一书的真伪，是历史家研究的课题。千百年来，对《鬼谷子》一书所反映的谋

略思想和方法，褒贬各执一辞。从谋略研究的角度看，《鬼谷子》及鬼谷先生的各种传说，含有不可忽视的、丰富的谋略智慧，鬼谷先生将作为一个神秘的谋略家而受到谋略研究者重视。

## 孙 臧

孙臧，齐国人，生于阿（山东阳谷东北）鄆（山东鄆城北）之间，是孙武的后裔。原名不详，因曾受臧刑（去掉膝盖骨），故世人称之为孙臧。生卒年月史无记载，主要活动于齐威王、齐宣王在位期间（公元前356～前301年）。著有《孙臧兵法》，是我国战国中期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谋略家。

孙臧青年时曾与庞涓同学兵法，后庞涓任魏国将军，嫉妒孙臧才能，设法把孙臧骗至魏国，借故处以臧刑。孙臧身残志坚，受辱不屈，暗自准备逃走。当齐国使臣来魏时，孙臧往见使臣，诉说自己的遭遇与见解，深为齐使所赏识，就秘密将他带回齐国，在齐将田忌家作门客。当时齐威王常和贵族大臣们一起举行马车赛跑。用重金赌输赢。孙臧见他们驾车战马的速度相差无几，而又分为上、中、下三等进行比赛。他就向田忌建议，用上等马对中等马；用中等马对下等马；用下等马对上等马的方法，谋取两胜一负的胜利。他这种符合运筹学博弈原理的方法，后人称之为“三驷之法”，田忌因此而看出孙臧的足智多谋，就把他推荐给齐威王。威王通过与孙臧谈论兵法，很赏识他的军事才能，就任命他为军师，参与战略决策，成为齐统治集团中的重要智囊人物。孙臧一生的战绩主要是辅佐田忌，在桂陵、马陵两次大战中，大败魏军，创造了“围魏救赵”与“减灶诱敌”两种战法的范例。

齐威王三年（公元前354年），魏将庞涓率军八万包围了赵都邯郸。次年，齐威王派将军田忌率军八万救赵。田忌本欲直趋赵国，孙臧劝阻他说：“解乱麻不能生拉硬扯，劝斗殴岂能自己卷入。魏军主力精兵尽在赵国，国内多是老弱之军，在此情况下，应避实击虚，攻其必救，向魏都进军，以调动在赵魏军回师

自救，而于其归途中与以截击，既可解赵之围，又可诱歼魏军，一举两得。”并建议“南攻平陵（河南睢县西）”。平陵是魏国东部平原地区的军事重镇，较难攻取，且有受魏军夹击被切断后方联络的危险。孙臏对此本来也很了解。他之所以决定向平陵进攻，就是为了使庞涓产生齐将指挥无能的错觉。田忌采纳了他的建议，挥军南进。当齐军接进平陵时，孙臏又建议只派一部兵力佯攻平陵，并指示他们，如果遭到魏军的夹击，就假装败退下来，进一步使庞涓产生齐军战斗力很差的错觉。此外，还另派一部轻车部队及少量步兵“西驰梁郊”，佯示袭击大梁（河南开封），以激怒庞涓，诱其急速回救，而将主力埋伏在判定魏军必经的桂陵（河南长垣北）附近。庞涓果然中计，尽撤邯郸之围，昼夜兼程南下，在桂陵遭到齐军主力攻击。经过在邯郸与赵军的长期对峙，魏军实力已大为削弱，加以长途跋涉，已成疲惫之师，突然遭到以逸待劳的齐生力军的截击，仓皇应战，终于惨败，遭到歼灭性的打击。

齐威王十四年（公元前343年），魏军攻韩，战于南梁（河南汝州南）。韩向齐求救。次年，齐派田与孙臏率军救韩，直趋大梁（魏国都，河南开封）。“魏将庞涓闻之，却韩而归。”魏惠王命太子申、庞涓率军十万，经宋国边邑外黄（河南民权西北）北进迎击。孙臏对田忌说：“魏军素悍勇而轻齐，”正应利用其轻敌心理，“因其势而利导之”。于是采用了示弱诱敌、设伏聚歼的方针，由齐西境廩丘（山东郓城西北）地区进入魏境后，第一天做十万人饭灶，第二天做五万人饭灶，第三天只做三万人饭灶。进至煮枣（山东菏泽西南）一带时，知魏军已东进至外黄，即伪示不敢与魏军决战而退走。庞涓进至济阳（河南兰考东北），得知齐军撤退和逐日减灶的情报，向太子申说：“吾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即亡过半矣。”遂率轻锐，以一日走两日路程的急行军追击齐军。齐军退至齐边境之马陵（山东范县西南）时，孙臏据魏军行军速度预计当晚追至马陵。马陵道狭地险，两旁树木茂密，便于设伏。孙臏把主力隐蔽于预定伏击地域两侧，并在伏击地域的前方，用战车、大盾、蒺藜等构成野战壁垒以截

断敌之进路；又派出万名弩兵，隐蔽于道路两侧森林中，按规定信号发起攻击。不出所料，魏军于孙臆预计时间进入设伏地域，陷入重围。齐军万弩齐发，魏军大乱，庞涓愤愧自杀，主帅太子申被俘，从此魏国一蹶不振，“诸侯东面朝齐”，孙臆也因之名扬天下。马陵之战后，齐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始终支持孙臆的田忌，在内部斗争中失败，被迫逃去楚国，孙臆从此也不知所终，仅有所著《孙臆兵法》传世。

《孙臆兵法》是继《孙子兵法》之后，我国古代的一部重要军事理论著作。它是孙臆及其后学所著。《汉书·艺文志》称之为《齐孙子》。据说原书共八十九篇，附图四卷。大约在东汉以后散失。直到1972年，才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葬中重新出土。一部竹书可惜仅存三十篇，而且残缺不全。

《孙臆兵法》不仅继承了《孙子兵法》光辉的军事思想，而且结合战国时期的战争特点，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是先秦时期战争实践的总结，是我国古代军事理论的珍贵遗产。通过《孙臆兵法》，可以看出孙臆的军事思想。

## 田 单

田单，战国时代齐国人，是田齐王室的一个支系亲族，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于齐滑王、齐襄王在位期间（公元前300年—前265年）早年在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省淄博东北）当“市掾（管理市场的一般官员）；在燕将乐毅率五国联军破齐之后，退到即墨，被推举为守城将军，率领军民坚守孤城5年，后以“火牛阵”战法大破燕军，并乘胜收复齐国失地，被齐襄王封为安平君，并任为相；齐孝成王二年（公元前264年）离开齐国，到赵国任相；此后情况史无记载。

田单最光辉的业绩是其广施谋略，以弱胜强，收复齐国失地。特别是他创造的以“火牛阵”出奇制胜的战例，为历代兵家所称道，成了谋略制胜的战例。

周报王元年（公元前314年）齐宣王乘燕国内乱，一举攻占了燕都蓟（今北京西），杀了燕王哙，并大肆进行抢掠，引起燕国的仇恨和其他诸侯国的不满。齐军立燕太子平为燕昭王后撤退。此后，齐、燕关系犹如水火。28年之后（即公元前284年），燕国决定报齐破国之仇，派上将军乐毅率燕军并赵、韩、魏、秦联军攻齐，在济水以西（今山东聊城以南地区）一战而击溃齐军。乐毅遣回秦、韩之师，分魏师以略宋地，让赵军北收河间，亲率燕军向齐都临淄方向继续发展进攻，连下70余城，攻占临淄。

临淄失陷后，齐王及贵族、官吏等纷纷出逃。田单率领的族人与其他贵族、官吏迅即逃至临淄东北的安平。田单估计燕军将会进攻安平，因此他让族人将车轴伸出部分锯掉，并在轴头上包上铁皮。当燕军逼近安平时，齐大、小贵族及官吏争相逃命，车辆拥挤于道，互相撞挤使车轴折断、车轮脱落，被燕军俘虏。但

田单的族人因车轴短且包以铁皮比较牢固，得以逃至即墨（今山东即墨北）。

燕军攻克安平后，直指齐昭王逃亡地——莒（今山东莒县）。此时齐湣王已被楚将淖齿所杀。后来，齐臣王孙贾又杀了淖齿，拥立湣王之子田法章为王（齐襄王）。田法章号召军民守莒抗燕。燕军久攻莒城不下。乐毅决定：以右军、前军继续围莒，亲率左军、后军攻即墨。即墨是齐国较大的城邑，“三里之城，五里之廓”，城池坚固，储备充足，防守条件较好。即墨守城大夫率领军民抗击燕军，不幸殉职。即墨军民遂共推田单为将，以抗击燕军。他们说：“安平之战，田单宗人以铁笼（以铁笼车轴头）得全，是多智习兵（富于智慧，熟习军事）。”安平得脱确实显示了田单有超人的聪明才智。

田单受命时面临的是敌强己弱的严峻形势。为扭转这种被动局面，田单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团结即墨军民，鼓舞士气，壮大自己的力量；二是分化瓦解敌人，迷惑敌人，削弱敌人。他为此采用了一系列的谋略手段：

身先士卒，激励军民斗志。田单首先整顿扩编了守城部队，将自己的妻妾编入部队，同时调整了防御部署。他以身作则，与军民同甘共苦。城中富人、商人送给他的物品，他全部分给士卒；士卒生病，他去慰问并请医生治疗；他不分昼夜巡视城防，和士卒一起修补被攻破的城墙；燕军攻城，他站在最关键和危险的地方指挥战斗。他的行动赢得了军民的信赖，鼓舞了军民的战斗热情。

乐毅是个有勇有谋的将军。这次率军攻齐，他约束部队，禁止掳掠，并笼络齐国权贵人物，所以攻齐连连告捷。他指挥燕军久攻即墨不下，便改用攻心战法，围城而不打，还后撤9里，筑垒相持，对出即墨城的居民，不但不抓捕，还对困难者给予赈济。田单对此深为忧虑，担心长此以往，必会动摇人心。因而决心逼走乐毅。齐襄王五年（公元前279年），燕昭王死后惠王继位。田单了解到惠王过去与乐毅有矛盾，认为有隙可乘，遂派反间到燕国散布谣言说：“齐湣王早已死了，而乐毅还没有攻下齐

国的莒和即墨两城。这不是他无力攻取，而是故意留而不攻。因为他与燕惠王有矛盾，害怕被杀掉，不敢归燕，所以他以伐齐为名，暗中与诸侯联系，企图在齐国称王。齐国人不怕乐毅称王，就怕燕国换将。如果燕国派别人来接替乐毅，那么即墨就会被燕军攻破了。”燕惠王本来对乐毅好几年都没有攻下莒和即墨两城就有怀疑，听到乐毅要在齐称王的谣言便深信不疑了。于是，他派骑劫接替乐毅统率燕军。乐毅怕回燕会遭到不测，便回到故乡赵国去了。乐毅一走，燕军少了一个深受将士爱戴的统帅，又对骑劫的无能心怀不满，因而军心涣散，战斗力大大削弱。而田单却达到了战略目的。

为了麻痹敌人，隐蔽自己的企图，田单将军队隐蔽起来，让老人妇女登城守卫，同时把城里的黄金收集起来，派城里的富豪送给燕军，并佯称：“即墨守军马上就要投降。请你们受降时不要伤害我们的家室妻妾。”骑劫见即墨守城的都是老弱妇幼，以为城中齐军确实已无战斗力，因而对齐军准备投降的说法深信不疑。燕军也“皆呼万岁”，只等着受降，完全放松了警惕。

田单运用的谋略手段，全部达到了预期目的。即墨军民团结一致、士气高涨，战斗力大大增强；燕军统帅昏庸，军心涣散，骄傲麻痹，战斗力大大削弱。田单见敌我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性变化，认为反攻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他征集了近千头牛，给牛披上绘有五彩龙纹的红布，在牛角上绑上打磨锋利的兵刃，在牛尾上绑上涂有油脂的苇束，并挑选了5000名精壮士卒，集中于面向燕军大本营的城墙内侧，在城墙底部挖了几十个通向城外的大洞。有天深夜，田单先派部分士卒潜出城外，填平城壕，开辟好通道，同时将牛赶到各出城洞口，然后在统一号令下点燃牛尾的苇束，将牛由通道驱出。牛因尾巴被火燃烧，疼痛难忍，疯狂地奔向燕军营阵，形成一个有正面、有纵深的“火牛阵”，凶猛冲击燕军；由5000人组成的突击部队，紧跟“火牛阵”后迅速出击；城墙上男女老幼敲锣打鼓、呐喊助威。毫无戒备的燕军，夜里正在休息。火牛冲到跟前，他们以为来了神兵天将，遂大惊失色，完全丧失了战斗能力，立即全军崩溃，被火牛和齐军

突击部队杀得落花流水，横尸遍地。主帅骑劫也被齐军杀死。部分燕国残军仓皇逃走。田单乘胜挥师追击，迅速全部夺回了齐国的所有失地，并从莒城将齐襄王迎回临淄听政。齐襄王因田单光复齐国劳苦功高，封他为安平君，并任命他为齐相。

田单为相以后处处谨慎小心，在政治上、军事上均无大建树。这是由于田单复国功大，在百姓中威信高，而齐襄王心胸狭窄，总是怀疑田单可能篡位，田单不得不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不敢有所作为。田单任齐相 14 年，值得称道的只有率齐军破狄这件事。狄族活动于今山东高青东南一带，独自为政。齐襄王命令田单率军前往征伐。行前，田单拜会智谋之士鲁仲连。鲁说：“将军攻狄，不能下也。”田单一听很生气，说：“我在即墨一战而破燕军万乘。现在征讨小小的狄族，怎么能攻不下呢！”遂转身就走。结果，田单攻狄“三月不克”，不得不回来请教鲁仲连。鲁仲连说：“将军你在即墨的时候，坐下来则编织盛土的草袋，站起来则拿着筑城的工具修补城墙，与士卒同患难，共甘苦。将军有誓死打败燕军的决心，士卒有一往无前、视死如归的气概。这是大破燕军的根本原因。而现在，将军你拥有采邑万户，有游乐的场所，用黄金作腰带，荣耀国内，有贪图享乐之心，无为国捐躯之意，所以打仗就不会取得胜利。”鲁仲连一针见血指出实质问题。田单猛然醒悟过来，立即回到征狄前线，进行思想动员，鼓舞士气，并拿出在即墨之战时的战斗精神，冒着矢石箭雨，亲自擂鼓指挥攻城，终于攻破狄城，降服狄族。

## 韩非子

韩非，生于公元前280年至公元前233年。原是韩国的贵族，自幼敏而好思，他与著名的政治家李斯同拜荀况为师。在“战国七雄”争强之际，韩国势力最弱，经常受到魏、楚、秦等强国的欺凌，韩非为此不胜感慨。他曾多次上书韩王，倡议变法富国、积财强兵。但韩桓惠王韩安昏庸无能，不辨良莠，不采纳韩非的主张。

韩非不善辞令，常常因不能在口头上把道理说清而急躁红面。但他才学渊博，文思神俊。他见韩王不采用他的主张，便发愤著书立说，阐明变法图强的道理。

他纵观天下“争于气力”的利害形势，针对韩国法不彻底的弊端，又全面总结了战国时期变法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以法为主”，“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理论。他认为当今世界已处于动荡时期，礼崩乐坏，想用昔日宽厚的政治来治理民众，就像不用绳索、马鞭去制服野马一样，是不切实际的妄想。指出只有严峻的刑罚才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

韩非写了许多卓有见识的文章，俱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五蠹》、《说难》、《孤愤》、《显学》、《定法》、《有度》、《用人》、《内外储》等，这些文章大多数是讲治国治世的道理，思想深刻，文辞犀利。其中《五蠹》篇中把儒家、墨家、纵横家、逃避兵役者及工商之民，指为社会上的五种蠹虫，即五种有害之民。说“儒家学者称颂先王的政治主张，借助仁义进行政治说教，讲究仪容礼服，修饰游说言辞，以乱当今法度，动摇君主实行法治的决心。那些高谈阔论的纵横家，假托旧说，妄举古事，借助外国的力量来谋求个人的利益，而抛弃国家利益。那些游侠刺客，聚集党徒，标榜气节来沽用钱财行贿，

请托权贵，沈避汗马之劳。那些商工之民，制造粗劣器物，囤积居奇，等待时机，从农民身上牟取暴利。这五种人，都是国家的蛀虫。”他认为，只有农民和兵士才是国家有用之民。此种言论，反映了思想打上了极深的时代烙印。

韩非很善于运用简明寓言说明复杂的道理，如“守株待兔”就是对用老法治世者的一种嘲笑。韩非的其他寓言，如“自相矛盾”、“滥竽充数”、“唇亡齿寒”、“和氏璧”等，都是脍炙人口的警世良寓。

韩非的思想核心是以法治国，他认为治国不能离开法律，这是因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没有刑律制服不了民众。但君主制订出法律后，还要有一套权术驾驭臣下，有一定的权势推行法令。否则法令不能贯彻，君主的地位不会巩固。法、术、势三者必须并重，才能巩固君主的统治。

另外，韩非非常重视奖励耕战，认为这是富国强兵之道，只有通过奖励耕战，才能发展经济，才能加强军事力量，然后通过兼并战争统一天下，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政权。

秦王嬴政对韩非的主张大加赞赏；他也认为文章的作者定是个杰出之人，因而对作者特别敬佩。他对大臣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谈话），死不恨矣！”

公元前 234 年，秦国发兵攻打韩国，并指名要韩非到秦国来。韩王安为政昏庸，不知韩非有杰出之才，便答应秦国的要求，让韩非出使秦国，名义上是韩非被邀访秦。果然韩非奉命使秦，秦王见到韩非十分高兴、谈话投机，想法一致，就把他留在秦国，准备给他安排一个位置。但韩非到秦国后，给秦王写了一篇上书，说明秦韩为近邻，不能略韩国。书中又揭发了秦王的特使姚贾是个“梁父大盗”，说他“以王之权，国之宝，外自交于诸侯。”这使姚贾与廷尉李斯十分害怕，他们自知才华不及韩非，心中十分嫉妒，便趁机向秦王诽谤韩非，说“韩非是韩国的贵族之子，是为韩国谋利益的。今大王要并吞诸侯统一全国，韩非是韩国派来的奸细，万不可重用他。时间久了，再放他回韩，无疑是自留后患，不如借此杀掉他。”李斯是秦王的得力宠臣，秦王

对李斯等人的诬陷自然是信赖无疑，尽管韩非与秦王相见如故，接待如宾，但秦王还是把他投入监狱，以观动静。

李斯、姚贾唯恐秦王改变主意，将韩非重新起用，公元前233年偷偷地派人用毒药把韩非毒死了。

## 李 斯

李斯，生年不详，死于公元前 208 年，战国末年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他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出谋献策，为秦帝国的建立和中国的大统一立下了功劳。但他为人品德不正，追名逐利，见利忘义，秦始皇死后，为赵高所收买，助秦二世胡亥为非作歹，最后祸及自身，被赵高陷害而死。不管李斯一生的功过如何，他都称得上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政治谋略家。

李斯年轻时曾在楚国做过郡掌管文书的小吏。但他雄心勃勃，很不满足于自己的处境和地位。据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记载，他曾借老鼠在不同场合偷食时的表现作比喻，发出感慨说：“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他的寓意是，做人就要做个像在仓库里偷食粮食的老鼠，为所欲为，尽情享受。为了达到飞黄腾达的目的，他弃掉小官不做，离开楚国，跑到当时学术气氛最浓的齐国，投拜荀卿为师。荀卿即荀子，他是当时名闻遐迩的儒学大师。但他的儒学和孔、孟的儒学是很不同的，他的基本思想很接近法家的主张，是研究如何治理国家的学说，被称为“帝王之术”。所以很适合战国末期的形势和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李斯就是看中了“帝王之术”才投师荀子的。他曾说：“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可见他是一个不甘寂寞，有着强烈求仕欲望的人。由于他有明确的学习目的，因此读书认真，钻研精神很强，学业优良，成绩突出，很得老师荀子的赏识，日后亦成为荀子有作为的门生之一。

李斯学成之后，反复思考了自己的去向和用武之地，以实现梦寐以求的高官厚禄和荣华富贵。他经过审时度势，认为当时互相抗争的七国中，其他六国不是弱小，就是国王无所作为，唯独秦国最强，秦王政又很能干，将来天下必归于秦。因此，他断然

决定投奔秦国去施展自己的才华。当他向老师荀子辞行时，荀子问他为何要去秦国，他毫不隐讳自己的思想观点，回答说：“要想干一番事业，都有一个机遇问题，现在各国都在争雄，这正是立功成名的大好机会。秦国实力最强，雄心勃勃，正在奋力争夺统一天下，那里有用武之地，可以大干一场。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卑贱是最大的耻辱，贫困是莫大的悲哀。处于贫困卑贱的地位，就要为世人讥笑。不爱名利，无所作为，不是读书人的目的。所以我决定到秦国去。”荀子含首，送别了这个志向深远、雄心勃勃的弟子。

李斯为求功名，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千里迢迢，跋山涉水，不辞艰苦，到达秦国。他先投在相国吕不韦的门下作舍人，很得吕的赏识，任命他为郎官。但李斯岂能满足这样的地位，他只是把吕不韦为自己能够接近秦王政的跳板而已。果然，机遇不负有心人，秦王政终于认识了他。李斯便主动向秦王献计说：“如果想要干成一番事业，必须要抓住时机。秦穆公时，虽然很强大，但未完成统一大业，原因是当时时机不成熟。经过秦孝公以来的努力，现在秦国的国力已很强大，各国都不如，加上大王你又贤德，因此打败六国有如扫除灶上的灰尘那样容易。现在是下决心完成帝业，统一天下的最好时机，千万不要错过呀！”秦王非常欣赏李斯的见解，器重他的才华，很快提拔他为长史。接着，李斯又为秦王出点子，让秦王派人持金玉珍宝出使各国，游说、收买、贿赂、离间六国的君臣，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逐个加以消灭吞并。秦王采纳了李斯的策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于是重用李斯，提拔他为客卿。

但是，正当李斯在仕途上一帆风顺，积极为秦消灭六国，统一天下，出谋献策，施展才华之际，六国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并不示弱，他们纷纷给自己的国王献计献策，或以武力对抗，或派出间谍到秦国，采取各种方法削弱秦的力量。其中最著名的是韩国派出水利专家郑国到秦国游说，鼓动秦国耗巨资修建水渠，想以此削弱秦国的人力物力，牵制秦国东进侵韩。但在修渠的过程中韩国的意图暴露。秦国为之震惊，朝廷内外掀起了一场轩然大

波，并演化成了秦宗室贵族与外来客卿之间的争权夺利斗争。贵族们对秦王政重用吕不韦、李斯等客卿早已怀恨在心，只是慑于秦王未敢发作。这次终于得到了机会，因而群起而攻之，要秦王赶走一切外来之客。秦王被迫无奈，下了一道逐客令。李斯自然亦在被逐之列。

眼看自己的追求和苦心转瞬之间要化为泡影，李斯岂能甘心！他有抱负，有智慧，也敢作敢为。他不怕犯颜获罪，直接给秦王写了一封信，劝秦王不要逐客，这就是著名的《谏逐客书》。《谏逐客书》不仅是一份情词恳切的求职书，而且还充分反映出李斯的才华和谋略智慧，它实际上是李斯贡献给秦王的一份广收贤才强国，进而消灭六国统一天下的政见谋略书。

秦王政是个有雄才大略的人，他看了李斯的《谏逐客书》后，明辨是非，果断地采纳了李斯的建议，立即取消了逐客令，再次重用李斯，提拔他为廷尉。

取消逐客令对秦国的作用很大，影响深远。秦始皇坚持接纳、任用客卿的政策，招揽了一大批贤将良才。如史书上著名的王龅、茅焦、尉繚、王翦、王贲、李信、王离、蒙恬等都是来自别国的客卿，他们都对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秦统一中国的事业中起过重大的作用。

李斯不仅为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中国出谋献策，而且对统一后的秦帝国，如何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也为秦始皇出了许多点子。

其一，实行郡县制。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国经过连年征战，消灭了六国，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起一个幅员空前广大，人口骤然增多的第一个大一统国家。此时，秦王政虽然改王称帝，自称为秦始皇，但对如何巩固和加强这个统一了的封建帝国的统治，秦王朝内部却发生了意见分歧。秦始皇在召集大臣讨论时，以丞相王绾为首的一大批大臣都主张承袭周代的分封制，封秦始皇诸子为王。只有李斯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以周代后

期诸侯互相倾轧，不听周王朝的君令为例，说明分封制不可取，提出实行郡县制，由中央集权，加强统一，这样才能天下安宁。秦始皇也不主张把统一的国家，再立许多国，增加不安宁的因素，所以支持和同意李斯的意见。于是，发布诏令，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郡县制的确立，加强了统一的封建国家的中央集权，推进了历史的发展。

其二，焚书坑儒。事情发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前 213 年）。在一次宫廷朝贺上，有个叫淳于越的儒学博士，对秦始皇没有按周制分封子弟发表批评意见，他借古喻今，要秦始皇赶快改行分封制，不然的话，天下不会长久。淳于越站在儒家的立场看待秦王朝的政治，因此同秦始皇坚持的法家思想和政策是格格不入的。秦始皇很不满意淳于越的批评，把他交给当时执掌相权的李斯处理。李斯虽从学于荀子，但他一向推行法家思想，主张严刑苛法。他认为朝野内外的儒家思想和主张，是对秦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威胁；而儒生们的思想又源于读书。所以他借题发挥，建议秦始皇下令焚书。秦始皇赞同李斯的意见，并由李斯制定出残苛的焚书法令。法令规定，凡秦以外的史书和非博士（掌管文史典籍的官）所藏的诗、书、百家语等，除属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外，统统烧毁。而且规定了对违背和抗拒禁书令的人处以各种刑罚，轻则“黥刑”劳改（修筑长城），重则处死“弃市”，直至株连九族。

焚书后的第二年，秦始皇又下令将咸阳京城里的四百多名儒生活埋。这就是史书上所说“坑儒”事件。

李斯才华横溢，智多谋深，但他的品行不好，是个利禄名位熏心的人。他曾为了自己不失宠，向秦始皇进谗言，杀害了智慧才华比他强的老同学韩非。为了立足进身，高官厚禄，他向秦始皇献了许多好谋略，为秦统一天下、巩固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李斯利禄之心太重，以至晚节不保。秦始皇死后，他在大奸佞宦官赵高的压力下，助纣为虐，为赵高、胡亥出了不少坏主

意。结果不仅加速了秦的灭亡，连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全搭了进去。

秦王政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带着他宠爱的第二个儿子胡亥、大宦官赵高和丞相李斯，第五次出巡，这次的路线是南方各郡。他登上了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市南），祭祀大禹，刻石留念。秦始皇为求长生，曾派徐福带三千童男童女到蓬莱去寻找长生不老的仙丹妙药。因为世上根本没有长生不老之药，徐福等人不仅没有取回仙药，而且一去不返，下落不明。秦始皇更没有想到自己会死在巡视的路上，所以对身后的帝位承袭未作认真安排，只是在临死前才有意想让有才干的大儿子扶苏继位，并嘱托写了遗诏。但为时太晚了。秦始皇死在回归的路上（今河北钜鹿境内）之后，宦官赵高立即密谋篡权。他要让秦始皇的第二个儿子胡亥继位。因为胡亥无能，只会享乐游玩，而赵又是胡亥的老师，一旦胡亥登基，大权自然就由赵高把持。可是按照惯例和秦始皇的遗嘱，胡亥不能继位。赵高是个野心勃勃、诡计多端的人，他为了办成这件事，就设法拉拢李斯。赵高知道，李斯身为宰相，计多谋深，又深得先帝秦始皇的宠信，在继位问题上举足轻重，而且赵高也深知李斯是一个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功名利禄的人，只要以此向李斯施加压力，李斯肯定屈服。果不出赵高所谋，李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利禄，竟然与赵高、胡亥勾通，一起采取偷梁换柱的手段，篡改秦始皇的遗诏，逼迫应继帝位的扶苏自杀而死。同时还将支持扶苏的镇北名将蒙恬囚禁害死。于是秦二世在赵高、李斯的扶持下加冕登基了。

应当说，李斯与赵高的结合是被迫的。他对胡亥的昏庸无能也是看得很清楚的。但他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却违心地投胡亥所好，为其出坏点子，起到了加速秦代灭亡的作用。“督责之术”就是李斯为胡亥设计的一套严刑酷法和君王专断的治国计策。所谓“督责之术”，正如李斯所说：“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而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其中心意

思是，君主对臣下和老百姓要实行“轻罪重罚”，使人人害怕刑罚而不敢轻举妄动。李斯还主张君主对臣下要实行独断专行，要驾驭群臣，不能受臣下的影响。他认为只有这样，君主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群臣不敢违抗，百姓不敢造反，君王的地位才能稳固长久。

李斯的“督责之术”的理论根据是他的法家思想。但是在当时秦二世对老百姓实行残酷统治的情况下，李斯抛出“督责之术”却起到了火上加油的作用。不过，李斯向胡亥进“督责之术”，不仅仅为了讨好胡亥，恐怕还隐藏着深一层的意思，那就是他与赵高两人，始终貌合神离，同床异梦，争权夺利，明争暗斗，都想把对方整掉。李斯想以此促胡亥摆脱赵高，削弱赵高的独宠专权。可惜李斯这一次未能如愿以偿。胡亥只接受了他的“严刑酷法”政策，大行苛捐杂役，奢侈腐败，滥杀无辜，无所不为；而对赵高则一如既往，偏信不疑，恩宠更甚。李斯非但没有削弱赵高，到头来还被赵高借故整死。李斯为了平息人民的忿怒和造反，规劝胡亥停建阿房宫，惹胡亥生气，下令将其捕押入狱。李斯在狱中上书胡亥申辩，都被赵高扣留。赵高还借机向胡亥进谗言陷害，编造罪状，说李斯与其子李由谋反。并用李斯所制定的“严刑酷法”，对李斯重刑拷打，逼迫其供认谋反。李斯经不起严刑，只得屈招。乃于秦二世二年（前208年）七月被杀死。

## 汉尼拔

汉尼拔生于约公元前 247 年，迦太基军事家。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他的名字成为恐怖的代名词，一提“汉尼拔来了”，对罗马人来说，就像说狼来了一样吓人。

汉尼拔的父亲哈米尔卡·巴卡是迦太基著名的军事将领，汉尼拔的童年是在战乱中度过的，他 5 岁时，迦太基船队在西西里岛附近的海域遭到惨败，罗马的骄横，迦太基的屈辱，深深刺伤了汉尼拔幼小的心灵。他曾不止一次地祈求神灵保佑迦太基强盛，有朝一日，重振国威，击败罗马，以雪前耻。

公元前 228 年，汉尼拔的父亲在征服伊比利亚的作战中阵亡，汉尼拔的姐夫哈司德鲁巴尔接任了统帅。不久，汉尼拔在新统帅的召唤下，任骑兵统帅，他的军事指挥天才逐渐显露出来。公元前 221 年，哈司德鲁巴尔遇刺身亡，全军推举汉尼拔为继承人。那一年，汉尼拔 28 岁。

公元前 218 年春天，汉尼拔率领 7.5 万步兵和 1 万多骑兵，选择了一条连鸟儿也难飞越的道路，翻越阿尔卑斯山，从侧后袭击罗马。这是古代最伟大、最艰难的行军，战象、战马大多冻死，寒冷、饥饿使残酷的军纪也难以保证将士听从指挥，有人宁愿死在山中，也不愿再走一步。汉尼拔凭着个人的感召力来鼓舞斗志，他与士卒同吃同住，一起披着斗篷放哨。经过半年行军，同年 10 月，突然出现在意大利北部平原，罗马人做梦也想不到汉尼拔就在身边。

两军在特雷比亚河首次相遇。汉尼拔诱使敌人渡河作战，趁罗马军队半渡之时，指挥埋伏在河道的迦太基人突然发起进攻。

浑身湿透，寒冷异常的罗马人勉强应战，结果大败，6万罗马士兵大部被杀，只有不到2万人逃了出去。汉尼拔占领了高卢。

接着，汉尼拔的军队势如破竹，边走边为罗马军队设下圈套，使罗马军队一次又一次地上当、失败，损失战斗力。汉尼拔喜欢走偏僻和出人意料之外的路线，采取埋伏、狙击和其他突然行动，忽左忽右；使罗马军队无所适从。他还组成了出色谍报系统——甚至在罗马城内，他也建立了情报网络。他本人也常常化装或戴着假发，亲自搜集情报。对汉尼拔出神入化的指挥才能，罗马人惊呼：“在这个时代的历史书中，几乎每一页都可以证明他的军事和政治天才。”

公元前203年，罗马大将西庇阿率领军队渡海在非洲登陆，直接攻打迦太基本土。迦太基本地危机，只好命令汉尼拔回国。那一年的秋天，他不得不撤出意大利返回非洲，结束了他在意大利长达十六年的征战。

公元前202年，汉尼拔按照迦太基元老院的命令，被迫同西庇阿在扎马决战。西庇阿正是采用了汉尼拔的两翼包抄战术打败了汉尼拔。公元前201年，迦太基战败后接受了罗马人要求的屈辱条件，成为罗马的附属国。第二次布匿战争以迦太基的最后失败而告终。

最早称汉尼拔为“战略之父”的正是罗马人，他们这样评价汉尼拔：“他从进入意大利一连十六年的时间，不断地苦战。他从来没有一天离开过战场，他具有一种超人的能力，能使他的行动适应千变万化的环境，他一个与整个罗马为敌。”罗马人从汉尼拔身上学到了许多宝贵军事才能，并以汉尼拔的战术击败了汉尼拔。

公元前196年，汉尼拔当选为迦太基的最高行政官员。他在任职期间，实行许多重大改革，力图振兴国家，然而引起了贵族和罗马当局的不安。当危险来临时，汉尼拔被迫逃亡叙利亚，开始了他长达十三年的逃亡生活。在逃亡期间，他先后到过叙利

亚、克里特岛和小亚细亚的比提尼亚活动，游说这些国家建立反对罗马帝国的军事同盟。

公元前 183 年，罗马为了消除隐患，派兵追捕并包围了汉尼拔在比提尼亚的住所。汉尼拔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服毒自杀。临死时他说：“既然罗马人连等待一位老者咽气也觉得度日如年，急不可耐，那么，就让我来帮他们除去这块多年的心病吧。”

汉尼拔死时 66 岁。

## 萧 何

萧何，汉初三杰之一，著名丞相。沛县丰邑（今属江苏丰县）人。他不论在战争期间，还是在汉初恢复时期，都表现出了中国古代杰出政治家的风度和治国才能，几千年来都被人们所称颂。

公元前202年2月，刘邦即帝位，接着就论功行赏。5月，刘邦在洛阳南宫摆酒大宴群臣。刘邦问群臣：“你们都说实话，我为什么能够夺取天下？项羽又为什么会失掉天下？”群臣所说不一。最后刘邦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供军需、给粮饷，我不如萧何；指挥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豪杰，我能有他们，所以我能够得天下。项羽只有一个范增还不能重用，因此最后败在我手中。”从上面的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刘邦认为张良、萧何、韩信是他最得力的功臣，这三人被称为“汉初三杰”。

后来，刘邦论功封赏时，由于群臣争功，所以一年多也定不下来。刘邦最后定萧何为首功，封他的食邑也最多。很多功臣因此愤愤不平，说他们都身经百战，而萧何只不过发发议论，做做文字工作而已，毫无战功，为什么他的食邑反而比我们多？

刘邦问大臣们：“你们知道猎狗吗？打猎的时候，追杀野兽的是猎狗，用来指示行踪，放狗追兽的是人。如今诸位只是能猎获野兽，相当于猎狗的功劳。至于萧何，他能放出猎狗，指示追逐目标，那相当于猎人的功劳。况且你们只是一个人追随我，多的也不过带两三个家里人，而萧何却是全族好几十人跟随我，这

些功劳怎么能抹杀呢？”大家都无言可答。

诸侯分封完毕，接着是排位次。群臣都说：“平阳侯曹参身受七十余处战伤，攻城掠地，功劳最多，应排第一。”

刘邦已经压过大家一次，重封了萧何，对排位次的事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不过他心里仍然认为萧何应该排在第一位。这时，关内侯鄂君说：“在楚汉相争的五年中，陛下有好几次都是全军溃败，只身逃脱，全靠萧何从关中派出军队来补充。有时，就是没有陛下的命令，萧何一次也派遣几万人，正好补充了陛下的急需。不仅是士兵，就是军粮也全靠萧何由关中供应，才保证了军队的粮食。陛下有好几次败退把山东都丢了，幸亏有萧何坐镇关中，陛下才能重新振作。这些都是创立汉家天下流传后世的大功劳，怎么能把像曹参等人只是一时的战功列在万世之功的前面呢！我认为，萧何应排第一，曹参第二。”

这番议论，正中刘邦下怀，于是把萧何排为第一，准许他穿鞋带剑上殿，并封了萧何的父子兄弟十多人。

刘邦即位后，便下诏罢兵归农，让士兵都回家种田、开荒，减免百姓赋税。这时，定都的问题日益紧迫。刘邦暂居栎阳，命令萧何营建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为都城。公元前199年，刘邦来到长安。萧何正在建未央宫，建好了东阙、北阙（高大的宫门），又建前殿、武库、太仓等，刘邦嫌宫室过于壮丽豪华，责备萧何说：“连年战争，刚刚安定，战争的结局还不知怎么样，你为什么修建这么豪华的官室？”

萧何回答说：“正因为天下刚刚安定，才好借机会多征发人和物来营建富室，况且天子以四海为家，宫室壮丽才能显出威严，也免得子孙后代再来重建。”刘邦这才转怒为喜。西汉建都长安，历时二百余年，最早规划设计的就是萧何。

汉帝刘邦为巩固政权，寻找借口陆续消灭异姓王。他见韩信功高望重，且握有兵权，就几次借故削去韩信的兵权，最后降为只有虚名的淮阴侯。

公元前197年，阳夏侯陈豨谋反，自立为王。刘邦亲率大军前去征讨。当时韩信推说自己有病，没有随同前往。于是，韩信的一个门客求见吕后，告发韩信本是陈豨的知交，这次陈豨谋反，韩信是内应。准备在一天夜里，假传圣旨。把奴隶和犯人释放出来，袭击吕后和太子刘盈。

吕后一听，认为事关重大，便秘密召见丞相萧何。他们两人商量出计策，由萧何参加执行。第二天，萧何就让人去请韩信到相府赴宴。韩信自称有病，婉言谢绝了。萧何就亲自到韩信府上，以探病为由，直接进入韩信的內室。韩信再也无法推辞，只得与萧何寒暄一下。萧何说：“我和你是好朋友，请你去赴宴，是有话对你说。”

韩信忙问有什么话。萧何说：“这几天皇上从赵地发来捷报，说征讨军大获全胜；陈豨已经逃往匈奴。现在朝中的王侯，都亲自进宫去向吕后祝贺。你自称有病不上朝，已经引起人们的怀疑了。所以我来劝你同我一起进宫，向吕后道贺，消除人们的怀疑。”

萧何说的话，让韩信不得不信。所以就跟着萧何来到长乐殿向吕后道贺。哪里知道宫中早就埋伏好了武士，吕后一见韩信中计，喝令刀斧手将韩信绑翻在地。韩信见事情不妙，急忙呼叫：“萧丞相快来救我！”哪知萧何早就避开了。吕后不容韩信申辩，命令武士：把他拖到殿旁边的钟室中杀死。随后，又将韩信的父、母、妻三族一古脑地捕杀。萧何辅助吕后，谋杀韩信，很符合刘邦巩固政权的需要，为刘邦除去了一块心病。

刘邦晚年，宫廷内部发生了一场废立太子的斗争。刘邦要废掉太子刘盈，改立赵王刘如意为太子。只是由于萧何等大臣的多次谏，刘邦才一直未作决定。公元前195年，刘邦病死，萧何辅佐太子刘盈登上帝位，这就是汉惠帝。萧何继任丞相。萧何为相期间，在制订汉朝的典章制度方面还办了一件大事，即作汉律九章。在约法三章的基础上，参照秦法，摘取其中合乎当时情况

的内容，制成律法共九章。这是汉朝制作律令的开端。萧何制定的汉律九章，删除了秦法的苛烦、严酷，使法令明简。公元前193年，年迈的相国萧何，由于长期为汉室操劳，终于卧病不起。病危之际，汉惠帝亲自去探望他，并趁机询问：“您百年之后，有谁可以代替您来做丞相？”接着惠帝又问：“曹参怎么样？”萧何听了，竟挣扎起病体，向惠帝叩头，说：“皇上能得到曹参为相。我萧何即使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恨了！”萧何与曹参本有些私怨，这番话表明，萧何为国家为百姓着想，不记宿怨的大度胸怀。

萧何一生勤俭节约。不论是在战争期间，还是在汉朝建立初期，他都表现出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和治世能臣的眼光和才干。他一生忠心为国，不谋私利，千方百计让百姓安居乐业。所以在他死后，仍然受到老百姓的敬仰和长久的怀念。

## 张 良

张良，字子房。城父（今安徽亳州东南）人。刘邦曾赞其有“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才能。

张良为韩国贵族出身。秦国灭韩后，张良用全部家财结交刺客，希冀有朝一日，为韩国复仇。在博浪沙（今河南原阳）狙击秦始皇失败后，他就更名改姓，流落到了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张良闲时，喜欢到城外的一座桥上散步，常遇到一位举止奇特的老人。一日，老人坐在桥头，一不小心将鞋掉到桥下去了，张良将老人的鞋捡上来，并帮他穿上，于是老人交给他一部《太公兵法》，并对他说：“13年后，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13年后，张良跟随刘邦路过济北，果然在谷城山下得黄石。后世称黄石公为“圯（少，桥）上老人”，并流传有兵书《黄石公三略》，共三卷。

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刘邦率兵早于西楚霸王项羽进入咸阳，欲“止宫修舍”。刘邦的妻妹之夫樊哙谏曰：“沛公（刘邦）欲有天下耶，将为富家翁耶？凡此奢侈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愿急还霸上，勿留宫中。”张良也力劝刘邦接受樊哙的劝告。刘邦听之，封闭秦朝宝库，还军霸上，并与江中父老约法三章。十二月中旬，项羽来到戏（今陕西临潼东北）水，屯军鸿门（今陕西临潼东北），与刘邦对峙。当时项羽有兵40万，号称百万；刘邦只有兵10万，号称20万，两军相距40里。翌日，项羽即出兵灭刘邦。

项羽的叔父项伯曾因杀人逃至下邳，投奔张良，张良与之交为好友。闻听此讯，项伯约张良随之远逃以免此难。张良说：

“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逃走），不义。”于是，他据实告知刘邦，又约项伯来见刘邦。刘邦与项伯约为婚姻，尽述心声。项伯回营劝项羽说：“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不如因善遇之。”翌日晨，刘邦借张良率百骑，来到项羽军中谢罪。项羽疑虑解除后，即在军营设宴招待刘邦一行人。席间，项羽的谋士范增三次举起玉佩，暗示项羽杀掉刘邦。项羽不予理睬；于是范增起身外出，令项羽堂弟项庄去席间舞剑祝寿，借机刺杀刘邦。项伯见状也上前与项庄对舞，并时时护着刘邦。张良见势不妙，赶忙离席告知樊哙。樊哙持剑盾闯到宴上，怒发冲冠，指责项羽不义。项羽赞其勇士，赐座。一会儿，刘邦出恭（上厕所），招樊哙一同离席。在樊哙等人陪侍下，刘邦从小路回到灞上军营，留张良在鸿门宴辞谢。

张良估计刘邦将至军营，便回席上，借口沛公不胜酒力，向项羽奉上白璧一双，向范增赠上玉斗一对。项羽忙问：“沛公安在？”张良答道：“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责备他），脱身独去，已至军矣。”范增得知刘邦逃脱，将玉斗当场击碎，怒言：“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项伯与张良对视微笑，徐徐引退。

鸿门宴后，项羽分封诸侯，将巴蜀和汉中封与刘邦。刘邦部下多以为不平，而张良却劝刘邦隐忍以成大事：利用巴蜀物富民丰之利，暂避混乱局面，静观其变。刘邦听从张良之计，入蜀后烧掉栈道以示自己并无野心，迷惑项羽；并依靠韩信，争取英布，联络彭越，以图一统天下的大业。为使刘邦完成统一大业，张良可谓是鞠躬尽力了。

公元前204年，刘邦于荥阳阻击项羽。谋士郦食其让他分封六国后裔，以解燃眉之急。张良赶到，劝阻道：如果现在分封六国旧王，将士们就会离您而去，各归旧主，如此等于自取灭亡。刘邦急忙追回印绶，避免了一场灾难。

第二年，韩信破齐，在酒席间要求刘邦封他为假王。刘邦怒

欲斥之，多亏张良脚下暗示。刘邦会意，转开话题说：大丈夫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啊！遂命张良将齐王印绶给韩信，并劝他出兵夹攻项羽，果收奇效。后来，项羽无力再战，提出与刘邦划江为界，中分天下。张良建议他撕毁协议，趁楚兵疲乏追杀到底，终于迫使西楚霸王乌江自刎。

西汉王朝建立后，张良深知刘邦为人，只要了一个贫瘠地区做食邑，并称病，专心地整理注释春秋战国以来的一百八十二家兵书，将其删定编册，不再出面过问政事。

## 陈 平

陈平（？～公元前178年），生于阳武户牖乡（河南省原阳东南），出身寒微。陈胜、吴广起义，天下大乱，投奔魏玉咎，未被重用。又投奔项羽，不和，又逃出投靠汉高祖刘邦。刘邦与之谈，即信任有加，成为刘邦重要谋士，献奇计，除危机，助刘邦统一天下。刘邦死，吕后专权，汉处多事之秋，丞相陈平圆滑应变，曲意迎承，稳住汉室统治。内心里却深谋韬晦。吕后一死，陈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诛戮吕氏族人，恢复刘氏天下，延续汉朝统治。

公元前205年，刘邦占领关中，率五十万大军袭击项羽根据地彭城，遭项羽反击，吃了败仗，刘邦逃到荥阳，整顿败兵，重新布阵。项羽发兵袭击固守荥阳的汉军粮草。刘邦在不得已情况下，请割让荥阳以东之地向项羽求和，遭项羽拒绝。陈平献计说，项羽性多疑，请大王给我几万两黄金，我愿为大王行反间计，离间项羽君臣，等他们君臣反目，再发兵破楚。刘邦依其计，交给陈平四万金，说：“你就全权处理吧。”陈平用这些金钱在楚军中收买间谍，散布谣言，说“钟离昧等大将为项羽立下大功，却没有得到封地，就串通汉王刘邦，准备内外联合消灭项羽，以便分得领地，各自称王。”没多久，项羽果然对钟离昧等大将起了疑心。

项羽派使者到汉营，陈平款待。命侍者准备了招待君王的盛宴，待到楚使进来，他却故作惊奇地说：“我以为是亚父（范增）派来的人呢，原来却是项羽派来的。”说着，命人另外备一份很粗劣的酒食，故意怠慢来使。

使者受到羞辱，非常恼怒，回去后，把陈平的话和如何慢待他们如实报告项羽。项羽疑心顿生，剥夺亚父权柄，拒绝听他的意见。亚父一怒之下回了家乡，一路上悲愤交加，背上毒疮发作死于途中。

亚父是一个谋略很高超的人，一直替项羽运筹帷幄，多次以奇计使高祖走投无路。亚父，是项羽感激范增的智谋大功而给他的尊称。陈平反间计成功，范增被赶走。这时，楚王项羽把汉王刘邦围困在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情况万分危急。夜里，陈平集中荥阳城中两千多妇女和儿童冒充汉军，大开东门，汉军在后，楚军涌向东门，刘邦趁机从西门逃走了。刘邦逃出，重整旗鼓，再集兵力，而项羽失了智囊，从此后被迫转攻为守了。

公元前202年，刘邦正式登上帝位。陈平被封为曲逆侯，以奇计谋略协助高祖平定叛乱。公元前201年（汉高帝六年），有人报告说韩信谋反。诸将请赶快发兵捉拿韩信。刘邦问计于陈平。陈平问：“陛下的精锐部队与楚国比谁更强？”刘邦说兵力略逊于楚（刘邦立韩信为齐王，后徙为楚王）。陈平又问：“陛下的将领用兵之才有超过韩信的么？”刘邦说：“没有谁能赶得上。”陈平说：“军队不如楚国精锐，将领不如韩信，而要发兵攻打韩信，这就会促使韩信起兵反抗，这对您是很危险的。”刘邦问陈平怎么办，陈平献计说：“南方有云梦泽，您假装巡游云梦，在陈县（今河南淮阳县）会见诸侯。陈县在楚国西部边界，韩信听说您巡狩云梦，一片平安和好之意，必然以为不会有什么变故而到郊外迎接您。等他拜谒您时，您乘机抓住他，这只需要一个力士就能办到。”高祖依陈平计，派使者通告诸侯到陈县聚会，“皇上将游云梦”。然后起驾。还没到陈县，楚王韩信果然在郊外大路上迎接。高祖预先有了安排，韩信一到，立即把他捆绑起来，带回洛阳。

公元前202年，陈平随高祖率军进攻匈奴。军至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为匈奴冒顿单于四十万精兵包围在白登山。救

兵难至，粮草不继。高祖危在旦夕，忙向陈平问计。陈平让人画了一张美人图，派秘使送给冒顿妻子阼氏，对她说：“汉朝这样的美人很多，我们想挑选一个最美的献给冒顿，求他解白登之围。”阼氏知道冒顿得到新美人自己就会失宠，如果放刘邦一条生路，就可排除自己失宠的危险。于是就去劝谏冒顿，说：“与汉近邻，为何要你死我活地征战。就算这次胜了，也无法久居汉朝领地。何况以后不一定会胜呢？”冒顿正在犹豫之中，听了阼氏建议，就网开一面，高祖乘大雾脱离了包围。

孝惠帝死后，吕后执政，她首先想的是如何扩张吕氏势力，打算把族人封为各地的王侯，吕后问右丞相王陵，王陵说：“高祖曾杀白马盟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所以绝不可分封吕氏子弟为王。”吕后很不高兴。又问陈平和太尉周勃，两人却欣然同意说：“以前高祖君临天下，分封刘氏子弟为王，现在太后既然称制，分封吕氏子弟为王，当然也行。”吕后听了非常高兴。王陵退朝后责备陈平和周勃，说：“高祖盟誓，你们俩都在，现在高祖刚刚驾崩，太后就背约封吕氏子弟，你们却一致同意，是何居心？有何面目对地下高祖？”二人笑说：“直言进谏，我们不如阁下；安定汉室，延续刘氏政权，阁下就不如我们了。”吕后不能容忍王陵和她唱反调，就假意提升王陵为皇帝太傅。太傅官位居三公之上而无实权，王陵此次徙官实是明升暗降，被夺了相权。王陵大怒，借口有病而辞职，闭门不出，后郁郁而死。

赶走王陵，吕后就提拔陈平为右丞相。左丞相是吕后心腹审食其。此人与吕后狼狈为奸，掌握了实权。陈平知此内幕，只尸位素餐，应付差事。

樊哙是吕后的妹夫。高祖病危时，有人毁谤说他勾结吕后，等刘邦去世后夺权。这时樊哙正率军攻燕。刘邦听到传言大怒，派陈平送绛侯周勃取代樊哙去统率军队，并将樊哙就地斩首。陈平知道吕后的为人，没有将樊哙斩首，而是把他逮捕之后，送到长安，这时，高祖已经死了。吕后果然释放了樊哙，并恢复了爵位和食邑。樊哙的妻

子吕须（吕后妹）对这件事一直怀恨在心，多次在吕后面前说陈平的坏话：“陈平身为丞相却不理正事，每天饮酒作乐，玩弄妇女。”陈平听说了，反而将计就计，更加沉湎酒色。吕后本来就不愿意让陈平多管朝中之事，以便自己独断专行，听了妹妹的谗言，反而正中下怀，暗暗高兴，心想：不用担心陈平了，吕氏天下可稳如泰山了。后来她又当着吕须的面对陈平说：“俗话说：‘妇女娃娃的话不可信，就看你对我怎么样了，不要怕吕须说坏话。’”

从此，吕后就更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大封吕氏子弟为王，陈平也假装同意，唯唯诺诺。公元前180年，吕后一死，陈平就和太尉周勃合谋，诛灭吕氏家族，拥立代王为孝文皇帝，恢复刘氏天下。陈平表面迎合吕后，内心老谋深算，暗中布置，一俟时机到来，就立即行动，一举成功。陈平一生，阴谋阳谋都擅长，又通“黄老之术”，当丞相10年，处世有方，不但使汉室统治不倒，自己也被后人誉为贤相。

## 晁错

晁错，西汉颍川（今河南禹县）人。著名政治家，在经济思想上主张“重农抑商”，对当时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

晁错少年时非常聪明，随当时大学者张恢学习申不害和商鞅的法家学说，领悟颇深。汉孝文帝时，朝廷中竟然没有一个研究《尚书》的人。《尚书》是一部治世经典，汉孝文帝为此耿耿于怀。后来皇帝听说济南有一隐士，姓秦，潜心钻研《尚书》近90年，便想召他入朝，但年龄太大，根本不可能入朝为官。无奈之下，皇帝令太常派人前去学习他的研究成果。晁错当时正在太常府中任职，因其才华被太常看中，于是得以亲赴济南学习秦隐士的研究成果。不久，晁错学成归来，在汇报学习成果时，竟能学以致用，根据《尚书》中的典故，联系当时的社会实际，提出了许多有利于治理国家的经济方案。皇帝非常高兴，马上任命晁错为太子舍人，也就是太子的老师。口才极佳的晁错显然很胜任这个位置。不久就赢得了太子的宠幸，并被太子称为“智囊”。不过这时的晁错并未对国家发挥多大作用。他好几次上书孝文帝，提出自己对政治经济制度改革的一些想法，孝文帝都没有听从。虽然被提升为中大夫，但晁错仍感到被冷落。而由于太子的极力称赏，晁错不免与其他大臣逐渐形成隔阂。如当时的袁盎等，与晁错的关系都不融洽。

太子即位后，即历史上有名的汉景帝，晁错得以风光无限，立即被重用为内史。凡有所奏议，皇上无不言听计从，一时权倾朝野，许多法令都根据晁错的意见作了修改。当时的宰相对此深怀不满，但却无能为力。有一次，晁错觉得自己的内史府位于太

庙墙外的空地上，每每从东门出入非常不便，就让人将太庙外的围墙打了一个洞出行。丞相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大为震怒，准备以此为借口奏请皇上，杀掉晁错。但消息灵通的晁错听到这个消息后，竟连夜求见皇上，将事情的前因后果仔细地先向皇帝禀报过了，并得到了皇帝的理解。因此，第二天丞相准备向皇帝告状时，皇帝轻描淡写地说：“这只不过是凿了围墙，不是庙墙，因此，不算犯法。”丞相无可奈何，回来后冲属下大发雷霆：“早知道这家伙恶人先告状，还不如把他先斩后奏了呢。”这件事对丞相是个致命的打击，不久他因心情郁闷而一病不起。朝廷中少了一个重要的对手，晁错的地位越来越显赫了。

很快晁错得任御史大夫，开始力主募边实民，削夺诸侯封地，并以此巩固中央集权。皇上召集诸位大臣商量此事时，由于大家知道这个提议是晁错提出来的，竟然几乎没有人敢提出异议。不久，晁错很快制定了关于此事的三十章法令，一时诸侯哗然，仇恨晁错之心大盛。晁错的父亲听到消息后还专程从颍川赶来劝说晁错：“你为朝廷办事，为什要得罪这么多人呢？”晁错不听，说：“如果不这样，中央的权力就得不到保障，皇帝又岂能安宁？”晁错的父亲仰天长叹，回去后马上服毒自杀了，因为他预料到晁错必死无疑。半个月后，皇帝迫于压力，不得不将晁错斩首。但晁错死的时候穿的仍是朝服，可见汉景帝对晁错的宠爱并未改变。

这次叛乱当然不仅仅是为了“诛晁错”，最后皇帝仍不得不派兵镇压。皇帝后来也认识到晁错所为实为国家着想，不禁大为悔恨，但为时已晚。汉朝经此一乱，国力渐衰。后来司马迁写《史记》时，专有一章写晁错事迹，由此亦可见晁错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 周亚夫

周亚夫（？～公元前143年），沛人，绛侯周勃次子。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即已任河内郡守；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受封条侯，“续绛侯后”。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匈奴大入边，烽火直通长安，亚夫受命以河内守为将军屯细柳，与将军刘礼、徐厉共卫京畿。周亚夫营纪律严明、制度整肃。汉文帝极为赞赏，拜为中尉。

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王濞与楚、赵、胶东、胶西、菑川、济南等七王举兵叛乱，直抵长安。景帝以周亚夫为太尉，率兵平定叛乱，仅三个月，七国皆平，七王或被杀或自杀。

这次平叛战争，关系到汉室的巩固、发展，及汉王朝的统一，也关系到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贯彻。对汉及其以后的王朝均有极大的影响。周亚夫以大致相当的兵力，一击而胜，成为汉代的名将。

刘邦翦除异姓诸王后，曾与诸大臣立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大封刘氏子弟为王。他以为凭血缘关系，可以避免王室孤立，期能共保汉室。殊不知权位之争并无亲疏之别，子杀父，弟杀兄，屡见不鲜。大封同姓诸王，恰恰种下了吴楚七国之乱的祸根。经过铲除吕后和外戚诸吕之乱，同姓诸王的权势更为显赫。他们“跨州兼郡，连城数十”，控制着南北各地大片地域。汉室直辖地区仅十五郡，而诸侯王的封地竟达三十九郡。各诸侯国可自置除丞相以外的官吏，掌握着地方的财政、军事大权。吴楚七国都在山东、江淮富庶地区，他们的经济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积累，经济力量最强的吴国所铸的钱币流通全国。

文帝时著名的政治家贾谊、晁错等不断上疏，指出当时“天下之势，方病大肿，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已形成尾大不掉的危险局面；并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和“削其支郡”等削藩建议。文帝、景帝先后采纳这一建议，于是汉室中央与吴、楚等诸侯王之间削藩和反削藩的矛盾，成为当时突出的矛盾。

吴王刘濞是汉高祖刘邦的侄子，辈份最高、封地最广，辖有扬州、会稽、豫章等郡，都城在广陵（江苏扬州），广产盐铁，财力富足，早有觊觎帝位的野心。随着经济的发展、军力的扩充和中央削藩政策的推行，暗中串通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胶东王雄渠、菑川王贤、济南王辟光，以诛晁错为借口，于汉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起兵发动叛乱。吴王刘濞亲自率吴军二十万人，从广陵出发，北渡淮河，会合楚兵，号称精兵五十万，要“匡正天下以安高庙”，锋芒直指长安。

梁国是文帝次子刘武的封地，辖四十余城，首当吴楚大军之冲。正月，棘壁（河南永城西北）一战梁军数万被歼，吴楚军乘胜西进，围攻梁都睢阳（河南商丘南）。

景帝初闻七国反时，为吴相袁盎所误，以为“急斩错以谢吴，吴可罢”，错杀了晁错。刘濞叛乱的目的是夺取皇位，岂是为一晁错。刘濞拒见汉使，围攻睢阳如故，景帝这才决心平叛，以周亚夫为太尉，率三十六将军击吴楚军，命郿寄、栾布率军击赵、齐，以宿将窦婴为大将军，率军屯荥阳以支援各方。

周亚夫受命击吴楚时，向汉景帝建议说：“楚兵剽轻，难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食道，乃可制也”。这就是他的战略方针。在景帝同意后，他采取了下述措施：

周亚夫受命后，立即令各军到荥阳集中，自己准备走直道经轘山、浞池、洛阳去荥阳。有名赵涉者拦车献策说：“吴王素富，怀辑死士久矣。此知将军且行，必置间人（指深入敌后的伏兵）于轘（轘山、浞池间的险路）之间。且兵事尚神秘，将军何不

从此右去，走蓝田，出武关，抵洛阳，间不过差一二日，直入武库，击鸣鼓。诸侯闻之，以为将军从天而下也”。周亚夫采纳了这一建议，即改道出武关直指洛阳。搜查穀澠间，果获吴伏兵。赵涉的建议很有见解，吴王派出伏兵刺杀主帅，假如得逞，将造成后方紊乱，会破坏汉军计划，有利于吴楚军鼓舞士气和迅速西进；而汉军若能迅速地按计划集中荥阳，则可表明景帝平叛决心大，汉军素质好，可收先声夺人之效，对其他各有打算的叛王，也可以起到使其犹豫徘徊的作用。

周亚夫“会兵荥阳”，是很有战略眼光的。荥阳是中原的战略要冲，系兵家必争之地。荥阳以西，北有黄河，南有嵩山，中有穀澠之险，是豫西、陕、洛的屏障；而荥阳以东则是一马平川，利于汉军车骑行动。汉军迅速顺利地集中荥阳，不仅占有武库兵械，据有敖仓米粮，保证了军队的物质供应，而且也扼制了关中的门户，能确保京师的安全。对固守待援的梁国，也能起到极大的鼓舞作用。更重要的是“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从而加强汉军的战斗力。所以周亚夫到荥阳时高兴地说：“今吾据荥阳，荥阳以东，无足忧者”。

“以梁委吴”是周亚夫战略运用的核心。梁国，“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河南杞县西南），四十余城，多大县”，是人力、物力、财力都较强的大国。梁孝王刘武，是太后的少子，景帝的同母弟，又有宿将韩安国为之辅佐，而梁都睢阳，则是防御设施良好的坚城，易守难攻。吴兵虽众，在刘武与韩安国的坚守之下，必不可能迅速攻下。周亚夫深入分析了梁的地位、战力和作用之后，认为“吴兵锐甚，难与争锋”，即使两军会合，也难以限制吴楚军的行动；但“楚兵轻，不能久”，若“以梁委吴，吴必尽锐攻之”，俟其精锐尽耗坚城之下后，再行进击，必可一战而胜。周亚夫遂决定东据昌邑（山东巨野东），与睢阳成犄角之势。如睢阳尚能守，则坚不出，以待吴楚军力竭自疲；如睢阳危，则挥军南下，直击吴楚军之背；且昌邑在睢阳东

北，向东南进击，就可威胁楚都徐州并切断吴楚军的粮道，使其有后顾之忧。这样，不援而援，委而不弃，以此来消耗吴楚的精锐，使其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确实相当高明。睢阳以南是淮河水系，昌邑之北是黄河和大野泽，睢阳、昌邑地区是无法绕过的，何况羹婴还在荥阳控制有强大的战略预备队，所以周亚夫这招棋一下，吴楚军受制的态势就形成了。

吴楚军知周亚夫已屯昌邑，于是加紧进攻睢阳，刘武多次遣使请援，甚至向景帝告状，周亚夫均毫不动摇，坚壁不出。只派弓高侯等将率轻骑出淮泗口（江苏淮阴市西泗水入淮处）断吴楚军粮道。直至吴楚军攻势顿挫，无法西进，军力大为削弱时，周亚夫才率军南移下邑（安徽碭山），直接威胁吴楚军的退路，但仍坚壁不战。吴楚军西进受挫，退路又受威胁，不得不转攻周亚夫以寻求主力决战。吴楚军虽然数次挑战，周亚夫始终坚壁不出。刘濞企图以声东击西的战法击败汉军，派一部兵力佯攻汉营东南，而以主力精兵暗袭汉营西北。周亚夫识破其谋，采取明防东南，实备西北的方法，迎头痛击，大败吴楚军。这时吴楚军“士卒多饥死叛散”而去，吴楚军不得不引兵退走。周亚夫率精兵乘胜追击，再次大破吴楚军。刘濞逃至江南，被吴越王诱杀，楚王刘戊自杀。其他战场，胶西王及赵王亦自杀。仅三个月时间，吴楚七国之乱皆平。

周亚夫的战略指导思想是制敌机先，即在战略运用上要比敌方棋高一招，一开始就要掌握战争的主动权，逐步将敌逼入困境，尔后击其饥疲，一举破之。

七国叛王联盟，在政治上的共同点是反对削藩，但对汉室中央的军事力量都有所顾忌，且各有打算：有的要推翻汉景帝，夺取全国统治权；有的患扩大地盘，增强力量；有的则只想保住封地，保住军、政、财大权。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开始的形势对全局的发展关系巨大。如叛军旗开得胜，长驱直进，则叛王联盟就会加强，叛王的积极性就会大大增加，甚至原持观望态度的也会

跟着参加。而汉室方面则必然人心惊恐，战区扩大，不仅调动物力、集中兵力增加许多困难，甚至能否稳定战局，控制战事的发展也颇成问题。反之，如果汉室决心果断，汉军集中迅速，叛军行动受挫、受限，则叛王们的观望情绪就会增长，有的甚至可能犹豫、动摇，形势发展会正好与上述相反。

叛军以吴楚合势为主力，由彭城西进，一开始就受到梁国的坚决抗击以致顿兵坚城之下，这正好为实现制敌机先的战略思想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制敌机先酌首先要求，是必须能使汉军迅速集中荥阳，并尽快东进抢占战略要点，使梁国不致孤军作战，以便能利用睢阳坚城消耗疲惫叛军。周亚夫在这一点上完全做到了。

周亚夫的作战指导，是“以梁委吴”，“坚壁不出”，“绝其食道”，击其饥疲。汉军集中荥阳并占了昌邑之后，就已反客为主，能以大致相当的兵力，组织防御战役来完成战略进攻的任务了。这一指导，代价小，平叛快，的确非常巧妙。

梁国棘壁一战，损失数万，吴楚乘胜而进，梁军又败，最后坚守睢阳。周亚夫大军“以梁委吴”，不救睢阳而北走昌邑，在吴楚军加强攻梁、梁王数遣使求救的情况下，仍然坚壁不出。这种作法，从理论上讲很好理解，但实际做起来却非常难。“以梁委吴”，必须委而不弃，恰当地掌握火候。“委”到什么时候呢？要“委”到梁王虽竭尽全力但还能勉强支持的时刻，否则就不能达到最大限度削弱吴楚军的目的。当然，周亚夫还掌握了两张王牌，一张是遣轻骑出淮泗口断吴楚军粮道，一张是向南挺进，直接威胁吴楚军后方，所以心中较有把握。但梁王在围城内的感受就完全不同了，万一吴楚军突入，就要城破身亡，因而一再请援。周亚夫顶住了梁王的求援已很不容易，更何况梁王上诉景帝，请下诏出援，景帝也果然下了诏，周亚夫竟“不奉诏，坚壁不出”，这就非常难能可贵了。梁王是景帝的亲弟，太后的爱子，万一睢阳失守，梁王有失，周亚夫是要被杀头的。他能不考虑个

人的安危，坚持自己的作战指导方针不变，这在封建时代的确是罕见的。仅此一例，就可以看出周亚夫指挥的坚定了。

文帝后六年（公元前158年）冬，匈奴大举入边，三万骑入上郡（陕西榆林南），三万骑入云中（内蒙呼和浩特西南），烽火直达长安。汉文帝除派军防守狐（河北蔚县东南）、句注（山西代县西北）、北地（甘肃庆阳西北）外，令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军屯细柳（陕西长安西北），宗正刘礼为将军屯霸上（陕西长安东），祝兹侯徐厉为将军屯棘门（陕西长安北），以保卫长安。文帝亲自劳军，至霸上及棘门时，直驰入营，将军以下均下马迎送。及至细柳军，军士披甲执锐，弓弩持满，戒备森严。文帝先遣官员到时，不得入，宣称“天子且至！”而军门都尉却说：“军中闻将军之令，不闻天子之诏。”不久，汉文帝到达，亦不得入。于是遣使持节诏将军：“吾欲劳军。”周亚夫这才传令开营门。营门军士又对随驾车骑说：“将军约：军中不得驰驱。”汉文帝只得按辔徐行。至营内时，周亚夫身戴兵器作揖说：“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文帝深为感动，立即改容俯身就轼，表示敬意，并使人称谢说：“皇帝敬劳将军。”礼成而去。出营门后“群臣皆惊”。汉文帝说：“嗟呼，此真将军矣！曩者（以前）霸上，棘门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乃任周亚夫为中尉。文帝临终前，戒太子说：“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文帝死后，周亚夫被任为车骑将军。

周亚夫平七国之乱，有大功于汉，五年后拜为丞相，景帝甚为器重。但梁王刘武对周亚夫坚壁不救，一直耿耿于怀，每入朝，常在太后面前说周亚夫的短处。窦太后要封皇后兄王信为侯，丞相周亚夫上言：“高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信虽皇后兄，阮功，侯之，非约也。”汉景帝“默然而沮。”以后匈奴王徐卢等五人降汉，景帝又想封其为侯以劝后来者，又遭周亚夫反对，景帝不听，并免其丞相职。不久，景帝于禁中召周亚夫赐食，“独置大胾（zì，大块

肉)，无切肉，又不置箸（筷）。”周亚夫心中不平，向掌膳者索箸，景帝笑着说：“这还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吗？”周亚夫免冠谢罪而出，景帝目送之说：“此鞅鞅，非少主臣也！”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景帝对周亚夫的功高位重是深为忌惮的。当强敌压境、七国叛乱时，文帝、景帝都能十分明智的理解军令军威对战胜敌人的重要性，但危机过去，时过境迁，涉及皇亲国戚的利益，特别是太子年幼，深恐大权旁落时，倚重就变为猜忌了。这种情况在封建时代是司空见惯的。以后，周亚夫的儿子，被人告为“欲反”，事情牵连周亚夫，被“召诣廷尉”，周亚夫自知不免，不食五日，呕血而死。但周亚夫平吴楚七国之乱，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他细柳屯兵治军严谨，虽皇帝亲临也坚持照章办事是历来传为美谈的。

从军事学术的角度看，周亚夫在战略战术的运用上，都有一定的成就。首先，他能在全面分析敌我兵力对比和各自特点的基础上，力争制敌机先，处处掌握主动，使整个战争进程，都在自己驾驭之下，这在古代战争史上，并不太多。其次，“以梁委吴”的作战指导，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胜利，也颇有创新精神。至于以战役防御为主要手段，去完成战略进攻任务，更是古代战争史上少有的战例。

## 刘 彻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前87年），西汉皇帝，在位50多年（公元前140～前87年）。在他执政期间，政治思想上实行了尊崇儒术的封建文化专制政策；进一步强化了封建的中央集权制，沉重打击了地方割据势力，加强了地主阶级的专政机构；促进了多民族封建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汉武帝所推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改革，在历史上产生了较大的深远的影响。西汉中期之所以能够达到“盛世之治”，成为当时世界知名的西汉帝国，是与汉武帝的雄才大略、识时济世的改革政策分不开的。

汉武帝即位之前，汉王朝经过高祖、惠帝、文帝、景帝几代经营，已经出现了政治经济上的兴盛局面。年轻的汉武帝，兼具文才大略，又雄心勃勃，力图振兴汉帝国，于是在统治地位稍事巩固以后，便一反汉初“无为而治”的方针，实行“多欲”政策。首当其冲的，便是力求思想上的统一。

西汉是继秦之后建立的封建大一统政权，虽然西汉的建立者汉高祖刘邦在立国之初的政治、经济制度方面，“汉承秦制”，继续加强封建制度，但在思想理论上，却总结了“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天下”的经验教训，根据当时经济形势的要求，提出以主张“无为”的黄老思想作为统治的政治理论。这是因为当时的经济状况十分严重，统治阶级不得不“轻徭薄赋”，减少剥削的数量。但是，实践经验证明，黄老的“无为”思想对加强中央集权是不力的。

到了汉武帝时代，封建经济已经恢复并发展，而由于加强中

中央集权的措施不力，造成中央与地方、汉民族与匈奴贵族、地主和农民等矛盾日益尖锐的状况。再提倡“无为”，就必然会危及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为了加强和巩固封建统一政权，建立一个适应封建统治的理论十分必要。所以，汉武帝一执政，即下了一道诏令，要各地方长官推荐“贤良方正”的学者到长安献计献策。董仲舒的“大一统”理论应运而生了。

董仲舒是西汉大儒。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西汉文帝、景帝时期度过的。据说他自幼养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孔孟书的习惯，特别对儒家经典（春秋），更是细心钻研。在他家房后有个小花园，他三年没进去过一次；号称“三年不窥园”。到了汉景帝时期，董仲舒得到了“专精于述古”的声誉，当上了“博士”。当汉武帝的诏令下达以后，他立即接连给汉武帝上了三道奏章，称为《天人三策》，宣扬他的那一套“天人感应”的理论。

董仲舒认为：“天”是有意志，有目的，能支配宇宙万物的最高主宰。“天”创造了自然和人类，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握有最高权力的人，就是皇帝。“天”和人能感应相通。皇帝受命于“天”。皇帝的意志就是“天”的意志的表现。皇帝按照“天”的意志来统治百姓。“天”常常用灾异符瑞来指导皇帝的行动。自然界日月星辰的运行，四季的变化，国家的兴亡治乱，都是天的意志的表现。甚至人的模样也是“天”按照自己的模样来生成的。他胡说“天”是父亲，地是母亲；“天”有四季，人有四肢；“天”有五行，人有五脏。他就这样硬把“天”和人糅合在一起。他的这套“天人感应”的学说，把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神化了，这就是“君权神授”论。

董仲舒又编造了一套封建的道德观，叫做“三纲五常”。他认为“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阳是尊贵的为主，阴是卑贱的为次。所以，他把君臣、父子、夫妻的关系叫做“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他把这所谓的“三纲”，说成是符合

天意，不可改变的东西。所谓的“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孝悌”、“忠恕”之道，是所谓“仁”的思想的发展。“三纲五常”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是束缚劳动人民精神的绳索。

董仲舒的一系列主张完全是为了适应巩固封建秩序和皇权的需要，因而他的思想和理论为封建统治者所推崇。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建议以儒家思想作为封建国家的统治思想，凡“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即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建议被汉武帝所采纳。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在长安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专门讲授儒家经典《诗》、《书》、《易》、《礼》和《春秋》。“五经”博士有弟子50人，成绩优良者可以做官。“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

汉武帝虽然在思想领域把儒家作为统治思想，但在实际政治上，他是儒法并用，凡有利于巩固其统治者无不采纳，因而后世一些所谓的纯儒评论汉武帝“虽好儒，好其名而不知其实，慕其华而废其质”，是“叶公之好龙”，其实是并不明白作为统治者的汉武帝是需要文武两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所谓“儒术”，其实已经是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学。改造后的儒学把法家尊君抑臣、维护专制集权的内容保留下来，又将阴阳家学说糅杂进来，神化君主权力，鼓吹德刑相间、德主刑辅的统治之术，使儒家学说从先秦儒学中脱胎换骨，成为维护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学说，并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推为正统，延续了两千多年。

## 赵充国

赵充国，字翁孙，陇西郡上邦（今甘肃天水西南）人，生于汉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卒于汉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一生折冲沙场，北抗匈奴，西平氐、羌，为保卫西汉西北部边陲作出了突出贡献，是西汉著名的军事将领和谋略家。他的“以全取胜”、“贵谋贱战”等谋略思想，分化与打击相结合、屯田备边等谋略手段，在当时的边防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对后世也有一定影响。

赵充国生活在西汉国力增强的时代。汉武帝放弃了对匈奴和亲政策，由防御转入大规模反攻，连年对匈奴作战。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赵充国以假司马的身份随从贰师将军李广利攻打匈奴，在水天附近被匈奴大军包围。汉军断粮多日，死伤大半，眼看就要全军覆没。赵充国遂率领百余名壮士杀出重围，李广利随后率部跟出。突围时，赵充国身受20余处创伤，受到汉武帝的召见和赞扬，并被擢用为中郎（皇帝的侍卫官），不久又升任车骑将军长史。

汉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武都郡（治所在今甘肃西和西南）氐族人起兵反汉。昭帝派兵前往镇压。赵充国当时作为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的护军都尉参加了平氐战争，并因功晋升中郎将。此后，赵充国又受命统兵镇守上谷郡（治所在今河北怀来东南），以备匈奴。不久，他被调回京师，出任水衡都尉（主管皇室的池苑及税收、铸钱等事务）。在任此职期间，他几次奉命参加抗击匈奴的作战行动。有一次，他率军击溃来犯的匈奴骑兵，一举擒获匈奴西祁王，因功被封为后将军。同时他还经常参与朝

廷关于如何对付匈奴问题的讨论，提出过一些很有见解的谋略建议。

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匈奴因乌桓发掘其单于的祖坟，以2万名精兵向乌桓发起猛攻。乌桓族是生活在乌桓山地区（今大兴安岭南端）的民族，汉初依附于匈奴，后来随着力量的强大，不断侵扰汉朝边境，并不时与匈奴发生摩擦。大将军大司马霍光感到，匈奴进攻乌桓正是汉朝攻击匈奴的绝好战机，于是向赵充国问计。赵充国说：“乌桓不断侵犯汉朝边塞，现在匈奴进攻乌桓，对汉朝是有利的。另外，匈奴近期很少对我骚扰，汉朝北部边境比较平静。匈奴、乌桓互相攻击，而汉朝乘机发兵进攻匈奴，必然招致他们的反抗。这不是好计策。”霍光不以赵充国的意见为然，又去征询中郎将范明友的意见。范明友认为匈奴可击。于是，朝廷任命范明友为度辽将军，率领2万人进军辽东。匈奴闻讯赶紧罢兵。范明友将兵锋调转乌桓，大张挾伐。结果，此举引起匈奴、乌桓两方对汉朝的仇恨，此后，匈奴南侵更加频繁；朝廷不得不派赵充国到北部边境组织防御。

汉昭帝于公元前74年死后，赵充国以皇朝重臣身份参与了迎立刘询（宣帝）继任皇位的事宜，被敕封为营平侯。

在汉朝忙于皇位继承事宜时，匈奴联合西域的车师，向与西汉保持密切关系的乌孙发动进攻，企图隔绝汉通西域之路。乌孙向汉求救。汉朝决定出兵救援。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汉朝调集20余万人，分六路向匈奴发动进攻。赵充国统领3万余人为其中一路，具体任务是与乌孙合击匈奴于蒲类泽（今新疆巴里坤湖）。因为匈奴闻汉军大出而撤离该地区，他统领的部队仅斩匈奴兵300余人，获牲畜7000余头，并提前撤军回朝。这次大规模远征，是汉武帝开始的对匈奴战争的余波。经过50余年的战争，西汉、匈奴均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感到疲惫已极。宣帝及主要大臣均主张“止兵戈，休士民”。此后，宣帝借重三朝老臣赵充国的威望与经验，派他率精骑4万在北部边境九郡防守

匈奴。匈奴见南扰无隙，只好罢兵向汉求和。汉朝北边遂平静下来。

赵充国最光辉的业绩，是他以 76 岁高龄亲自率军出湟中地区（今青海、甘肃湟水两岸）平定犯汉的羌族武装，此后又在该地区屯田备边。他的军事谋略思想和艺术，也集中体现在这次子羌、备羌斗争中。

湟中地区水草肥美，宜于耕牧。原住该地区的先零羌于汉朝在此设置郡县后西迁青海一带。他们对汉朝不满，希望复返故地，并与匈奴联系，共谋占据河西地区（今河西走廊和湟水地区）。宣帝元康三年（公元前 63 年），先零羌以盟主身份召集甘、青一带各支羌族部落酋长 200 余人，化解昔日仇恨，交换人质，订立盟约，成立联盟。宣帝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召集群臣进行研究。赵充国认为，羌族各部落经常互相攻击，不能团结一致，容易对付。但是匈奴想联合羌族共同对付汉朝，并非一世。这次，羌族可能与匈奴联合起来。因此，应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情况不出赵充国所料。不久，羌族首领派遣使者去向匈奴借兵，企图攻打鄯善、敦煌，以切断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赵充国向宣帝建议，立即派使臣检阅边防部队，作好作战准备，同时去分化羌族各部落，让他们不要化解仇恨。宣帝接受了赵充国的建议，派骑都尉义渠安国出使羌族。义渠安国到陇西后，将 30 多名羌族部落酋长召集在一起，不分善恶，全部杀死，并且纵兵袭击羌族部落，杀死千余人。结果，激化了羌族与汉朝的矛盾。羌族部队攻城池，杀汉吏，打得义渠安国大败而归。

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 61 年），汉宣帝决定出兵征伐羌族，派遣御史大夫丙吉询问赵充国，谁可作统帅。赵充国当时已 76 岁，自荐说：“没有比老臣我更合适的了。”宣帝又遣人问他：“将军估计羌人的情况如何？需要多少兵马对付？”赵充国说：“百闻不如一见。打仗的事很难遥测。我到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北）察看情况后，再将详细的作战地图和用兵计划呈报皇帝。”

赵充国受命后率万余骑兵赶到金城，准备渡过黄河进入羌族武装活动十分活跃的西部都尉府（治所在今青海乐都南）辖区。他用兵一向非常慎重，行军宿营“常以远斥侯（侦察人员）为务，行必为战备，止必为营垒”，“先计而后战”。这次渡黄河，为了防备羌兵在汉军半渡时截击，他派出3支小部队半夜潜渡并连夜在黄河对岸赶修工事。天明时，汉军大部队渡过黄河。这时，羌百余骑兵前来挑衅。赵充国力戒汉军不得轻举妄动。他认为，汉军长途跋涉已很疲惫，而羌兵以逸待劳锐气正盛。如果遇到羌兵游骑就予追杀，那么汉军就不但得不到休整，还会误中敌人诱兵之计。“击虏以殄灭（全歼）为期，小利不足贪”。他派出侦察小队查看进军落都（今青海乐都南）必经的四望峡（今乐都西南）。此处地形险要，羌人只要用一支部队把守，汉军就很难通过。但羌人未在此设防。赵充国遂于晚上引军过四望峡到达落都。赵充国对部下说：“我知道羌人不会用兵了。如果他们在四望峡部署数千人防守，我们哪能进来呢！”随后，他率军进驻西部都尉府驻地龙支（在今乐都南）。

赵充国到达西部都尉府后，经过调查研究制定了以分化瓦解为主，以用兵为辅，争取罕、秆羌，孤立先零羌，集中兵力待机出击，以获取全胜的作战方针。

汉宣帝将辛武贤的建议转给赵充国，让其组织部属研究此建议的可行性。赵充国与长史董通年等研究后认为，辛武贤建议以万余骑兵迂回千里攻击罕、秆，是不实际的。马匹负载30天粮食，再加上衣装武器，就难以追逐了。汉军辛辛苦苦赶去，羌兵会撤退藏匿；继续追击，他们会据险扼守，截断汉军粮道。那样，汉军“必有伤危之忧，为夷狄笑”。因此，赵充国仍坚持团结罕、秆，讨伐先零的主张，认为“先行先零之诛”可以使罕、秆等部落“悔过反善”，这才是“全师保胜安边之策”。

宣帝和朝廷大臣均反对赵充国的意见。他们认为，先零兵强盛，又得到罕、秆的帮助，不先破罕、秆就无法对付先零。宣帝

下诏责备赵充国，同时任命乐成侯许延寿为强弩将军、辛武贤为破羌将军，令他们率军攻罕、秆，速战速决。赵充国收到宣帝责备诏书后认为，将领统兵在外，应从安定国家的目标出发，根据实际情况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于是上书劝告宣帝收回成命，指出：置先零，先击罕，释有罪，诛无辜，引出一个仇敌，造成两处祸害，会巩固羌族联盟。这是得不偿失的军事行动。在赵充国的劝说下，宣帝勉强接受了赵的意见。

赵充国按既定方针先打先零羌。先零羌因为长时间屯聚，松懈麻痹，见到汉朝大军来袭，纷纷弃辎重而逃。赵充国认为，逃跑的先零羌是“穷寇不可迫也。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因此命令部队“徐行驱之”。结果，先零羌逃亡渡湟水时溺死数百，投降及被斩的 500 余人，其余七、八千人平安逃过湟水。罕、秆等部落首领见汉军笃守信义，没有对他们采取军事行动，遂亲自到汉营投诚和好。

湟中捷报传入京城，宣帝下令让破羌将军辛武贤作为赵充国的副手，“急应天时大利，吏士锐气以十二月击先零羌”。这时，先零羌在汉军的政治瓦解和军事打击下，内部出现分歧，已有万余人投降汉军。赵充国判断先零羌必然会衰败，因此想改变策略，罢骑兵，屯田备边。他把此想法写成奏文，尚未呈送宣帝，便接到宣帝进攻的命令。他儿子、中郎将赵印十分担心，派使者劝说其父不要坚持自己的主张，赶快执行皇帝的命令，否则“一旦不合上意，遣绣衣（御史）来责将军，将军自身不能自保，何国家之安？”赵充国听了非常生气，说：“我拼死坚持自己的主张，对皇帝是可以忠言相劝的。”

赵充国毅然向皇帝呈送奏章，阐明为什么罢骑兵，以步兵屯田备边。他说：我所统领的吏士及马牛，月用谷物 19,9630 斛、盐 1693 斛、干草 25,0286 石，全靠内地运输，战事不解决，征税、劳役就不会停止。罢除骑兵，只留下步兵 1,0281 人，月用谷物为 2,7363 斛、盐 308 斛。这些步兵分屯要害处，农耕季节

每人耕作 20 亩田。这样可以益积蓄，省大费。宣帝看过奏章后下诏询问赵充国：罢骑兵以步兵屯田，敌人什么时候可以打败？战争什么时候可以结束？

赵充国第二次呈送奏章，说：帝王用兵，要作好全面准备去争取胜利，因此贵在运用谋略而减少交兵作战。班师罢兵，万人屯田，顺天时，因地利，战争可望在一年内结束。他还陈述了屯田的十二点好处。概括起来说，在军事上，万人屯田以作武备，以逸待劳，“坐得必胜之道”；在政治上，威德并行，既可以分化敌人，又可以减轻国内民众徭役，使“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业”；在经济上，屯田士卒粮食可以自给，“省大费”。总之，屯田内有不花钱之利，外有防御之备，是个不打仗而使敌人自己消亡的计策。宣帝看过第二次奏章后又诏问赵充国：现在先零羌仍不断骚扰边境，怎么才能制止住呢？大秆、小开对汉朝尚有疑虑，他们会不会与先零羌联合起来？

赵充国第三次呈上奏章，说：现在，先零羌精兵不过七、八千人，失地远逃，分散饥冻。罕、耆、莫须等部落力量很弱，且归顺汉朝的人络绎不绝。至于小股流窜的羌兵骚扰边民，这是不能立即阻止的。如果因此而大动干戈，那是“释（放弃）坐胜之道，从乘危之势，往终不见利，空自罢敝（疲惫）”。

赵充国每次呈送奏章，宣帝均召集公卿议论。开始，同意赵充国屯田备边建议的有十分之三；中间，同意的有一半；最后，同意的占十分之八。丞相魏相说：“臣愚，不懂兵事利害。后将军赵充国一再提出军事策略，讲的都是正确的。我相信他的计谋一定能成功。”于是，宣帝批准了赵充国屯田备边计策。

赵充国屯田备边收到了预期效果，稳定了汉朝西部边境局势，加速了先零羌的瓦解。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 60 年）秋天，先零羌首领被其他种族的羌人所杀，残余的先零羌兵 4 千人降汉。先零羌侵扰汉朝边境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西北地区民族矛盾得到缓和，大片荒地得以开发利用。

赵充国凯旋回京后，请求罢去官职，宣帝批准他退休。但朝廷议论民族关系大事时，常让他参与谋略。甘露元年（公元前 52 年），赵充国病逝，终年 86 岁。宣帝因赵充国功高盖世，把他的像画在未央宫内。

## 刘 秀

刘秀，字文叔，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南阳蔡阳百水乡（今湖北省枣阳西南）人。东汉王朝的建立者。

刘秀出身于没落贵族的平民家庭，时值西汉王朝充满危机和社会极度动荡不安的年代。少年时，刘秀曾在家务农，把土地经营得十分出色，即使遭遇大旱之年，他家的田地也有较好的收成。他到长安城里以后，曾和别人合伙做药材买卖，也曾做过粮贩。由于参与多种劳动，他十分了解百姓的生活，知道耕耘的艰难。同时，享受荣华富贵的强烈愿望也时时冲击着刘秀那颗原本平静的心。刘秀不甘心就这样默默无闻的生活下去。多变的社会形势使刘秀感到有机会为自己开拓一条发展的道路，他决定弃农从武。天风年间，刘秀到长安拜中大夫许子威为师，学习《尚书》等典籍，逐步积累文化知识。在这个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刘秀大开眼界，他开始留心政治，凡听到有关朝政事宜便与同屋议论、评说。他才高好学，但有时喜欢游侠斗鸡，所以对社会下层的奸邪和官吏治政也比较熟悉，政治上逐渐成熟起来。

王莽篡夺西汉刘氏政权后，民众在其苛政统治下苦不堪言，反而思恋起西汉时期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活。刘氏皇族利益因政权易主而受到极大损害，作为皇族的庶出后裔，刘秀更是备受歧视。当他捕捉到“民心思汉”的信息后，就开始筹划“复汉”的具体行动。刘秀聚集军队，征战南北。同时义军势力不断增加，特别是王朗的势力迅速崛起，使刘秀一度忧心忡忡。有一次，他摊开地图对心腹邓禹说：“天下郡国这么多，今天我才得到一个，你以前为什么说不必疑虑、定得天下呢？”邓禹回答道：“古时国

家兴盛的原因，关键在于君王德行的厚薄，而不在一时的大小啊！”刘秀听后坚定了统一中国的信心，于是，令邓禹西征，自己亲征燕赵。公元25年，刘秀终于定都洛阳，建立东汉，成为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之后，他更坚定地进行有计划的全面的统一战争。艰苦的战争染白了他的发须，但他始终未曾停息。15年的疆场驰骋，终于奠定了东汉王朝近200年的基业。公元36年，统一战争结束。

但此时，长达二十余年的混乱和战争已使社会经济极度衰微，民不聊生，甚至一斤黄金才能换得一担米。为巩固政权、稳定秩序，刘秀开始致力于战后的国家建设。他实施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得力措施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力，下令释放奴婢、还兵为农，减免赋役、济贫救灾、兴修水利、垦田军屯、整治货币、裁减官员，等等。对外，刘秀采纳了皇太子刘庄和大臣司徒掾、班彪的主张，比较妥善地处理了与南匈奴和北匈奴等少数民族的关系。在光武帝统治期间，东汉周边民族关系日趋平静，为社会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光武帝幼年丧父，长期的平民生活塑造了他勤劳节俭的优秀品质。即使做了一国之君以后，他也始终“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同时也明令禁止地方向朝廷贡献额外物品。当时，曾有外国献上千里名马、千金宝剑，光武帝转而将宝剑赐给了有功骑士，而名马则用来拖拉鼓车。此举既抑制了奢靡之风，又堵塞了地方官求媚之路，从而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为人民做出了节俭的表率。

刘秀的另一个优秀品质就是勤学习、求上进。他毕生喜欢读书，即使在繁忙的战争年代，也会抽空讲诵经书。统一天下后，更是孜孜不倦、博览群书，同时也十分注意从他人处吸取经验教训，虚心接受他人的批评。一次，他出城游猎回来晚了，洛阳城门均已关闭。上东门守卫侯郅恽坚持不开，光武帝只好从东中门入城。次日侯郅恽上书批评他：“昔文王不敢盘于游畋，以万人

为忧。而陛下远猎山林，夜以继昼，其如社稷宗庙何？……”他并未大怒，而是欣然接受批评，并授予嘉奖以示表彰。还有一次，大臣宋弘发现他时常看御座旁的一架美女屏，就当面讽刺他：“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刘秀立即命人撤去屏风，笑道：“闻义则服，可乎？”

光武帝一生勤政节俭，为求汉室长治久安，他维护高度统一的王权，虽稳定了政局，发展了经济，但同时也为以后外戚宦官交替掌权埋下了祸根。公元57年2月戊戌（公历3月29日），光武帝刘秀故去，遗诏薄葬。

## 荀 攸

荀攸（公元157—214年），东汉末曹操谋士，颍川颖阳（今河南许昌西）人，出身于士族家庭。曹操曾说过“二荀令之论人，久而益信，吾没世不忘。”曹操所说“二荀”，一是荀彧，一是荀攸。荀彧任曹操谋臣期间，曾推举过十数名命世大才，荀攸是其中之一。荀攸也以智策显名，成为魏尚书令。攸是彧的侄子，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迎汉献帝都许昌后，政治上处于主动，急于网罗人才，荀彧遂推举荀攸。曹操早就听说过荀攸大名，亲自写信给荀攸。荀攸欣然应命，相见之后，一番交谈，曹操知道他确有大才，甚为高兴。对荀彧说：“公达，非常人也，吾得与之计事，天下当何忧哉！”立即任命为军师，谋划军机大事。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荀攸随曹操征讨南阳张绣。荀攸分析了当时各政治军事势力及其关系，建议曹操：“张绣与荆州刘表联合，互为依靠，势力很强，然而，张绣没有根据地，后勤供应全靠刘表，时间久了，刘表必定供应不起，双方肯定会因此分离。我们不如暂停进攻，待其联盟破坏以后，即可乘张绣困难之机诱使归附。如果现在急着进攻张绣，刘表不会看着我们吃掉张绣而使自己孤立无援，必定会前去救援。两军相合，我则难以取胜。”这本来是一条符合当时局势的上策，以静待变，可以坐收渔利，而曹操却没有采纳。遂于三月进军至穰（今河南省邓县境内），进攻张绣。张绣急忙求救于刘表。五月，刘表果然派兵来援救，直插曹军后卫。曹操被迫撤退。张绣则乘胜追击，直到安众（今河南省南阳市北），曹操前后受敌。曹操后悔没有采纳

荀攸之谋，说：“不听先生之言，落到这步田地。”在此危急之时，又是荀攸扭转了败局，与操出奇计，“夜凿险为地道，悉过辎重，设奇兵。会明，贼谓公为遁也，悉军来追。乃纵奇兵步骑夹攻，大破之。”从此事以后，曹操对荀攸的谋略才华有了更深的认识，对荀攸的计谋，都予以采纳。

同年秋，吕布与袁术串通派高顺攻刘备。夏侯惇救援，连战失利。刘备也被高顺打败。曹操欲亲征吕布，诸将反对说：“刘表、张绣在我们后边，虎视眈眈。此时，远袭吕布，刘表、张绣乘机从我们后边进攻，那是十分危险的。”荀攸认为：“刘表、张绣刚被打败，必不敢轻举妄动。而吕布骁猛，又仗恃袁术，如果在淮、泗之间纵横征伐，豪杰必然响应依附他。如今，我们乘其刚刚起事，众心尚未统一，即刻前往，定能取胜。”曹操对荀攸的分析很赞成，决心征讨吕布。九月东征，十月下彭城，攻至下邳。吕布败退固守。攻之不拔，连攻数次，无济于事，曹军疲惫。曹操无奈，打算退兵。荀攸、郭嘉等谋士随军出征，见下邳久攻不下，而曹操又要退兵，急忙劝说曹操：“吕布有勇无谋，三战皆败，锐气全无。三军以将为主，主衰则军无战心。吕布手下的陈宫虽有谋而迟，现在，吕布士气衰竭，尚未恢复，陈宫的谋划尚未决定，我们应急速进攻，则城可拔，布可擒。”荀攸、郭嘉又献计，决沂、泗（沂水，在今山东省南部和江苏省北部，经今临沂入苏北平原，至下邳西入泗水。泗水，流经江苏沛县东，下邳等地）之水淹下邳。曹兵居高原，坐视水淹下邳。曹操深谙孙武用兵之法。《孙子兵法·行军篇》中指出：“视生处高，无迎水流。”说的就是在江河地带作战，要居高阳，不要逆着水流在敌军下流驻扎或布阵，以防敌方决堤淹我或顺流来攻。荀攸、郭嘉一提出水淹下邳之计，曹操非常高兴。于是决水淹城。一月有余，吕布手下将领宋宪、魏续等兵变，捕缚宫，投降曹操。吕布亲自登白门楼抵抗，曹兵将白门楼团团围住，吕布无奈，只得投降。操命人将吕布缢杀，然后枭首。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袁绍派部将郭图、颜良等进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今河南省滑县东），袁绍引军进至黎阳，准备渡过黄河。刘延惧怕，向曹操求救。四月，曹操北上救援刘延。荀攸献计：“如今敌众我寡，不能力敌。必须分其兵削其势，才能取胜。”让曹操隐蔽救援白马的意图，率军至延津，佯作渡黄河进攻袁绍之后方。袁绍必然分兵西应曹军。这时，再率轻兵袭击白马，出其不意，掩其不备，则白马之围可解，颜良可擒。这一声东击西之计使曹操大喜，依计而行，北上延津。袁绍闻报，果然以为曹军将渡过黄河袭击河北后方，连忙分兵阻截。曹操知袁绍中计，急率军迅速东向直取白马，离白马十几里，颜良才得知，大惊失色，慌忙迎战。曹操派张辽、关羽出阵，将颜良斩于阵上，解白马之围，救了刘延。因白马难以固守，于是迁徙民众，沿黄河而西。袁绍发现上当，赶快渡过黄河追曹军至延津南。曹军驻南阪之下。

曹军扎营，待袁绍迫兵赶来，派哨兵登高观察。有人报告说：“敌方已有五六百骑兵来到。”过了一会儿，又有报告：“骑兵渐多，步兵不可胜数。”曹操说：“不要再报告了。”乃令骑兵解鞍放马。这时，从白马迁出的辎重都还在道上。诸将认为敌兵众多，不如赶快回军护送辎重，保住营寨。荀攸力排众议说：“这正可以饵敌，为什么要离去？”袁绍大将文丑和暂归袁绍的刘备率五六千骑兵一前一后赶到，诸将心急，催促上马。曹操说：“还不到上马的时候。”过了一会儿，敌骑兵越来越多，见了道上的辎重，乱了阵列，一拥而上，抢掠财物。这时，曹操方下令说：“可以上马了。”这不满六百骑兵，一起上马，冲入乱抢财物的敌军，大破之，阵斩文丑。

袁绍死后，小儿子袁尚继位，而长子袁谭则另立门户，互争高低。在曹操进攻袁尚、袁谭之时，二人暂时合力抵抗。后来曹操放弃进攻两袁，佯装进攻刘表，驻军西平。袁尚、袁谭内讧即起，争夺冀州。袁谭失败，退保平原，袁尚则猛攻不止。袁谭危

在旦夕，只好派辛毗向曹操乞降求救。曹操准备答应，征求部下意见。部下都认为刘表势力强盛，应该先平定。而袁尚、袁谭刚刚被我打败，不足为忧。荀攸分析了当时各派力量的情况，认为：“天下正是多事之秋，而刘表坐保长江、汉水之间，没有争夺天下的大志，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袁氏据四州之地，带甲十万。袁绍以宽厚赢得民众，如果他的两个儿子和睦相处，守其已成之大业，那么天下之难就不会休止。他们协力对外，其势必强，将很难征服。现在两兄弟遘恶，势不两立，两军相斗，不能两全。应该乘其乱而取之，则天下可定。此机不可失也。”荀攸提出的乘乱取敌，先平两袁，再图刘表的谋略，使曹操称善。曹操也说刘表是“自守之贼也，宜为后图；谭、尚狡猾，当乘其乱。谭挟诈，不终束手，使我破尚，偏收其地，利自多矣。”肯定了荀攸的谋略。

曹操立即答应袁谭请求，率军进攻袁尚。为了暂时笼络袁谭，还与他结为亲家。袁尚得知曹军来，放弃军原，撤军还邺。建安九年（公元204年）二月，袁尚再度进攻袁谭，留苏由、审配守邺城。曹操率军到达桓水，苏由投降。而后攻邺，决水灌邺，城中饿死者过半。七月，袁尚还救邺城被曹军击败，逃往中山。八月，破邺，杀审配。袁谭被救脱险，乘机略取地盘，击走袁尚，并其兵众。曹操责袁谭背约，与之绝婚，把已嫁出的女子又要回来，然后进军攻谭。可见，曹操当初许婚，不过是权宜之计，目的是为了稳住袁谭。袁谭弃平原，逃到南皮。曹军破城，袁谭被俘斩首，冀州平定。后来，辽东太守公孙康，斩杀袁尚，送其首级给曹操。袁氏势力被彻底扫除。证明了荀攸的谋略是完全正确的。曹操称述荀攸的谋略说：“军师荀攸，自初佐臣，无征不从，前后克敌，皆攸之谋也。”封为陵树亭侯。

荀彧是曹操的第一号谋臣，荀攸仅次之。但荀彧最后却被逼自杀了。荀攸“深密有智防，自从太祖征伐，常谋谟帷幄。”曹操这样称赞荀攸的谋略：“公达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强，

不伐善，无施劳，智可及，愚不可及。”他前后为曹操画奇策十二，算无遗策，经达权变。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死于征战途中。

## 吕 蒙

吕蒙，生于公元178年，卒于公元219年，字子明，三国时汝南富陂（今安徽阜南东）人。十五、六岁，就随其姐夫邓当上阵杀敌，邓当是孙策的将领。邓当死后，孙策令其统帅邓当的部属，拜他为别部司马。孙策死后，跟随孙权征战各地，任横野中郎将。后随周瑜大败曹操于赤壁。鲁肃死后，代替其职，吴军大败关羽，占据荆州。不久病死。

公元200年，孙策遇刺身亡，孙权统领其军。鉴于当时军中有些将领不仅年轻，而且兵力很少，孙权打算予以整编，将这些部队合并，以利于指挥和作战。

吕蒙当时任别部司马。何谓别部司马？吴军当时的建制是，每一将军所属有五部军营，各部设校尉一人，军司马一人。非此五部之别营，其统领为别部司马。也可以说，别部司马的部队，并非主力之军。吕蒙当时年仅22岁，手下兵马也确实不多，毫无疑问，必在被合并之列。

公元208年春，孙权为了夺取“山川形便”的南荆之地，决定再次西征江夏太守黄祖。黄祖是一员老将，虽然当时被认为是“昏耄已甚，财谷并乏，左右贪纵，吏士心怨，舟船战具，顿废不修”，但是在此之前曾两次西征黄祖，均未将其征服。此次，黄祖令都督陈就率水军迎战，孙权命吕蒙为前锋，率军出击。吕蒙勇健无敌，亲手斩杀了陈就。吴军将士乘胜追击，进攻江夏。黄祖听说陈就被杀，弃城而逃，亦被擒杀。孙权听到捷报，兴奋地说：“此战能胜，关键在于吕蒙先斩陈就啊！”遂任吕蒙为横野中郎将。

吕蒙亲斩陈就，不仅显示出其英勇无敌，亦可看出其深识军机。能否战败陈就，乃此次西征成败之关键。吕蒙深知此理，才愈加勇猛拼击。

公元 212 年，曹操又南下进攻孙权。

九月，吕蒙得到曹军欲来的消息后，便立即向孙权建议，在濡须水口立坞，以抗曹军。“夹水立坞，状如偃月。”即：四面高中间凹助一种水中坞堡，可以停泊船只。许多部将都认为大可不必，说：“下船上岸，涉水上船，随时可以击敌，何需再造水坞？”

吕蒙说：“兵器有利时亦又钝时，打仗绝不会百战百胜。万一两军突然遭遇，敌人步骑逼近，我们来不及赶至江边，怎能上得船去？如若造起水坞，便无此患之忧。”

孙权听罢，连声称赞，下令构筑水坞。

十月，曹操领兵向濡须进击，号称步骑 40 万，很快便攻破了吴军的西营。吕蒙随孙权率七万将士抵御，可谓兵力相差悬殊。吴军因有水上坞堡，西营虽陷，仍可固守。曹军攻之月余，吴军亦战船列阵，军伍整肃。曹操叹道：“生子当如孙仲谋（孙权字仲谋）。”他知道濡须水坞难破，只好退还。

曹操对孙权大加赞赏，孙权当然受之无愧。不过，若无吕蒙立坞抗曹之计，吴军七万之兵恐怕难于挡住曹军 40 万之众。

孙权采纳了吕蒙的建议，于公元 214 年闰四月，率兵攻打皖城。攻城之前，孙权召集众将商议攻城之策。诸将主张修筑土山，多备攻城器具，然后强行攻城。吕蒙坚决反对，说，“筑土山，置器具，势必需要很多时日。待我们准备就绪，皖城守敌已经乘机修固了城防，敌人的援军也可能赶来，皖城就难于攻取了。再说，我军乃乘雨季水涨之时驱舟而来，在此时日一久，等水位下降，战舸难行，我们势必退路艰难，岂不危险？我看现在的皖城城池并不坚固，以我军之锐气，四面同时发起猛攻，无需多长时间就能将城攻破，可以赶在水位下降之前收兵而归，这才

是全胜之道。”

孙权当即决定，照此行事。吕蒙又向孙权荐举甘宁担任攻城先锋，自己担任后续部队的主将。待甘宁打开缺口，他便率军入城以战。

甘宁不愧为一员猛将，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手执铁链攀城而上，所向无敌。吕蒙率精兵紧紧跟上，并且亲自擂击战鼓。吴军士气振奋，个个如龙腾虎跃般英勇杀敌。“侵晨进攻，食时破之。”凌晨发起总攻，到吃早饭时便已攻克，实在是神速。这时，曹军急速赶来的援兵已离皖城不远，主将张辽闻城已破，只好退却。

孙权如不采纳吕蒙的意见迅速攻城，待等张辽所率援军赶到，不但攻城艰难，且又腹背受敌；水位若再下降，行舟不便；吴军的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吴军大获全胜，孙权对吕蒙愈加器重，任其为庐江太守，仍驻兵于浔阳。

公元215年，荆州又成了孙权与刘备之间的突出矛盾。赤壁之战后，占据了武陵等四郡的刘备，为了控制整个荆州，便向孙权借了南郡。公元214年，刘备攻占了益州。孙权于是向刘备索要荆州，并向长沙等三郡派了官吏。刘备当然不肯归还荆州，并让镇守荆州的关羽将孙权所派官吏一概赶走。孙权大怒，便派吕蒙率军二万前去攻取长沙等三郡。

吕蒙发兵之前，先给其三郡的太守写了劝降信。长沙、桂阳二郡的太守望风而降，唯有零陵太守郝普守城不降。

刘备闻讯，亲自率五万大军赶到公安，又派关羽率三万人马赶往益阳，想要夺回失去的两郡。孙权针锋相对，亲自进驻陆口，命鲁肃率一万人马进驻益阳，截击关羽。同时飞书急召吕蒙，舍弃零陵，援救鲁肃。

公元217年，鲁肃病死，孙权命吕蒙代替其职，驻守陆口。这样，驻守江东的吕蒙与西蜀的关羽形成了对峙之局。

吕蒙早就看出关羽是骁勇之将，并有吞吴之心，而且军居东吴上游，迟早会发兵进攻东吴。所以，他向孙权秘密献计说，“现在应该让征虏将军守南郡，让潘璋屯兵白帝城，让蒋钦率一万军兵沿江上下巡游，我率军前据襄阳。这样，我们既不必忧惧曹操，亦不必依赖关羽。关羽君臣甚为狡诈，反复无常，不能以诚相待。关羽之所以没有向东进攻我们，那是因主公您的圣明，加上我们这些老将尚在。若不乘我军强壮之时夺回荆州，一旦我们这些人过世，再想夺回荆州恐怕就难上加难了。”

孙权认为他的意见很好。

公元219年，关羽攻打曹军的樊城。吕蒙认为消灭关羽的时机已到，急忙向孙权上疏：“关羽进攻樊城，留守部队却很多，显然是担心我抄其后路。我经常患病，请让我以养病为名回到建业。关羽听说后，必然把留守部队调赴樊城前线。那时，我军就可沿江昼夜急进，偷袭其空虚之后方，则南郡可破而关羽可擒！”于是，吕蒙便伪称有病。孙权公开发布命令将他调回。

吕蒙经过芜湖，定威校崩陆逊对吕蒙说：“关羽之军临近我方边境，您怎么能远走，难道不担心边境挡不住进犯吗？”吕蒙说：“您说的很有道理，可惜我有病呀。”陆逊又说：“关羽自恃骁勇，从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他现在兵攻樊城，没发现我军有抄其后路之意；如今又听说您患病而远去，必然后方防守空虚。我军若攻其不备，必能获胜。您见到主公，应商此大计。”吕蒙一听，正合他意，不禁心中暗喜。但军机大事不可稍泄，他说：“关羽素来英勇凶猛。本来就很难对付，况且现在又占据荆州，想要打败关羽是很不容易啊。”话虽这么说，但对陆逊的深识用兵之道，吕蒙却非常欣赏。回到京都，孙权问他：“谁可以代替您驻守陆口呢？”吕蒙毫无迟疑地说：“陆逊遇事善于深谋远虑，他能担当重任。况且他在外面名声不大，关羽势必不会对其顾忌。若任用他，应该命令他外隐其韬略，内察其形势变化，然后可击败关羽。”

于是，孙权召见陆逊，拜其为偏将军、右部督都，代替吕蒙驻守陆口。陆逊到了陆口以后，便给关羽写去一信，盛赞其功高德美，深感自己才疏学浅，请多加指教。关羽接到信后，知道吕蒙已经真的患病回归，替换的是个没有经验的青年将领，也就认为大可不必疑虑重重了，便把一部分守兵调往樊城前线。

驻守江陵、公安的关羽部将麋芳、傅士仁，平素就嫌关羽轻视自己，再加上关羽出兵樊城后，他们供应物资不及时，关羽曾说：“回来以后，一定惩治。”所以，他们都很恐惧。吕蒙利用这个矛盾，令故骑都尉虞翻给傅士仁写信，向其讲明成败利害。傅士仁投降。麋芳随后亦降。

吕蒙占据江陵后，对于关羽及其将士家属，全部给以抚慰。并且命令全军，严禁擅入民宅，不得向居民有所掠取。吕蒙手下有个士兵，与吕蒙是同乡，拿了居民的一个斗笠遮盖官家的铠甲。吕蒙见其违反了军令，没以乡亲之情而废军法，挥泪将其斩首。军中惊骇，无人再敢索取百姓的东西，真可谓秋毫无犯，路不拾遗。江陵虽然新占，但却十分安定。

不久，孙权又到了江陵，关羽不敢回夺江陵，只好退保麦城。孙权诱逼关羽投降，关羽一面伪称投降，一面带着十几个骑兵逃遁。途中被吴军的伏兵擒获，不降，被斩。随即，荆州各郡全被东吴占据。

大败关羽，关键在于吕蒙伪称有病而使其不备，白衣渡江而使其无防，进城安民而使其军心涣散，每一步都显示出吕蒙棋高关羽一招！

不久，吕蒙旧病复发，不愈而逝。时年 42 岁。

## 诸葛亮

诸葛亮（公元 181 ~ 234 年），字孔明，东汉徐州琅琊郡阳都县（山东沂南）人。

他少怀大志，虽隐居隆中（湖北襄樊北）躬耕于陇亩之间，却博览群书，关心天下大事，他常以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将相管仲、乐毅自比，可见其抱负所在。

诸葛亮自二十七岁起辅佐刘备创立基业，后为蜀国丞相，直至五十四岁病死军中。近三十年期间，他一直是三国中左右局势、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历史作用仅次于曹操、孙权和刘备，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的卓越政治家，也是我国军事史上的杰出的军事战略家。

东汉末年，封建王朝在黄巾起义的冲击下已是摇摇欲坠，豪强地主，富室军阀纷纷割据一方，互相攻伐，混战不止。建安十二年（公元 207 年）怀有雄心大志但屡遭挫败的刘备在荆州新野地区聚集兵马，寻访人才。在名士徐庶的推荐下，刘备“三顾茅庐”，恳请诸葛亮出来相辅。诸葛亮对刘备提出了著名的，后人称为“隆中对”（也叫草庐对）的战略。

诸葛亮首先概述天下纷争之势：“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指出：自汉室日渐衰微，群雄起而相争以来，曹操击破袁绍，平定北方，挟制天子，号令诸侯，已拥有百万之众，成为势力最强者；孙权继承父兄之业，占据江东，其地势险要，民众归附，又有贤能之士辅佐，可以为援而不可相图。

刘备以匡扶汉室为志，自然与曹操势不两立。只因曹操过于

强大，暂时无法相争。而孙权虽不及曹操强盛，但其江东基业已成，不能与其为敌，只可结盟为友。诸葛亮在这里已确立了孙刘联合共抗曹操的战略格局，这一联合抗曹的战略格局是刘备利用曹、吴矛盾，争取自身生存的关键所在。此后能否恰当地处理三方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保持已经确立的战略格局，始终影响着刘备集团的兴衰存亡。

诸葛亮接着分析了荆、益二州的地理位置：“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位于南北要冲，交通便利，是用武之地，而其主刘表无力据守；“益州险塞、沃野千里”称为“天府之国”，汉高祖刘邦据此而成帝王之业。其主刘璋和北面汉中的张鲁昏庸软弱，那里的智士能人愿求明主。

诸葛亮选择荆州、益州为刘备攻取的战略目标是在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地理、人物等各方面的因素之后做出的综合决策。以形势论，曹操和孙权所控制的中原及江南地区都是刘备无法与其争夺的。但荆、益二州却是曹操、孙权尚未抢到手而相对空虚的。以地理论，荆州连接四方易于向外扩展；益州土地肥沃便于建立基业；若将荆、益二州连成一片，进可乘势相攻，退可据险自守，足以与曹操、孙权相抗衡。以人物论，荆州之主刘表徒有虚名，益州之主刘璋，昏庸无能，汉中之主张鲁也难成气候，正是夺取其地的天赐良机。

诸葛亮最后说：“将军既帝室之胄……汉室可兴矣”。指出：刘备有忠义之名，又求贤若渴，如能占据荆、益二州，安抚民众，励精图治，并与孙权结为联盟，待天下有变时，则以荆、益两路人马，兵分两路进取中原。

诸葛亮提出的这个战略规划是要刘备在曹操占天时，孙权居地利的形势下，充分发挥“人和”的长处，聚拢贤才，夺取荆益，内修民政，外结孙权，等待时机统一天下。

诸葛亮的“隆中对”是一个具有初步战略体系的决策系统。有人认为诸葛亮的“隆中对”重益轻荆，导致了后来蜀国失去荆

州拘于一隅而不能进争中原的局面。实际上，“隆中对”作为一个预测型的大决策系统，具有相当的“模糊性”，不可能是非常精确的。从后来的战争进程看，应该说“隆中对”是当时刘备所能选择的最佳决策系统，是基本符合客观现实的。

对于实现这一战略体系的最终目标——复兴汉室，统一天下，“隆中对”规定了三个基本条件：一是联合孙吴，共抗曹魏；二是拥有荆、益二州及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实力；三是“天下有变”的可乘之机，这三者缺一不可。而在整个三国时期，刘备集团从未同时具备过这三个基本条件。因此说刘备集团有夺取中原，统一天下的可能只是一种空想。至于荆、益二州孰轻孰重，谁正谁奇，只能待取得二州后再依势而决，因机而变，又怎可预先据此判定蜀汉一国的终局。

“隆中对”作为一个战略决策系统，充分显示出诸葛亮的远见卓识，在我国战略发展史上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诸葛亮出任刘备的军师不久，曹操即率大军攻取荆州，准备渡江灭吴。刘备败退到夏口，处境危急，诸葛亮前往东呈与周瑜、鲁肃一起，说服孙权结成联盟，合力抗曹。在著名的赤壁之战中，孙刘联军击败了曹军。随后在诸葛亮的辅佐下，刘备取得了东吴的谅解，趁势攻取了荆州，接着又利用刘璋借兵之机，进军益州。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取得益州。至此，刘备集团从“失众势寡无立锥之地”发展到雄据荆益，虎视中原与曹魏、孙吴相鼎立，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诸葛亮的隆中决策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是三国时期极为重要的一年，其风云变幻之莫测，形势转化之急速，都是令人惊诧不已的。试看：正月，刘备率军进逼定军山，老将黄忠力斩曹军大将夏侯渊，迫使曹操放弃汉中。七月，关羽领兵围攻襄、樊，水淹七军，“威震华夏”，曹操甚至曾想“迁都”，以避其锋。

其时蜀汉大有西迫长安，东进许昌，扫荡中原，复兴汉室之

势。但正当樊城危在旦夕之际，东吴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关羽腹背受敌，仓促回防，已然为时过晚，终于败走麦城，被擒而死。荆州为东吴所占。

益州之军出秦川，荆州之兵向宛洛确是诸葛亮“隆中对”提出的战略规划，可这应在“外结孙权，内修政理”的基础上实施。刘备攻取益州后，诸葛亮在“安民治蜀，足食足兵”方面很有成效。但对于荆州方面的处理却疏而不当，隐患极深。荆州为兵家必争之地，魏、蜀、吴三方对此都很清楚。孙权曾听从鲁肃“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的主张，将荆州的南郡“借”与刘备，是希图刘备为东吴抵御曹操。后见刘备取得益州，已自成一方之势，孙权便要索回荆州。当“结吴为援”与“占据荆州”这两个隆中对策所要求的基本条件相互冲突起来时，如何使二者兼容并存，是刘备能否实现其进取中原这一最终目标的关键环节。由于存在着抗拒曹操这个共同点，而且东吴的主将鲁肃（其时周瑜已死，由鲁肃代之）也是极力主张联合的。所以如果处理得当，筹划巧妙，那么以共抗曹操来转化孙刘之间的矛盾，保住荆州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但刘备诸葛亮却未能把握住这个关键环节，竟以取得凉州后再还荆州为借口拒绝了孙权的要求。同时驻守荆州的关羽对东吴的态度也十分恶劣，使得孙刘两家由相联变为相争。而对于战略格局的这种重大变化，刘备及诸葛亮又没有应变之策。等到孙权派吕蒙收降了长沙、桂阳、零陵三郡。刘备及诸葛亮方才急忙率兵东下，欲与东吴争夺荆州，然而已是“当斯之时，进退狼跋”。后果然因为曹操进军汉中，刘备及诸葛亮恐益州有失，只得与孙权平分荆州。此后，孙权仍一直想将荆州全部夺回，刘备及诸葛亮也并非不知，但仍未予以应有的重视。反而在孙权伺机进兵，荆州地位未稳的情况下，让关羽攻打襄樊，犯了兵家的大忌。此是刘备之意？诸葛亮之谋？或是关羽自作主张？史无记载。

刘备在失去荆州后，决意东征伐吴。孙权遣使求和，刘备不

允，结果在夷陵被吴将陆逊火烧连营，大败而回。蜀国自此元气大伤，刘备也一病不起。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刘备临终前，在白帝城将嗣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望他能辅佐刘禅完成大业。

刘备取得益州后，未能抚慰东吴，将其战略矛头引向曹操，同时对荆州的防务重视不够，留守兵力不足，先失三郡，后又轻率出兵攻曹，导致荆州失守，已是大错。接着刘备又率军伐吴，从根本上破坏了联吴抗魏的战略格局，更是错上加错。诸葛亮先没有补荆州之失，后未能阻东征之举，（史书上仅说他在伐吴失败后曾叹息：“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其间自有许多客观因素在内，或是违背他的本意初衷的。但无论如何，蜀汉希图统一天下的大业就此夭折了。

刘备去世以后，其子刘禅继位，改元建兴。诸葛亮执掌军国大事。时值蜀军新败，国弱兵疲，刘备身亡，人心恐慌。而且外有魏吴相伺，内有南中，（即今云、贵、川交界处）叛乱，正所谓“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诸葛亮面临危局，处置有方。他练士养民，不动干戈。对内采取抚安劝降的政策，希图和平解决南中叛乱；对外实行联吴抗魏的方针。遣使修复吴蜀联盟。蜀国的局势得到了稳定，国力逐步有所回升。

建兴三年（公元225年）春，诸葛亮决定南征平叛。他采取“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方针，降服了蛮族首领孟获，平定了南中地区，改善了民族关系。随着吴蜀联盟的恢复，内部统一的加强，经济力量的发展，诸葛亮开始作北伐的准备。“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

建兴四年（公元226年）夏，魏帝曹丕死。秋，孙权亲率大军围攻江夏，又遣诸葛瑾出兵襄阳。而魏新城太守孟达也有叛魏归蜀之意。诸葛亮认为时机已到，向刘禅上“出师表”。于建兴五年（公元227年）春，亲率大军进驻汉中，相机北伐。

建兴六年（公元228年）春，诸葛亮不用将军魏延奇兵出子午谷攻长安之策。命赵云、邓芝据其谷为疑军，与魏军曹真相

拒。诸葛亮自率大军出祁山，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响应降蜀，关中震动。后因马谡失利于街亭而退军。当年冬天，诸葛亮得知东吴陆逊领兵大破魏军曹休于石亭，魏军东下，关中虚弱后，上表说魏军“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遂即率军出散关，围陈仓，久攻不下，粮尽而退。

建兴七年（公元229年），孙权称帝。蜀国诸臣认为蜀汉是正统，要与吴国“绝其盟好”。诸葛亮力排众议分析得失指出：“若就其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于是遣使至吴庆贺并订立攻魏盟约。由此可见，联吴抗魏是诸葛亮一贯的指导思想。从蜀国方面看，荆州失去后，欲取中原，只能吴、蜀联盟，东西并举。当时蜀有诸葛、吴有陆逊，皆具谋略。若能联合攻魏，且以吴军为主力，尚有成功的希望。但一来双方虽是盟国，却各有猜忌疑虑。二来，诸葛亮以北伐中原为己任，而陆逊以稳保江东为其责；所以吴蜀两国空有“共交分天下”的盟约，可从未真正进行过有统一计划的联合作战。即使形成夹攻之势，吴军也是稍有失利便收兵罢战。因此诸葛亮只能以吴国作为“犄角之援”而满足。

后来诸葛亮又几度率军北伐，创制了木牛流马转运粮草，并“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其间虽有取胜之役，但始终未能击败魏军进入中原。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八月，诸葛亮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军中。

对于诸葛亮的北伐，后人评论不一，有“以攻为守”之说，有“疲师劳兵”之说，都有一定的道理。简要的说，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准备比较充足，同时魏国曹丕刚死，人心慌乱，而且外有东吴相攻，内有孟达反叛，正是所谓“天下有变”之时，诸葛亮如能迅速进兵，与孙权、孟达相呼应，并采用魏延兵分两路，直取长安的作战计划，形势可能会有转机。但蜀国后来的几次北伐都不具备应有的条件，一是魏蜀实力强弱悬殊；二是蜀攻

魏守，劳逸不同；三来魏国司马懿老成持重，深谙兵法，所以诸葛亮已尽心而为，却难以取胜。徒耗国力，无所成就，从战略全局看，是得不偿失的。明知无成功之望，仍要报“知遇之恩”，这正是诸葛亮的悲剧所在。《后出师表》是这个悲剧最清楚不过的自我解说。

## 查士丁尼一世

查士丁尼一世，生于公元 483 年，死于公元 565 年，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他在位期间，恢复了古罗马帝国的疆域，编订了《查士丁尼法典》，是拜占庭帝国中最有作为的皇帝。

公元 483 年，查士丁尼一世出身于马其顿的一个农家，他的叔父查士丁在君士坦丁堡担任禁卫军将领。查士丁尼一世在叔父的帮助下，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公元 518 年，查士丁一世被拥为拜占庭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帮助年事已高的叔父处理朝政。查士丁无嗣，收查士丁尼一世为养子，并授予要职。公元 525 年，查士丁尼一世获得恺撒称号，公元 527 年 4 月，称奥古斯都，与查士丁共执朝政。8 月，查士丁去世，查士丁尼一世在元老院及军队的支持下，顺利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开始独掌朝政。

查士丁尼一世精力旺盛，组织能力强，人们称他为“永不睡觉的帝王”。他的妻子提奥多拉是个美丽、聪明的女人，有着坚强的决断和勇气，在政治上给他以很大的帮助，曾经支持查士丁尼一世无情地镇压了尼卡起义，巩固了查士丁尼一世的统治。但是，查士丁尼一世的政治抱负和谋略更为深远，他把自己当成恺撒的继承人，一心想重振古罗马帝国的雄风，收复失去的土地。因此，他在位期间四处发动战争，相继消灭了汪达尔王国、东哥特王国，打败了西哥特人的法兰克人，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把地中海重新变为罗马帝国的内湖。

查士丁尼一世一生致力于自己的光复计划，在连年的征服战争中显示出他作为最高指挥者的才干和谋略。他刚刚登上帝位

时，拜占庭帝国东有宿敌波斯，北有野蛮的斯拉夫人，使得他不能集中力量征服西方。因此，查士丁尼一世要实现自己的计划，必须先解决后顾之忧。他的办法之一就是重金收买。这在当时社会是很行得通的。在拜占庭军队接连取得对波斯帝国的胜利后，他不仅花费大量的黄金贿赂波斯执政者，公元532年，终于以1.1万磅黄金买来了东方的暂时和平，同时又用重金收买斯拉夫人的酋长，以求得北部边疆的平静。稳定了东方和北方边境后，拜占庭帝国就可以全力征服西方了。这从军事谋略学上说，叫做集中全力攻其一点。查士丁尼一世开始着手实行自己的计划。

当时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许多新的民族国家。查士丁尼一世经过分析，选中了北非的汪达尔人作为自己的第一个目标。曾经朝气蓬勃，多次打败东罗马军队的汪达尔人，到了此时，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锐气。汪达尔王国的政权是各民族国家中最不牢固的，内外交困，防卫薄弱。但是这些在西罗马帝国旧址上建立国家的民族，一直对东罗马帝国抱有戒心，总是团结起来共同对付东罗马帝国。为了瓦解敌人的团结，迅速征服汪达尔人，查士丁尼一世巧妙地寻找了一个战争借口。

公元531年，汪达尔国王希尔德里克被他的侄子格里梅尔推翻，并遇到囚禁。希尔德里克曾经是查士丁尼一世的盟友，因此，查士丁尼一世写信给格里梅尔，要求立即释放原国王，恢复他的统治。这个要求被格里梅尔拒绝，查士丁尼一世便以此为借口，发动了征服北非的战争。西哥特人和东哥特人本想出兵援助汪达尔人，但是却被查士丁尼一世的战争借口所迷惑，他们错误地认为拜占庭帝国派出军队只是为了帮助希尔德里克恢复王位，讨伐格里梅尔，并不是为了恢复西罗马帝国在北非的领土而进行的征服战争，因此都中了查士丁尼的计谋，没有出兵援救。东哥特王国的摄政王太后埃玛拉森莎反而出于个人私怨（汪达尔人曾处死了她的姑母），还为拜占庭远征军提供西西里岛作为补给基地。

公元533年6月22日，拜占庭远征军共1.5万人，在拜占庭名将贝利萨留的率领下出发。8月，远征军在北非登陆，贝利萨留遵照查士丁尼一世的指示，声称只是讨伐格里梅尔一人，绝不是对汪达尔人民的征服，并利用当地部落与汪达尔贵族之间以及汪达尔贵族内部的各种矛盾，一举攻占汪达尔首都新迦太基。格里梅尔闻讯杀死了前国王希尔德里克。翌年三月，拜占庭军队占领汪达尔，俘虏格里梅尔，北非立即被并入拜占庭帝国的版图。查士丁尼一世为贝利萨留举行了隆重的凯旋仪式。

北非的征服使查士丁尼一世获得一个良好的补给基地。征服北非的战争，最初看来是一场非常冒险的赌博，在实际进程中却显得十分简单，这个轻易得来的胜利鼓舞着查士丁尼一世。公元535年，他提出要趁势夺回意大利和西西里岛，不久，便借口他的盟友——东哥特王国摄政王太后埃玛拉森莎，被她的外甥——新国王提阿达哈德囚禁并杀害，而向东哥特王国宣战。

查士丁尼一世先派遣一支3000人的军队侵入达尔马提亚，以吸引东哥特人的注意力。同时派出使臣，以提供“补助金”为诱饵，诱使法兰克人从北面侵扰东哥特王国。在声东击西的策略掩护下，查士丁尼一世命令贝利萨留率领一支1.2万人的远征军向西西里岛前进。贝利萨留出发时，查士丁尼一世告诉他，到达西西里岛以后，要说明只是“路过”，说这支军队是假道西西里岛开往迦太基去的。如果西西里岛不准备对他进行抵抗，那么贝利萨留就应该立即占领该岛，否则他应该不动声色，重新上船扬帆而去。查士丁尼一世的计谋又成功了，西西里岛上的各个城市把贝利萨留当成了保护者和解放者，于是拜占庭远征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西西里岛。与此同时，入侵达尔马提亚的军队却遭到惨败，查士丁尼一世立即派出援军，恢复北面的进攻，继续牵制东哥特人，使贝利萨留趁机从南面渡海侵入意大利。公元536年5月，拜占庭军队攻占了那布勒斯。东哥特人为了抵抗侵略，选举维梯基斯为国王。维梯基斯迅速结束了与法兰克人的战争，并

联合法兰克人和波斯人共同对付拜占庭帝国。但是在贝利萨留的打击下，维梯基斯被迫投降，接着，意大利的许多城市望风而降。公元562年，拜占庭帝国确立了对意大利的统治。

在征服意大利的同时，查士丁尼一世又趁西哥特王国内乱之机，派出远征军占领了西班牙的东南部。这时，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已经包括北非、达尔马提亚、意大利、西班牙南部、西西里岛、撒丁岛、科西嘉岛，再一次把地中海变为罗马人的内湖。

在征服战争中，查士丁尼一世显示了高超的谋略艺术，他总是力图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并善于利用时机发动战争，精心选择战争借口，因此频频得手，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查士丁尼一世在建立和巩固政权方面亦有很大的成就和很高的政治谋略思想。他继承叔父查士丁的帝位后，在大力扩充军队，镇压尼卡起义的同时，以其非凡的毅力改革和加强官僚机构。为了加强拜占庭帝国的统治，他专门设立一个委员会，系统地编纂罗马帝国的法律。公元529年编成《查士丁尼法典》十卷，以后又编成《法学汇纂》，内容包括历代法学家对法律的解释；《法理概要》（一译《法学总纲》），简明阐述了法学原理；《新法典》（一译《法令新编》），汇集了查士丁尼一世公元534年以来颁布的法令。这些法律文献统称《罗马民法汇编》（一译《民法大全》）。它是欧洲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完备的法典，对以后欧洲各国的法律有重大影响。但就查士丁尼一世当时的意图来说，无疑是为了加强其统治地位。在国内加强法治和对外极力扩张是他整个统御谋略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查士丁尼一世不愧为继恺撒之后，古罗马又一位伟大的谋略家。

## 房玄龄

房玄龄（公元579~648年），字乔，齐州临淄（今属山东淄博）人，自幼聪敏，博览群书，有惊人的洞察力。在隋初，一般人根据当时的太平景象，认为隋朝政权将会长期稳定；而他从隋帝“无功德”、诳骗百姓且皇族内部互相倾轧等情况得出结论：隋朝灭亡“可翘足而待”。他18岁时被推举为进士，授予骑尉；后任隰城尉。唐兵进关中，他归顺李世民，任秦王府记室参军，协助李世民统一中国，取得帝位。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任中书令，后任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并受诏重撰《晋书》，受封梁国公。他是唐初著名的政治家和谋略家，与杜如晦、魏征等同是李世民的重要助手。

隋炀帝继位后滥用民力，挥霍无度，驱使千百万农民建东都，修西苑，开运河，掘长堑，筑长城，通驰道。又数游江都和巡边，沿途各地常有几十万人迎送，极其奢华。还多次进攻高丽，人力物力耗损巨大，使“耕稼失时，田畴多荒”，水旱灾害不断。短短几年，隋朝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各种矛盾激化，农民起义此伏彼起。一些隋朝官吏也拥兵自重，伺机取隋而代之。义宁元年（公元617年）五月，太原留守李渊在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等辅佐下起兵反隋，挥师南下，沿汾水进军关中。

在李世民所部进抵渭水以北时，房玄龄从隰城（今山西汾阳西）赶来投靠李世民，当上了记室参军。随后，在唐军入据关中、建立唐朝及李世民挥军取河陇、北救晋阳、东定中原、攻取河北等统一战争中，房玄龄均“罄竭心力，知无不为”，给秦王李世民出谋划策。作战中，唐军每歼灭一部敌军，别人争着寻求

珍宝之物，房宝龄则总是先收揽各种人才，安置在幕府之中。发现有谋臣猛将，他便想方设法与之结交。因此，那些谋臣猛将均愿为李世民“尽其死力”；在用人问题上，他还常给李世民出主意。例如，杜如晦原是秦王府兵曹参军，不久迁陕州长史。房玄龄认为杜如晦人才当用，便向李世民建议说：“杜如晦，王佐人才。大王欲经营四方，非如晦不可。”李世民接受了这一建议，将杜如晦又调回秦王府。后来，杜如晦与房玄龄一起，跟从李世民东征西讨，参谋帷幄。“玄龄善谋，如晦能断”，二人配合默契，同心辅佐李世民，为唐朝统一中国立下巨大功勋。

李渊于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五月称帝后，封长子李建成成为太子、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四子李元吉为齐王。李建成忌妒李世民的才华和功绩，在李元吉的怂恿策动下，欲谋害李世民。李世民早已看出了他们的阴谋，因此派他的亲信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和车骑将军张亮出镇东部洛阳，以备一旦有变即东出洛阳。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的一天，李建成夜召李世民饮酒，将其灌醉。李世民“暴心痛，吐血数升”。李渊得知后敕李建成说：“秦王素不能饮，自今无得复夜饮。”并对李世民说：“道建大谋，削平海内，皆汝之功。吾欲立汝为嗣，汝固辞；且建成年长，为嗣日久，吾不忍夺也。观汝兄弟似不相容，同处京邑，必有纷竞，当迁汝还行台，居洛阳，自陕以东皆主之。”李建成得知此消息后与李元吉合谋认为，让李世民去洛阳等于放虎归山，“不可复制”，不如将其留在长安，“取之易矣”。因此，他们说服李渊放弃了原来的意见，仍留李世民在长安。后来，李建成、李元吉在后宫“日夜譖诉世民于上”。李渊竟然相信了，想给李世民治罪，但由于大臣反对而未得逞。李元吉密请杀李世民，李渊没有同意。

对李世民兄弟之间的尖锐矛盾情况，秦王府上下都知晓，但一时无计可施。秦王府考功郎中房玄龄对比部郎中孙无忌私下说：“现在太子、齐王与秦王之间的嫌隙已很深，一旦发生祸机，

不仅是秦王肝脑涂地，实际上也是社稷之忧。不如劝秦王像周公诛管叔、蔡叔那样杀掉太子和齐王，以安定家国。存亡之机，何不容发，正在今日！”长孙无忌深然此议，因而进言李世民。李世民还有些疑惑，即召房玄龄谋划。房玄龄说：“大王功盖天地，当承大业。现在你们兄弟之间的忧危关系，正是你除掉太子和齐王的天赐良机，愿大王勿疑。”此后，房玄龄又与、长孙无忌、杜如晦等一起多次劝李世民杀李建成和李元吉。李世民又征询了其他僚属的意见，才下定决心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发动“玄武门（长安皇宫北门）之变”，射杀李建成、李元吉。当年八月九日，李世民接替李渊当上了皇帝，论功行赏，以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为第一，封房玄龄为邢国公。

房玄龄于贞观三年（公元628年）当上了左仆射（宰相）。他处理政事尽心竭力，“惟恐一物失所”。他“用法宽平”，深受李世民信任。因此，李世民诏令他主持制订唐朝律令。他研究前朝的律令后认为：“旧法规定：兄弟分家各居时，有人受封，另外的兄弟不相及；而有人谋反，则另外的兄弟皆连坐死。孙子可以因袭祖父的官爵；而祖父犯罪，孙子则被流放。这些都不符合情理。”因此，他制定唐朝律令要“据礼论情”。他主持制定的唐律共500条，立刑名20等，其中笞刑5等，自10至于50；杖刑5等，自60至100；徒刑5等，自1年至3年，流（放）刑3等，白千里至于3千里；死刑2等，绞刑和斩首。这部唐律比隋律减死刑92条，减流刑71条，那些削烦去害、变重为轻的条目，多不胜数。他还主持制定唐令1590条；又统一规定了枷（械颈刑具）、杻（械手刑具）、钳（金属夹具）、鑊（锁具）、杖、笞等刑具的长短宽窄；还删节唐朝建立以来的皇帝诏令，定留700条，颁布执行。房玄龄的法制思想与李世民是相同的，所以他主持制定的律令，得到李世民的首肯。

房玄龄崇尚儒学，所以极力推崇孔子。李渊当皇帝时，国学

之中的庙堂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飨。房玄龄等建议停祭周公，以孔子为先圣，颜回配飨。李世民诏令执行。在房玄龄等倡导下，唐朝大收天下儒士，根据他们的学识，分别予以录用；还扩大各类学校招生。李世民多次亲自到国学听祭酒、博士讲授儒学。四方儒士纷纷负书而至长安。吐蕃、高昌、高丽、新罗等少数民族酋长也派子弟进长安入学。国学之内学生“几至万人”，“儒学之兴，古昔未有”。唐初形成这种教育兴旺的局面，是与房玄龄积极倡导分不开的。

唐太宗李世民晚年好大喜功，滥用民力。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朝鲜半岛上的高丽和百济联兵进攻唐朝的新罗。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李世民不听劝谏，下诏进攻高丽，分水陆两军进兵，水军由张亮率领，共4万3千人、战舰500余艘，陆路由李勋率领，近10万人。唐军进攻高丽受到顽强抵抗，损兵折将，不得不于当年十月撤兵。后来，李世民又改用轮番攻扰的办法，试图先疲惫高丽后大举进攻，结果也没有得到多少好处，反而激起邻国的不满，国内人民怨声载道。

房玄龄对李世民不恤民力征讨高丽早就有不同意见，但由于李世民独断专行丢掉了善于纳谏的好作风，且猜忌大臣，动辄杀人，所以他也不敢进谏。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房玄龄病情已十分严重，对他的儿子们说：“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无事，唯东征未已，群臣莫敢谏，吾知而不言，死有余责。”于是，他抱病上表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功名威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决一重囚，必令三复五奏，进素膳，止音乐，（那是因为）重人命也。今驱无罪之士卒（东征高丽），委之锋刃之下，使肝脑涂地，独不足悯乎！向使（如果）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他日能为中国患，除之可也。今无此三条而坐烦中国，内为前代雪耻（李世民东征高丽时称：‘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利，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

者小，所损者大乎！愿陛下许高丽自新，焚凌波之船，罢应募之众，自然华、夷庆赖，远肃迓安。”李世民见此表奏很受感动，说：“彼病笃如此，尚能忧我国家。”因此，他亲往房玄龄府上，“握手与诀，悲不自胜”。房玄龄去世后，李世民赐他为太尉、并州都督，谥名文昭。

## 长孙皇后

长孙皇后（公元600~636年），河南洛阳人，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结发妻子，13岁时嫁给李世民。唐高祖李渊登基后，册封她为秦王妃。当时，由于秦王李世民在统一中国的作战中不断建立卓越功勋，皇太子李建成对李世民的猜忌日益加深，同时李渊与李世民的矛盾也有发展。为弥合李渊父子裂痕，她尽力孝敬李渊及其嫔妃，为李世民在宫中树立威信，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时，她引导将士进入宫中，杀掉李建成。李世民对她很感激，即位后立她为皇后，她外柔内刚，在政治上特别是在反对外戚当权方面有坚定的主张。在贞观初期，她为李世民清明政治出了不少好主意，可以说是李世民的重要谋士之一。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死后，李世民称赞她“每能规谏，补朕之阙。今不复闻善言，是内失一良佐。”

长孙皇后作为内宫“总管”，对子女、对宫内其他人员教育、管束是比较严格的。有一次，皇太子的乳母遂安夫人对皇后说，东宫（太子宫）的器用设施太少，请给增加一些。皇后不许，说：“作为太子，怕的是德不立、名不扬，哪怕什么器用少呢！”皇后对宫内人员严而不苛。嫔妃以下患疾病时，她都亲自探视慰问，甚至把自己用的高级药膳拿给她们吃。太宗有时临时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回到后宫便迁怒于宫人。遇到这种情况，皇后表面上也作出发怒的样子，甚至将“得罪”太宗的宫人当着太宗的面囚禁起来。等太宗息怒之后，皇后再慢慢地向太宗申诉宫人无罪的道理，为宫人恢复名誉和自由。因此，宫中没有滥施刑罚的现象，人人都爱戴皇后，长孙皇后对与自己疏远的甚至有私怨的

人，从来也不想借机报复，总是从大局出发，不计私仇。她的异母兄长孙安业，好酒无赖。他们的父亲死后，长孙安业不仅不善待年纪尚幼的皇后及其同母兄长孙无忌，甚至还将他们赶到舅家。她并不介意其异母兄这种恶劣行为。她当上皇后之后还请太宗对长孙安业“厚加恩礼”。长孙安业官至监门将军，后来与李孝常、刘裕德谋反，太宗决定处其以极刑。皇后得知，叩头流涕为其请命，说：“安业之罪，万死无赦。然其不慈于妾，天下知之。今处以极刑，人必谓妾恃宠以报复其兄，岂不为圣朝之累乎！”太宗遂改变决定，将长孙安业流放于边远之地。

长孙皇后曾搜集古代妇女的善事，撰成《女则》10篇，并且写文章驳斥汉明帝马皇后关于不能抑制外戚参政，而应节制其车水马龙之侈的论点。她认为，马皇后的论调是开外戚乱政的祸源而防其末节。她曾对太宗说：“妾之本宗，以恩泽进位，无德而禄，易以取祸。欲保全其子孙永久，慎勿使其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则为幸矣。”她的同母兄长孙无忌与太宗李世民本是布衣之交，在帮助李世民统一中国及谋划“玄武门之变”使李世民得以即位等方面建有巨大功勋，是李世民的心腹和“佐命元勋”，常出入李世民卧内为之出谋划策。李世民登基后想任命长孙无忌掌握朝政，皇后“固言不可”，多次对李世民说：“妾既托身紫宫，尊重已极，实不愿兄弟子侄布列朝廷。汉之内戚吕氏、霍氏之祸，可谓切骨之戒。特愿圣朝勿以妾兄为宰相。”李世民不听，仍然任用长孙无忌为左武侯大将军、吏部尚书、右仆射。皇后又秘密遣人与长孙无忌商定，两人分别苦求逊职。李世民不得已才准许了他们的请求，改授长孙无忌为开府仪同三司。皇后这才感到放了心。后人评论长孙皇后不赞成内戚掌握权柄的策略思想时，认为这是“虑之深远”的。

长孙皇后所生长乐公主，太宗特别钟爱。在她将要出嫁的时候，太宗敕令有司，陪送长乐公主的物品要比陪送永嘉长公主（李渊之女、李世民之妹）的物品多一倍。魏征得知后谏曰：“皇

帝之姑姊为长公主，皇帝之女为公主。既有‘长’字，应高于公主。若陪送物品多于长公主，甚为不可。”他引用汉明帝封皇子的故事说：“昔汉朝明帝封皇子时说：‘我子岂得与先帝子封地相等！’皆令半于先帝子（给皇子的封地为给先帝子的封地的一半）。”太宗嘉纳其言，并转告皇后。皇后感叹地说：“妾亟闻陛下称重魏征，不知其情。今观其引礼义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曲承恩体，每言必先候颜色，不敢轻犯威严，况以人臣之疏远，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从。”皇后还遣使持钱四百缗、绢四百匹，以赐魏征，并传语于魏征说：“闻公正直，乃今见之，故以相赏。公宜常秉此心，勿转移也。”有一次，太宗上朝后回宫，怒气冲冲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皇后迷惑不解地问太宗要杀谁。太宗说：‘魏征经常在朝廷之上辱没我。’皇后退出宫寝，换上正式的朝服，立于宫廷之中。太宗惊问其故，皇后说：“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太宗听了很高兴，消除了对魏征的怨气。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太宗的重要谋臣房玄龄因受到太宗的指责而愤然请归故里。皇后当时已病重，得知此事后，对太宗说：“玄龄事陛下最久，小心谨慎，奇谋秘计，皆所预闻，竟无一言泄漏，非有大故，愿勿弃之。”太宗听从皇后劝告，即刻起用房玄龄。

长孙皇后是一个注重节约的人。她的服饰用品都是作为皇后所必需的，从来没有提出过个人的要求。她还是个遵守法度的人，从不因私枉法。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她跟从太宗到九成宫（在今陕西麟游西）休养，当时已染上疾病，仍坚持与太宗一起活动，因而病情日益加重。太子承乾见皇后病得实在太重了，对皇后说：“各种药都吃过了，尊体仍不见好。请奏启父皇，大赦天下囚徒，并请佛道士颂经祈求福助。”皇后说：“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长寿命，吾素来不为恶；若行善对延寿无效，又有何福可求？大赦是国之大事；佛道不过是异域之

教，与政体有弊无利。这些均是陛下所不为的，岂能因吾一妇人而乱天下大法？”太子不敢奏禀父皇，便将此想法告诉给左仆射房玄龄。房玄龄又转奏太宗；其他朝臣也建议实施大赦，太宗答应下来，皇后听说后马上向太宗固请不可大赦。太宗乃止。贞观十年六月，皇后病入膏肓，与太宗辞诀时，除请求不要重用外戚之外，还说：“妾生无益于人，不可以死害人。愿勿以殡葬劳费天下，且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见。自古圣贤皆崇俭薄。惟无道之世，墓葬大起山陵，劳费天下，为有识者笑。但请因山而葬，不须起坟，无用棺槨，所需器服，皆以木瓦。俭薄送终，则是不忘妾也。愿陛下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慝，省作役，止游畋，妾虽殁于九泉，诚无所恨。儿女辈不必令来，见其悲哀，徒乱人意。”太宗听后甚为感动。皇后死后，太宗尊其号为“文德顺圣皇后”，并在其墓前刻石为文，称：“皇后节俭，遗言薄葬，以为‘盗贼之心，只求珍货，既无珍货，复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复如此。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已有……。当使百世子孙奉以为法。”

## 狄仁杰

狄仁杰（公元630~700年），字怀英，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市）人。出身官宦家庭，祖狄孝绪，贞观年间任过尚书左丞，父狄知逊，曾任夔州长史。狄仁杰自幼好学，明经及第而入仕途。先任参军、法曹等地方官，后因为官正直，才华出众，被唐高宗赏识，擢升入朝为官，历任大理丞、侍御史、工部侍郎、尚书左丞、都督、侍中、中书令（宰相职）等。死后赠文昌右相，谥号“文惠”，追赠司空，追封梁国公。

狄仁杰是武则天称帝时期的著名宰相，我国唐代杰出的政治家之一。他智慧过人，才华出众，为官刚正，遇事果断，敢作敢为，且多谋划，出计为民，建策为国。他献策能服智慧聪颖、权谋超群的武则天，堪称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谋略家。

狄仁杰有奇才。但他的才华是经过自己的努力取得的。有三个小故事足以说明。其一，专心攻读。仁杰幼年时读书非常专心致志，亦很聪慧。有一次，他家有个人犯了公案，县吏到他家调查了解，家里的人都殷勤地出去迎接，惟仁杰坚坐读书，不闻不接。县吏责备他无礼，仁杰回答说：“书卷中的圣人甚多，我都忙不过应对，哪里还有空时间顾及偶然到来的俗吏，你又何必责怪我呢！”说得县吏哑口无言。其二，磨炼基层。仁杰明经及第后，在地方上任不起眼的小官时间很长，但他毫无怨言，刚直用事，磨炼自己。还曾遭人诬陷而坐牢。好在工部尚书阎立本明察秋毫，在审讯中不仅查明了他的冤情，还发现他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赞他说：“仲尼称观过知仁，君可谓沧海遗珠矣。”于是荐授他为并州都督府法曹。其时，仁杰家住河阳（今河南孟县），

在赴任路过太行山时，因怀念家人。伫立山头良久，对左右人说：“吾亲所居，在此云下。”“白云亲舍”这一成语由此而出，并成了游子们万古思亲的名言！其三，义感同僚。狄仁杰在并州任法曹时，同僚郑崇质接到命令出使边远绝域，此时其老母病，急需照顾。仁杰知其难，便主动向上司蔺仁基请求代郑出使。蔺当时正与司马李孝廉闹矛盾，见狄仁杰如此讲义气，自愧自己不如，乃主动找李谈和，他向李说了狄的义举后，感叹说：“吾等岂独无愧耶？”于是两人相好如初。

仪凤元年（公元676年），由于狄仁杰长期任职基层，政绩显著，被唐高宗任命为大理丞，是为六品的审判官，此时狄仁杰已四十七岁了，他到任之后，以其刚正不阿和卓越的才华，办案理狱，深得百姓的拥戴和高宗的赞叹。史载，他曾在一年之内断积案一万七千人，没有一个冤枉而申诉的。他执法严整，连皇帝交办的案件也要按法而行，决不徇私。

仪凤元年九月，左卫大将军权善才，误砍了昭陵一棵柏树，按律应处以免职，但高宗要狄判斩，狄再次面奏说罪不当死。高宗火了，变脸说：“善才斫陵上树，是使我不孝，必须杀之。”侍臣们都催狄仁杰赶快去执行。但狄毫不惧怕，他知道高宗是个心肠软，重德礼，能听善言的人，于是以其渊博的学识，论古比今连讽带捧，决心用自己的智慧说服高宗不要枉法。他说：“臣闻逆龙鳞，忤人主，自古以为难，臣愚以为不然。居桀、纣时则难，尧、舜时则易。臣今幸逢尧、舜，不惧比干之诛。昔汉文（帝）时有盗高庙玉环，张释之廷诤，罪止弃市（停止处死弃尸街头）。魏文（帝）将徙其人，辛毗引裾而谏，亦见纳用。且明主可以理夺，忠臣不可威惧。今陛下不下纳臣言，瞑目之后，羞见释之、辛毗于地下。……岂有犯非极刑，即令赐死！法既无常，则百姓何所措其手足！……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杀一将军，千载之后，谓陛下为何主？此臣所以不敢奉制杀善才，陷陛下于不道。”高宗越听越觉得是理，非常佩服仁杰的忠智，立即免去善

才的死罪。数日后，擢升狄仁杰为侍御史。

还有一件事，亦令高宗对狄仁杰的才华深表钦佩。有一次，高宗出幸汾阳宫（今山西静乐县），以狄仁杰为随使，途经炆女祠时，当地传出了妖言，说什么谁要是穿着华贵的衣服经过炆女祠，就要遭到大风雷电之灾。因此，并州长史李冲玄决定派数万民工另辟一条御道。狄仁杰深知这是妖言惑众，胡说八道。如果另开道路要浪费很多民力财力，还要耽误时间，于是他制止李冲玄说：“天子之行，千乘万骑，风伯清尘，雨师洒道，何炆女之害耶？”并照常通过。高宗知道了这件事，赞叹说：“真大丈夫也！”

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十二月，高宗病故，武则天把准备继位的太子李显贬出京城，让不中用的儿子李旦当傀儡皇帝，自己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揽权掌政。这时候，狄仁杰出任宁州（今甘肃宁县）刺史。宁州是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区，民族关系复杂，狄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做和睦团结工作，深得各族人民拥护，称他为狄使君，为其树立了德政碑，狄因政绩显著开始受到武则天的注意。

垂拱四年（公元688年），武则天任命狄仁杰出任豫州刺史。任内在处理原越王李贞（唐太宗子）兵变的善后事宜上与宰相张光辅发生矛盾。一是如何处理被迫跟随叛乱的六七百人及其连坐家属五千多人。张光辅认为都是叛逆者，统统杀掉。狄仁杰则认为他们是“诬误者”，是被迫胁从的，主张“缓其狱”。他为了把真实情况报给武则天，又不给张光辅等人留下为逆人申理的把柄，采取了上密表的办法。他在密表里说：“臣欲显奏，似为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存恤之旨。表成复毁，意不能定。此辈皆非本心，伏望哀其诬误。”武则天部分接受了他的意见，将这批人改判发配丰州（今内蒙河套西北）。二是张光辅是平李贞叛乱的元帅，自恃有功，纵将士抢掠百姓，要求狄多给俸禄给养，狄不同意。光辅怒道：“州将轻元帅耶？”狄仁杰不买他的

账，对曰：“乱河南者，一越王贞耳。今一贞死而万贞生。”光辅质其何意。仁杰慷慨陈词说：“明公董戎三十万，平一乱臣，不戢兵争，纵其暴横，无罪之人，肝脑涂地，此非万贞何耶？……公奈何纵邀功之人，杀归降之众，但恐冤声腾沸，上彻于天。如得尚方斩马剑加于君颈，虽死如归。”张光辅理屈不能对，但怀恨在心。还朝奏仁杰不逊，被贬官复州（今湖北沔阳）刺史。

其实，武则天对狄仁杰处理豫州的政策是赞许的，她出于权宜之计暂时贬仁杰的官。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登基称帝，狄仁杰即被任为宰相。当武则天告诉他：“你在豫州时，办了许多好事。可是有人谗毁你，你想知道谗毁你的人吗？”狄仁杰很聪明，他高风亮节地回答说：“陛下以臣为过，臣当改之；陛下明臣无过，臣之幸也。臣不知谮者，并为善友，臣请不知。”武则天感叹狄是一个奇异的人。

长寿元年（公元692年）正月，武承嗣（则天之侄儿）怨恨狄仁杰刚直，指使人诬告其谋反。武则天半信半疑把案子交由来俊臣审理，但吩咐一定要查明真相，不准动刑。

来俊臣是历史上著名的酷吏，是搞逼供的专家，他并不按武则天说的做，而是按他残酷用刑和诱供的老办法逼狄供认谋反罪。这后面自然有武承嗣的支持。

狄仁杰对来俊臣的为人了如指掌，决定以智谋对付他。来俊臣诱骗他说：“凡罪犯初审认罪的一律不处死刑。”狄仁杰明知是圈套，但他好汉不吃眼前亏，将计就计，痛快地认罪说：“大周革命，万物唯新，唐朝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来俊臣没有料到狄仁杰这样容易上当，竟满口招供，心中高兴，以为可结案交差，只等处死狄仁杰的时间了。于是将狄送回监中，放松了管束。狄仁杰利用看守不备，在被头上书写了申冤状，正寻思着怎样带出去，恰巧判官王德寿来找他，想诱骗狄在供词中牵连陷害自己的仇敌杨执柔，因为杨曾是狄的部下。狄灵机一动，以苦肉之计；不仅没做出丧天害理之事，反而骗得王为他捐出了申诉

状。

狄的申诉状很快到了武则天手上，她立即责问来俊臣为什么要用刑诱供，来当即否认，并说他对狄照顾得很好。武则天要派人去调查，来着了慌，马上让手下人注意安排好狄的衣饰吃住，并要王德寿伪造了一份狄的“谢死表”，上报武则天。武则天感到事有蹊跷，乃亲自召见狄仁杰。她问狄仁杰为什么要承认谋反。狄说：“那时，我如果不承认，早被他们屈打死了。”武又问为什么写“谢死表”，狄感到惊奇，回答说：“臣无此表”。武让侍者拿出来看，细辨是别人代写的。于是立即放出了狄仁杰。狄终于以智谋免死，但被贬官为彭泽令。

延载三年（公元696年）五月，营州（今辽宁锦州一带）地区的契丹族，因不堪边吏的虐待，起兵反抗，进军关内，围幽州（今北京市西），威逼冀州（今河北冀县、衡水地区），河北为之震动。在此危难之际，武则天起用狄仁杰为魏州（今河北大名）刺史。狄仁杰到任后，以其高深的谋划，果断地改变了前任刺史因害怕契丹入寇，尽驱百姓入城，死守防御的错误政策，而是让老百姓统统归田，加强农业生产，富民足库。他认为贼兵尚远，不能惊慌失措而误了生产；即便寇来，自当用兵当之，也不能只靠驱赶老百姓。由于他的富民防寇政策对头，契丹不敢入侵，并逐渐兵败退走。老百姓歌颂狄的功德，争相为之立碑纪念。不久，狄就被武则天召为鸾台侍郎，加银青光禄大夫，兼纳言，是为宰相。

狄仁杰为相后，政绩卓著，为武则天的统治出了许多好主意，其基本策略是和睦边陲，富民强国。为此，他曾上疏劝武则天不要迁老百姓到不毛的疏勒（今新疆疏勒地区）征伐戍边，指出穷兵黜武不是“固本安人之术”，主张委少数民族有威望的首领治理当地，宁边安内，“则国家有继绝之美，荒外无转输之役”，“省军费于远方，并甲兵于塞上，则恒、代（今山西大同、代县一带）之镇重，而边州之备实矣”。但他对边防的镇守也是

非常重视的，其策略是：“但当敕边兵谨守备，蓄锐以待敌，待其自至，然后击之，此李牧所以制匈奴也。当今所要者，莫若令边城警守备，远斥候，聚军实，蓄威武。以逸待劳，则战士力倍；以主御客，则我得其便；坚壁清野，则寇无所得”。接着他又建议武则天“废安东（今辽宁及朝鲜部分地区），复高氏为君长，停江南之转输，慰河北之劳弊，数年之后，可以安人富国”。

在赵、定（今河北赵县、定县地区）等州遭突厥入侵骚扰时，狄仁杰亲任元帅驱逐，接着又任安抚大使，负责处置河朔（今河北、山西一带）的善后工作。在突厥入侵时，当地不少人随从骚扰官府；突厥退后害怕受诛，逃匿在外，朝廷不少大臣主张严加追究，予以镇压。狄仁杰上疏表示不同意，并提出了自己的远见卓识，主张采取宽大政策，胁从不问，既往不咎，他详细地分析了当地人的性格和受胁迫的原因之后，指出：“人犹水也，壅之则为泉，疏之则为川，通塞随流，岂有常性。……今以负罪之伍，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潜窜山泽。赦之则出，不赦则狂……臣闻恃大国者不可以小道，理事广者不可以细分。人主恢弘，不拘常法，罪之则家情恐惧，恕之则反侧自安。”伏愿河曲诸州，一无所问。”武则天接受了他的高策，结果当地逃亡者很快回归，民心安定，官道畅通，百姓乐业。

狄仁杰的怀柔招抚策略，不仅稳定了内地人民，而且对周边的各少数民族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平定契丹、突厥等少数民族的入侵之后，对投降和俘虏的头面人物和将领，力劝则天排除众议，不计前罪，不予处死，还委以官职，对将功赎罪的，和汉族一样，赠赏封爵，结果许多少民族的首领和酋长，纷纷投唐归化，如李楷固、骆务整原都是契丹的首领，曾带兵侵唐，败后投降，狄奏请委以重任，两人后都立了战功，提升为大将军，李楷固还封爵燕国公。唐代是我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和大团结的典型时期。狄仁杰主张和执行的民族和睦政策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远谋复李唐。狄仁杰为相后的政绩和所作所为表明，他对武则天称帝和执行的政策是拥护的，因此对她也是忠心的。但作为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他却看到了武则天之后的问题。这一点他要比武则天头脑更清醒。他知道，在封建社会女人当皇帝是大逆不道的，只能是偶然现象。武则天之后谁来当皇帝是个关系国家命运的大问题。狄仁杰出于忧国忧民和正统思想，认定只有让李氏后代来继任，国家才能安定。而这个想法他又无法与武则天直说，因为武则天在继承人的问题上始终是犹豫不定的。因此，他只能以自己高超的谋略加以实现。历史证明，他的谋算和努力是成功的，李唐的恢复和唐之中兴，狄仁杰是有大功劳的。

## 李光弼

李光弼（公元708～764年），原籍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县），契丹人，其父楷洛，原为契丹酋长，唐武后时入朝，官拜左羽林大将军，封蓟郡公。李光弼自幼受父影响，通晓兵法，善于骑射。他为人坚毅果敢，不好嬉乐，富有良好的将帅素质。由左卫亲府左郎将，逐步进为河西节度使王忠嗣的府兵马使，深得王忠嗣的器重。后承袭父爵，率兵征吐蕃、吐谷浑；因功封为云麾将军。安史之乱暴发，得到郭子仪的赏识，保举为河东节度使，委以平定河北、收复东都的重任。

天宝十四年（公元775年）二月，李光弼担任着“分兵东进，先定河北”的使命，率领马步兵一万和太原弩手三千，东出井陘，直取常山郡（治所在今河北正定县）。真定（今河北正定）城中的三千团练士兵，见唐军已到，乘机起义，与李光弼里应外合，杀尽胡兵，捉获叛将安思义，开城出降。

李光弼决定将真定作为立脚点，先稳定这里的局势，再图进取。为了知彼知己，把握战机，他采取了“恤民善俘”的政策，对饱受叛军迫害的当地百姓，给予优厚的抚恤，使他们主动为唐军出力，探听叛军动静，及时报告。对叛将安思义晓以利害，允许他将功赎罪。安思义感激不杀之恩，便主动献策，对李光弼说：唐军远来，人马疲惫，难以应付强敌的突袭；胡人的骑兵虽然骠悍，却没有沉稳持重的素质，一旦受挫，即涣散斗志，那时自有全胜的希望；史思明在饶阳（今河北中南部），距此地二百余里，昨夜已发出告急文书，估计前锋骑兵明晨可至，大军也将随后赶来。李光弼根据他提供的这些情况，决定移军入城，做好

充分的防御准备，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后伺机出战。

李光弼在常山与史思明相持了四十多天，各自寻找战机。史思明为了扭转战局，派兵断绝了常山的粮道。真定城中战马草料将尽，李光弼决定到石邑取草。他派出五百辆粮车，用身着铠甲的士兵作车夫，命一千弩手随行护卫，结成方阵前进。沿路拦截的叛军，慑于弩箭的威力，始终不能得手。史思明又派人袭取石邑，结果也被张奉璋击退。李光弼为了打破僵局，确保常山不再得而复失，便派人向郭子仪求援。至德元年四月，李光弼与郭子仪合兵，回纥步骑兵共十余万，在九门城南，与史思明展开快战，史思明大败，收拾残部逃向赵郡，常山被彻底收复。

李、郭大军合兵攻克赵郡，史思明又窜入博陵（今河北蠡县南）。李光弼引兵围城，久攻未下。这时，唐玄宗听信宰相杨国忠的谗言，促令潼关守将哥舒翰舍关出战，以求速胜，结果使二十万官军遭到叛军伏击，哥舒翰战败被俘，举国震惊。都城长安失去了屏障，唐玄宗仓皇出宫，逃往成都。这一战略失误，使叛军得以长驱直入，所过之处，郡县不能挡其锋芒，纷纷献城请降。李光弼只得撤去博陵之围，率兵五千奔赴太原。

太原城中只有临时招募的团练士兵，总数不过万人，李光弼的精锐主力已随郭子仪去了朔方（今宁夏灵武西南），史思明见太原空虚，以为吃得开唾手可得，邀集十万大军，进攻太原，企图为入侵朔方打开缺口。太原城中人心惶恐，诸将建议加固城墙，以抵挡叛军。李光弼说，“太原城周长四十里，仓猝修筑谈何容易，何况敌人即将到来，我们不能没等见到敌人先疲劳自己。”他率领士兵和民夫在城外深挖堑壕，作为第一道御敌工事。并且命令军民就便在壕中取土，制土坯数十万块。叛军来到城下，在堑壕边受阻，李光弼以小股兵力在城外负责阻击，城中军民则用事先备好的土坯从容地修缮城墙，将薄弱之处一一加固。

李光弼命人制成发射巨石的人力“大炮”，每抛掷一次，总有数十名敌人被击毙。攻城的敌军死伤至十分之二三，不得不退

到“大炮”射程以外，严密防守。

史思明见抢攻不成，就派三千胡兵到山东运取攻城器械。这些人在回来的路上，遭到李光弼部将的截击，斩杀殆尽。在战斗的激烈时刻，李光弼将自己的办公和休息地点移至城楼，搭起简易军帐，虽然有时路过帅府，从不停留半步。

两军相持一个多月，史思明见太原城久攻不下，便想出一个声东击西之计，选精锐骑兵作为“游兵”，叮嘱他们说，“我们攻城北，你们就伺机偷袭城南；我攻城东，你们就去城西，发现破绽就猛烈进攻，一举拔城。”由于李光弼治军严明，令出如山，守城士兵不敢懈怠，即使在没有敌人攻城的战斗间隙，也从未放松戒备。史思明声东击西的企图，完全落空。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九月，史思明留其子史朝清守范阳，自率数万精兵进攻汴州，直取洛阳。李光弼对部下说：“敌人乘胜而来，其势凶猛，我们利在按兵不战，不利于速胜，洛阳不能固守，诸位有何高见？”有人认为应该继续后撤，凭潼关之险固守，挫敌锐气。李光弼说：“固守潼关，可能万无一失，但两军兵力相当，贵进忌退，寸土不让。现在无故弃地五百里，就会助长敌人的声势。不如移军河阳，与内地相呼应，进可攻，退可守，使敌人不敢西侵，取伸屈如意的猿臂之势。”有人质疑说：“洛阳是帝都，您怎么弃而不守呢？”李光弼说，“若想守住洛阳，则附近郡城必须派遣适当兵力，敢问诸位，哪个能守住这些城邑呢？”李光弼果断地作出决策，派人将官吏的眷属转移到潼关以西，并动员洛阳城中的百姓出城避敌，只给敌人留下一座空城。又命人将大量的油、铁等物资运入河阳，以备守城之用，李光弼亲率五百骑兵，为大部队殿后。这时史思明的小股先头部队已经到了洛阳城外的石桥附近。诸将请令说：“现在我们是洛阳向北绕行呢？还是直走石桥呢？”李光弼果断地说：“直走石桥！”天色渐暗，李光弼命士兵打起火把，缓速行军。由于队伍严整难犯，敌人只是远远地跟在后面，不敢逼近。

当夜，李光弼率军到了河阳。河阳城中，只有二万人马，所存粮草，也仅够十日食用。李光弼严格地检阅城中守备情况，合理地配置兵力，一切处理得井然有序。

史思明随后进入洛阳，这才发现是座空城，一个人、一粒米也没有留下。史思明一无所获，又怕李光弼随后掩袭，没敢进入皇宫，赶紧出城，将大军屯驻在白马寺以南，在河阳城南构筑月城，防御李光弼。

史思明有一千多匹良种骏马，每天不厌其烦地到河岸的浅滩上给战马洗澡。其目的是向李光弼炫耀实力，以瓦解城中守军的斗志。为了再教训史思明一次，李光弼想出了一条妙计，让人在军中选出五百匹母马，将它们的马驹关在城内，等到史思明的战马到了河边，把五百匹母马全部赶出城外，母马失去马驹，嘶鸣不已，史思明的战马都是公马，听到母马的叫声，纷纷浮水渡河，结果都被赶入河阳城中。

史思明弄巧成拙，反丢了一千匹良马，恼羞成怒。他见河阳城被两股河水分隔，中间有浮桥连通，便想出一条毒计，将数百艘战船列于河中，点燃前面的战船，顺流漂下，打算烧掉浮桥。李光弼用事先准备的数百条百尺长杆，根部安装巨木作支柱，杆头装上铁钗，将火船迎头叉住，顶在河心，火船无法前进，不一会便化为灰烬。然后如法炮制，后面的战船也被叉住，在桥上用“大炮”发射巨石，战船全被击沉。史思明的进攻又一次宣告失败。

史思明计计落空，只好再一次强行攻城。李光弼看到河阳城的浮桥仍显薄弱，决定亲自率兵驻守。为了争取时间，他对部将李抱玉说：“将军能为我固守南城，拖延两天时间吗？”李抱玉说：“过了期限怎么办？”李光弼说：“过期救兵不到，任凭你舍弃它。”李抱玉领命之后，引兵据守。当敌军进攻过于猛烈，城池危在旦夕时，李抱玉骗叛将说：“我们的粮草已尽，确实无力再战，请准许我们明天投降。”叛军喜出望外，收兵回营，等待

李抱玉投降。李抱玉利用这点时间，抓紧做好了守城准备，第二天一早又向叛军请战。叛军上当，怒不可遏，攻打城池更加猛烈。李抱玉在夜间安排了一支队伍，作为奇兵伏在城外，这时突然杀出，与城内里外夹攻，杀得叛军措手不及，死伤惨重，只得收拾残部退逃。

史思明在邙山击败李光弼后，乘胜进军，迅速占据十三州的地域，正欲西入潼关，直捣长安。李光弼受命后，匆匆上任，奔赴前敌。途中，监军使者因兵力太少，建议据守扬州，先图自保。李光弼说：“朝廷委我重任，我再退缩不前，朝廷还有什么希望？再说，敌人怎会知道我们人数多少？如若出其不意，敌军自然溃逃。”

李光弼派兵遣将，分路出击，终于一举收复东都洛阳。史朝义屡战屡败，走投无路，自缢而死。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终于结束了。然而朝中佞臣对平乱功臣的迫害也随之加剧。

唐肃宗的宠臣，骠骑大将军程元振，专揽朝政，因寸功未立，深感自卑，对有功战将极为忌恨，伺机加害。节度使来填在洛阳时，程元振私下请托，来填没有答应他的要求。等他做了宰相后，屡加谗害，唆使曾经投敌的节度使王仲升诬告来填通敌，致使来填被削官流放，赐死于途中，边将们为此恨之切齿，后来吐蕃兴兵犯境，程元振隐而不报，使肃宗狼狈出逃。朝廷下诏征集诸将时，李光弼等功臣担心被害，无人敢去勤王。肃宗逃到陕州，屯兵徐州的李光弼心有余悸，徘徊不前。待吐蕃被击败后，李光弼宁愿到江淮掌管粮运，始终不敢入朝。

李光弼治军严整，每一发号施令，诸将甚至不敢仰视，他每次作战，必先深思熟虑，定出计谋，然后才遣将发兵。他善于出奇制胜，往往以少数兵力，歼灭数倍于己之敌，当时被誉为“中兴第一将”，与郭子仪齐名。

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李光弼病逝，享年五十六岁。临终前，他将因功赏赐的绢帛分赠给部下，将士们得知李光弼的死

讯，纷纷把这些绢帛披在身上，向主帅致哀，人们从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三军的号哭声。代宗皇帝派使节前往吊唁，追赠李光弼太保的名誉官衔，赐谥号为“武穆”，以纪念和表彰他一生的功绩。

## 刘 晏

刘晏，（公元715~789年），字士安，曹州南华人。从小聪明好学，七岁即为神童，授予秘书省正字。长大后，先后任夏县令、杭陇华三州刺史、京兆尹、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等职。宝应二年，晋升为吏部尚书、平章事，领度支盐铁转运租庸使。此后大部分时间做经济工作，主要在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做转运租庸盐铁使。刘晏一生忠正，虽然“常袞见忌于前，杨炎致冤于后”，但在经济工作中“通拥滞，任才能，富其国而不苦于民，俭于家而利众”。他不仅是理财能手，而且身先士卒，“见一水不通，愿荷锺而先往；见一粒不运，愿负米而先趋”，为维系战乱中唐王朝的经济立下了汗马功劳，被历代誉为“富国名臣”。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政局动荡，连年战乱，经济十分困难。京城长安斗米至千，宫厨也是吃了上顿少下顿。老百姓更是贫困，靠拣捻麦穗活命。而朝廷仍然荒淫无度，开支十分庞大，使财政更加紧张。刘晏负责经济工作后，认为解决财政危机的根本办法是发展生产，并采取许多措施来发展生产。

开元天宝年间，天下户数上千万，由于战乱，十耗其九。到刘晏任职时，已不足二百万户。刘晏认为，人是生产的第一要素，要发展生产就要增加户数，并“使之耕耘织”。只有户数增加了，生产发展了，赋税的数量才能增加。当时各州县都让富人督营漕运、邮递等重要职务。这些人税外横取，使人民无法活命，只好外出逃亡，或去盗去抢。刘晏为了革除这种弊政，改由官员营漕运和邮递，并罢除一切苛捐杂税，使外逃的人回家耕

织。这样户数很快得到增加，生产得到了发展。

刘晏为了掌握全国的生产情况，在全国各地设置了知院官，命他们每十天半月把本道各州下雨、下雪、丰收、歉收等情况向京城报告一次。他尤其重视各地的灾情，采取了许多很好的救灾办法。在救灾时机上，如他认为“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急，善救灾者，不使至赈给”。也就是说不要等病危才治，灾重才救。如果灾重了再救济，国家给的钱粮少了，无济于事，给多了，负担不起，势必再向老百姓增收重税，造成恶性循环。另外，各地官吏在发放救济款物时，势必敲诈勒索，贪污受贿，“虽刀锯在前，不可禁也”。所以，各地有了灾情苗头，他就开始采取措施，等灾情发展了，救济措施已开始实行，人们不必再去逃难。在救灾的方法上，他也有其独到之处。他不是消极赐与，而是采取积极的交换方法，各取所长，以丰补歉。他认为灾区所缺少的主要是粮食；其他东西还是有的。所以，用低价把粮食卖给灾区人民，换取他们手中的杂货，并把这些杂货转卖到丰收的地方换取粮食。这样做，既减轻了财政负担，又救济了灾区百姓，还存储了三百万斛（每斛十斗）粮食。为朝廷立下了大功。

刘晏认为中国很大，虽然北方经常遭灾，但南方仍然富庶。要把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关键是要发展交通运输。当时由于主要运输工具是船，所以他十分重视漕运。他曾亲自沿黄河、通济渠、淮河直到长江进行考察，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并发动群众大规模清挖河道。他改变过去一条船从长江一直开到渭水的机械做法，根据各条河水力的不同，分段通航。他让长江上的船运到扬州，汴水上的船运到河阴，黄河的船运到渭水河口，渭水上的船运到太仓。沿河分段设立粮仓。这样不仅可以根据水的大小，制造大小不同的船，提高运输能力，也比较安全。过去船到黄河三门峡一带，因船小浪大，多数船翻人亡，刘晏便把十数条船连在一起，加上其它一些办法，无一船翻。刘晏这样做以后，尤其收复东都洛阳后，南北运输畅通，每年运粮四十万石，当第一批

粮食运到长安后，天子大喜，派卫士到东渭桥敲锣打鼓进行欢迎。自此，关中虽天旱遭灾，也不缺粮，物价不贵，搞活了全局。

刘晏认为，要搞好经济，增加收入，就必须掌握各地的经济情报，尤其是物价。为此，他在各地设道巡院，并在诸道巡院至京城之间，高价招募骑马骑得快的人传递情报。因此，四方物价之高低，即使最远的地方，四五日也能知道。由于刘晏较好地掌握了各地的经济情报，经济工作十分主动。他采取“丰则贵取，饥则贱与”的方法，在丰收地区粮价偏低时，用较高的价格买进粮食；在歉收地区粮价偏高时，用较低的价格把粮食卖出去，来调节物价。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朝廷获得大利，各地物价大体平稳，无甚贵甚贱之忧。有一次，京师盐价突然暴涨，他很快从扬州调了三万斛盐运往关中，使盐价很快恢复正常。一些偏远地方木材和山货很便宜，他便派人用合理的价格收购进来，然后转卖到其它地方，增加了财政收入。

刘晏还用官府食盐专卖法来控制盐价。他认为盐官吏设得多，就会增加财政负担，还会扰民，所以只在产盐地区设置盐官负责收购盐户煮出来的盐，然后加价卖给商人，任凭商人转销各地。其它地方的州县就不设盐官。那些离产盐地区远的地方，政府就把官盐运到那里，存贮起来，陆续卖给大家。有的地方没商人去，盐价上涨，就减价把盐卖给那里的百姓，以降低盐价。这种买卖当时叫“常平盐”。“常平盐”不仅使官府得到了卖盐所得的利润，还方便了老百姓。

为了搞好经济工作，保证财政收入，他对官员要求很严，坚持任人唯贤。他认为“士有爵禄，则名重于得，吏无荣进，则利重于名”。对检劾出纳等工作一律委任有才有进取精神的志士，官吏只办文书一类的公务。对亲戚朋友一概不用。所以当时负责经济工作的数百人都是“新进锐敏”，“所任者虽数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

刘晏虽然在经济工作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但在统治阶级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中，仍然免不了悲惨下场。德宗即位后，刘晏为尚书，杨炎为吏部侍郎，二人关系不太好。后杨炎因原宰相元载贬职而受到影响，刘晏参与了对他的处理。杨炎被起用为宰相后，怒追前事，要为元载报仇，将刘晏逐出京城，后又诬其参与谋反，于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将其杀害。刘晏家属连累者数十人。当抄其家时，发现家中只有“杂书两乘，米麦数斛而已”。贞元五年（公元789年），德宗才弄清刘晏有大功而无罪，并为其平了反，为其子封了官。

## 赵 普

赵普（公元922~992年），幽州蓟县（今北京西南）人。他是北宋开国元勋，宋太祖和宋太宗两朝的宰相。

赵普自幼性格深沉厚重，寡言少语，但工于心计。虽然读书不多，然而经意于吏事，有济世之才。他辅助君主在幕后出谋划策，参与制订的重要方针、政策一直影响着宋朝三百年的统治。

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后周世宗去世，由少妇符皇后佐年仅7岁的幼主柴宗训即位，新主年幼，不谙人事，皇后新册，不习国政，又无家臣鼎力相助，朝廷军政大权，旁落外臣手中。

当时赵匡胤执掌护卫皇帝之禁军，担任殿前都检点要职。建隆元年（公元960年）春，传契丹与北汉合兵南下寇犯，军情紧急，宰相范质仓促之间难辨军情真伪，便诏命赵匡胤率军北上迎敌。而兵行开封东北四十里之要道陈桥驿时，将士托故不行，将赵匡胤灌醉，然后以杏黄龙袍加身。按当时的法律，披龙袍即谋叛，赵匡胤在所谓“为六军所迫”之下，俨然以为顺军心而从众命，假惺惺地从后周幼主恭帝手里接过“禅位书”（自愿让位的诏书）而正式当了皇帝，建立了宋朝。

纵观陈桥兵变的全过程，计划周密，行动迅速，两天之内，便灭周建宋，此举如无赵普谋划决断，是不可能如此顺利的。赵匡胤虽有窥周室之心，夺位改元之机，如无此知心者鼎力相助，他绝不可能下定陈桥举事之决心。赵匡胤部下诸将，虽然愿意拥赵匡胤为帝，但这些人武勇有余，政治谋略不足。唯有赵普，当时担任赵匡胤掌书记的重要参谋，虽官职不高，但明察善断，处

事周密，他做了赵匡胤心中想做而又不便明言的事，他在陈桥兵变中起了智囊军师的特殊作用。

宋太祖赵匡胤代周以后面临的国内形势，依然是五代十国以来的武臣弄权局面。后周时的各镇节度使并未甘心顺从北宋政权。原后周旧臣昭义军节度使李筠，一向野心勃勃，早有谋反之心，他不甘拱手称臣，拒绝接受宋太祖加封的高官，于建隆元年（公元960年）4月，勾结北汉刘钧起兵反宋。

赵普认为，新朝初立，便有叛将举兵，此次出兵平叛，乃开国后的首次重大军事行动，只有迅速取胜，才能稳定国内政局。于是，他建议宋太祖亲征，自己也随驾前往。宋军军心振奋，作战勇猛，不久便攻陷泽州，李筠自焚而死，宋军班师还朝。

当时原后周淮南节度使李重进，也有谋反之心。他想与李筠联合，南北夹击宋军。宋太祖为防止二李合兵难以对付，便对李重进采取赐铁券（免死牌）以稳其心。李重进果然中计，宋太祖集中兵力，一举消灭了李筠。后来，李重进起兵反宋，宋太祖决定派石守信、王审琦等部，分兵征讨。

赵普认为，李筠才灭，李重进又起兵，足见原后周各镇节度使居心难测，现在又以后周故将攻后周之贵戚恐难速成，倘如四方效尤，联合起来进攻中原，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赵普力谏宋太祖再次御驾亲征，并提了一个建议：李重进凭借长江、淮河之险，缮修孤垒，但他外绝救援，内乏资源，应当尽快除之。宋太祖认为赵普说得有道理，于是亲征扬州，一举攻克，李重进兵败身亡。

赵普劝宋太祖亲征二李，扫除了内患，巩固了北宋政权。

赵匡胤当上了皇帝，但他对如何能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忧心忡忡，特别是“二李”起兵谋反之后，唯恐再有如“二李”效法“陈桥兵变”之举，于是，便召赵普问道：“我想使国家长治久安，你有什么可行的妙策没有？”赵普当即提出了“削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的对策。

赵匡胤认为赵普所言极是，不失为良策，遂于建隆二年（公元960年）三月，首先罢免了慕容延钊殿前都点检的职务，调离京师，到外地任节度使。并且，从此以后，此职不再授人。

赵普认为，宋太祖此举固然必要，但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因为石守信、王审琦等人，虽是拥护太祖为帝的旧属，建宋有功的大臣，但他们身居要职，拥兵自重，久后难免不生反叛之心。所以，赵普又以历史上武臣谋反的教训提醒宋太祖对石守信、王审琦等人，也不可不防，并建议应当尽快解决拥兵自重的将领问题。

宋太祖认为赵普的建议不无道理，但苦于无故削夺功臣兵权，恐众将不服。于是，赵普又为太祖献策，提出了一个既能削夺石守信等人的兵权，又便于启齿的借口。赵普说：“臣也不忧此辈叛乱，然而，细观数人，皆非统御之才，恐不能制服部属，万一军伍作孽，彼等亦不由自主。”

太祖赵匡胤认为，这倒是个令众人无可非议的理由。于是，一天晚朝之后，赵匡胤召石守信、王审琦等人饮酒叙旧情，酒过三巡，略带醉意之后，太祖对众将领吐露做皇帝的苦处，夜不能安，防范变乱，不及做臣下的高枕无忧，当石守信等表示誓死效忠时，太祖说：“假如你们的部下为求富贵而起事怎么办呢？一旦强迫你黄袍加身，尽管你不愿意这样做，难道还能由你自己作主吗？”太祖又说：“人生在世所重者不过多积金钱，多置田宅，为子孙后代建立永久之基业，然后多置歌妓美女，饮酒作乐以终天年，我这个皇帝与你们结为亲家，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难道不是更好吗？”

众将听罢，方知太祖的用心。第二天，石守信等人，便都上表请求辞职，交出兵权，到外地当节度使去了。

就这样，宋太祖赵匡胤根据赵普的计策，顺利地收回了兵权，了却了心中的一件大事。因赵普献策有功，晋赵普为枢密使、检校太保。

为了协助宋太祖彻底解决武臣专权弊端，改变从中央到地方因权力过于集中而各自为政的局面，赵普又提出尚文黜武、分权互制的主张。

赵普提出的这套方针，在宋朝初年起到了加强中央君主集权制，及其军、政、财、文权力分立，防止方镇跋扈与地方各省为政的重要作用。改变了五代十国时期武臣专权，政变频繁的局面，宋朝成为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但这套方针只是从防兵之变，防方镇之跋扈，防官员之损害君权为出发点，而主要不是去提高国力、军力，故使宋徒有军队一百二十万，官员二万余名，库存之钱财成堆，但一直对外屈服于辽、夏、金民族政权，对内不能消除官乱与民变，而处于深重的统治危机之中。

宋太祖在赵普的协助下，基本完成政治体制之后，于乾德二年（公元964年）罢免了后周的一些旧臣。因赵普政治谋略超人，再加上献策有功，被迁升为门下侍郎、宰相、集贤殿大学士。从此，赵普独居相位，掌管北宋朝政。赵普居相位之后，更加尽心尽力。宋太祖视之如左右手，事无大小，都要征求赵普的意见，然后再决断。有一天，太祖问赵普，用何计谋才能攻下太原，消灭北汉，赵普回答说：“太原抵挡着西、北两方面的敌人，如果先攻下太原，就得由我们独挡西、北二面之敌，不如暂且留下太原不打，等到消灭了其他各国以后再说，到那时，太原如同弹丸黑子之地，还能逃脱灭亡的命运吗？”这就是赵普的“先南后北”的襄赞决策。宋太祖听后，笑着说：“我的意思正是如此，刚才不过是试你而已。”

赵普初登宰相之位后，虽为朝廷竭尽全力，深受太祖恩宠，但因有敛财受贿，私运木材扩展府第，又有官员冒充赵普名义经商等问题，赵普子承宗竟然违反宰辅大臣间不得通婚的禁令，娶枢密使李崇矩之女为妻，这有架空皇权的危险。太祖听说后，对赵普极为不满，其后，翰林院学士卢多逊又趁机揭发赵普的短处，太祖大怒，于开宝六年（公元973年）罢去赵普宰相之职，

贬为河阳三城节度使。

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十月，太祖驾崩，其弟赵光（匡）义即位，即宋太宗，改元太平兴国，任参知政事卢多逊为宰相。

公元976年，赵普自河阳调回京师，任太子太保，曾多次遭到宰相卢多逊的谗言诋毁，不被朝廷重用。然而赵普很会利用皇室内部权力之争的矛盾，来为自己进身创造有利条件，以求东山再起。

早在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太祖赵匡胤和太宗赵光义的母亲昭宪杜太后临终前，召赵普入内承受遗命。太后对以后几代君主是这样安排的：

太祖百年之后，当传位于弟光义，光义再传位于弟廷美，廷美传位于侄德昭（太祖子）。

赵普作为一个谙于政权变故的大政治家，深知杜太后关于以后几代君主的安排完全是从赵宋王朝的安危着想，防止后周幼主即位，异姓兴王那样的事件发生，认为太后的这个安排，很有道理。但是，杜太后的这个遗旨，直接关系到皇室诸人的权力和命运。而自己又是太后遗命的唯一直接见证人，如果处理得好，会对自己有利；反之，轻则丢官，重则丧命，因此，他对太后的遗旨，采取根据形势灵活处理的态度。

早在辅佐太祖时期，赵普见太祖赵匡胤忠孝，不能违背母训，将来赵光义即位确定无疑，于是便有意与光义交厚。

现在太宗赵光义有欲违母之意。打算自己百年之后，君位传子不传弟，但有母后遗旨成命在先，弟廷美对皇位也极为关注。所以，要实现皇位传子之目的，必须费一番周折，需要有一个足智多谋的人鼎力相助。

赵普知道太宗此时心中所想，认为自己再度登上相位之机已到，便向太宗进言，说当年太后遗旨，为他亲手所写，并备述太后遗旨原文。当太宗问及廷美事时，赵普当即表示：“臣愿备位枢机，以察奸变。”又借机述说自己多年受宰相卢多逊压制之苦，

太宗见赵普情词恳切，又系前朝老臣，与己交厚，可以协助自己皇位传子的政治目的，便于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复授赵普司徒兼侍中，封为梁国公，重登首辅之位。

## 寇准

宋朝名相寇准，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生于公元961年，卒于公元1023年。其祖父寇延良，颇有才学，因遭唐末战乱，终生布衣。其父寇相，善书画，能诗文，后晋开运年间中进士第。寇准辅佐宋太宗、宋真宗两朝，以刚毅清正之风垂范后世，以拯时救世之才报效国家，是一位洞察密机、善断大事的良相。

寇准由于受书香门第的熏陶，自幼天资聪颖，好学上进。十九岁时就赴京应试，一举中第，开始了他几十年的政治生涯。

寇准性格正直、诚实。当时宋太祖殿试取人，常常到殿前平台上看着应试者提问，对年纪轻的人，常常不屑一顾。因此，有人让寇准增报年龄，他回答说：“我正准备踏上仕途，怎么能欺骗皇上呢？”他在任知县期间，对属下衙役要求严格，不准他们横行乡里，搜刮民财，鱼肉百姓，严格按照朝廷的明文规定征收赋税和徭役。为了防止属下不法之徒巧立名目，额外增收，以饱私囊，他令人把县中应当纳税、服役者的姓名、住址等项，写在纸上，张贴在城门中，公布于众。老百姓见寇准执法公正，为政清廉，体察民情，爱民如子，都深受感动。凡是应该缴纳赋税者，无不如数按时送交，从不拖延时日。

由于寇准为官期间政绩突出，有利于宋王朝政权的巩固，故受到宋太宗的信赖，连连升迁。当时，恰逢太宗下诏，让百官上书直言进谏，讨论国家大事。有一次，众卿都建议与辽国讲和，而寇准却大胆直言，反对讲和，并据理陈词，力排众议。宋太宗见寇准胆识过人，才干超群，因此对他尤为器重，拜寇准为枢密

院直学士。还有一次，寇准上朝奏事，因说话不合太宗心意，太宗大怒而起，欲退朝回宫。此时寇准并未因太宗发怒而罢谏，相反，却上前扯住太宗的衣角，让太宗坐下来，继续听他直言陈述，直到太宗同意他的意见，当即决断之后，才肯罢休。寇准这种为国计民生之大事，敢于在威怒之下的皇帝面前，不怕丢官，挽衣强谏的精神，与前朝名相魏征不相上下。所以，当太宗息怒之后，仔细想来，寇准能如此忠勇直谏，实属难得，对他颇为赞许。太宗对近臣说道：“朕得寇准，犹如唐太宗得魏征一样。”

在两次废立太子的重大事件中，寇准充分显示了他的足智多谋和善断大事的品质。一次是废楚王赵元佐太子。元佐是宋太宗的长子，由于营救太宗之弟赵廷美没有成功，得了心病，行为变得粗暴残忍。身边的人稍有过失，他就用残酷的刑罚处死。太宗多次训诫他，始终未见好转。重阳节那天，太宗设宴招待众王，元佐因病刚愈没有让他参加。到了半夜，为了发泄愤懑，元佐竟把妻妾关闭起来，纵火焚烧宫室。太宗因此大怒，意欲废掉元佐，另立太子。当时寇准在郢州做通判，太宗召见他问道：“你试着为朕决断一件事情，太子的所作所为太无王法了，日后必定有夏桀、商纣一样的行为，朕想废掉他，但东宫拥有兵甲，恐怕因此会闹出大乱子。此事如何是好？请您替我筹划一个万全之策。”寇准说：“请陛下找个机会，命太子代您主持某项典礼，他左右人员必定随行，然后陛下派人往东宫仔细搜查，果真有不法的事情，等太子回来拿给他看，把他废除。到时候只要一个太监的力量就够了。”太宗接受了寇准的计策，趁太子外出，派人从他的宫中果然搜出了许多刑具，有剜眼睛的、抽筋条的、割舌头的等等。在大量物证面前，元佐只好低头认罪，于是就顺理成章地被废黜了，没有发生任何风波。另一次是立襄王元侃。那是淳化五年（公元994年）的事。当时太宗已近暮年，为立太子事心烦意乱，坐卧不安，加上身患脚疾，疼痛难忍，真可谓心力交瘁，苦不堪言。此前，有冯拯等人上疏，请求早立太子，太宗盛

怒之下，把他们都贬到岭南去了。此后，再也没有人敢提及立太子的事。但太宗毕竟年事已高，立太子继承皇位想回避也回避不了。此时的太宗，亟需一个情投意合的人与他为伴，向他一吐衷肠，以求得心理平衡，并共同谋划另立太子之事。太宗想起了被他贬到青州的寇准，想起了他直言进谏、为国尽忠的种种好处，不免有所悔悟，怀念之情油然而生。于是下诏书召寇准回京。当太宗闻报寇准上殿进见时，便急忙宣入。待寇准参拜已毕，太宗先让他看看自己的脚病，随后赐坐，并问寇准：“爱卿为什么来得这样迟缓？”寇准回答：“臣不见您的诏书召还，是不敢擅回京师的。”太宗对寇准的回答并不介意，只想尽快听到寇准关于确立太子的意见，便马上转换话题。他问寇准道：“爱卿看我这些儿子当中，谁可以继承皇位呢？”寇准此时虽然心中有个人选，但不知太宗心中倾向于哪一个，因此不便直接回答太宗的问题。于是他只给太宗提出一个选立太子的原则。寇准回道：“陛下为天下人选择君主，与妇人、宦官商量，是不行的；与近臣商量，也不行；只要陛下您自己选择能符合天下人所期望的人，就可以了。”太宗听罢，低头思之良久，然后屏退左右，对寇准说：“你看襄王元侃可以吗？”其实寇准心中所想的也是襄王元侃，于是连忙说道：“知子莫如父。陛下既然认为可以，愿您当即决定。”立太子的事，君臣二人就这样决定了，太宗从此了却了一桩心事。

至道元年（公元995年）八月，宋太宗正式立襄王元侃为皇太子。当太子到宗庙参拜行礼回来，京城人民夹道观看，欢呼雀跃，有人说：“真是少年天子！”太宗得知后，心中甚是不悦，说道：“人心一下子都归了太子，那将把我摆在什么地位呢？”寇准怕太宗改变主意，便急中生智，立刻再拜并祝贺说：“太子众望所归，是陛下的决策英明，是国家百姓的洪福。”太宗听寇准如此一说，觉得自己在臣民心中的地位仍属于太子之上，便马上高兴起来。又入后宫，把此事说给皇后、嫔妃知晓，后宫的人又

都出来庆贺。太宗乘兴命人摆宴，与寇准共饮，待醉方休。

寇准主张执法公正，断案如鉴，反对徇情枉法，以权谋私。宋太宗淳化二年（公元991年）春，大旱无雨，又闹蝗灾，加上前一年火、蝗、旱三灾并发，所以引起了太宗的注意。他召集近臣进殿，询问他们处理朝政是否有不当之处，因而触怒了上天，大臣们都说这是天意如此，我朝朝政并没有什么错处。然而寇准却回答说：“《尚书·洪范》说，天人之间，互相感应，如影随形，如响随声；现在出现了大旱之灾，证明我朝施用刑罚有不公平的地方。”太宗听后不悦，转身退入宫中。过了一会，太宗又召见寇准，问他什么事情处理不公平。寇准说：“请召中书省与枢密院二府大臣前来，我就说。”于是太宗下诏，召二府大臣进入内宫。寇准说道：“前不久，祖吉、王淮皆因违法受贿而被治罪。但祖吉贪赃少却被杀了，而王淮因为是参知政事王沔的弟弟，虽然侵吞自己主管的国家财物多至千万，反而只受杖刑，又官复原职，难道这不是不公平吗？”太宗问王沔，此事是否如寇准所说，王沔无可辩驳，只好叩头谢罪。太宗又狠狠地斥责了王沔。

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七月，宋真宗任寇准为宰相。同年九月，辽军有小股游骑侵犯宋边境，作战稍有不利，就急忙引军退却，似无大举进兵与宋军交战之意。寇准接到此一军情报告，料定此为辽国兴兵南下大举侵犯的前兆，故立刻上奏真宗说：“辽军此举是想麻痹我们。我们应当加紧训练部队，任命将帅，并且要选派精锐部队占据军事要地，以防辽军大举进犯。”在寇准的建议下，宋军调兵遣将，严阵以待。

果然不出寇准所料，同年十一月，辽军大举南下。辽国萧太后、圣宗耶律隆绪御驾亲征，大将萧达揽率军二十万直进中原，军情十分危急，宋廷惊慌失措。一个晚上竟有探马飞报五封军情机密文书送达相府，而身为朝廷重臣的寇准却十分镇定，他对紧急军情文书连拆也不拆，照常饮酒，谈笑如常。第二天，有人将

此事奏报真宗，真宗大惊，责问寇准为何如此？寇准回答说：“陛下想了结此事，不出五天定见分晓。”真宗问寇准有何退兵良策。寇准提出要真宗御驾亲赴澶州（今河南濮阳）坐阵，这样必能克敌制胜。他认为皇帝大驾亲征，宋军必定团结和睦，士气高昂，军威振奋，而敌人自然会闻风落荒而逃。否则，宋军人心涣散，敌人乘胜而入，大宋天下难得太平。朝内群臣见寇准提出要真宗御驾亲征，感到事情重大，也怕随驾前往，因此个个胆战心惊，纷纷准备退朝，以免皇帝怪罪。寇准见群臣如此委缩退却，心中甚是不悦，便严辞厉声制止。真宗皇帝也感到十分为难，想要回到内宫，然后再议决此事。寇准一看真宗皇帝有不愿亲征之意，一旦回宫，这件事就难办了。就对真宗说：“陛下一进去，群臣就再难见到您，那就要误大事了。请您不要回宫。”真宗在寇准的强谏之下，万般无奈，只好同意讨论是否亲征事宜。

当时朝廷大臣对御驾亲征一事意见不一。寇准和毕士安等人，力谏真宗亲自率军征辽。而参知政事王钦若、大臣陈尧叟等人，则力劝真宗南迁避乱。王钦若是江南人，他主张真宗南迁金陵；陈尧叟是四川人，他力劝真宗驾幸成都。真宗一时拿不定主意，问寇准怎么办？寇准心知王钦若、陈尧叟都在为自己打算，他假装不知道，说：“谁个为陛下筹划如此下策，其罪当斩。陛下神明英武，将臣团结和睦，如果大驾亲征，敌人自然闻风丧胆。即使不亲征，我们出奇兵来挫败他们的阴谋，或者坚守来疲劳他们的士兵，持劳逸之势，我们也能稳操胜券。为什么要抛弃宗庙、社稷，去金陵、成都？”寇准这一番话。义正词严，合情合理，真宗亲征的主意才决定下来。

同年十二月，真宗亲率大军行至澶州南城，当时辽军气势正盛，众人都请真宗住下，以观察敌我形势，然后再决定进止。而寇准则坚决请求真宗继续前进。他说：“陛下如果不过黄河，则人心更加恐惧不安，不能壮我军威以压住敌人的气焰，乃至取得最后的胜利。况且，现在我军有王超率领的精锐部队驻扎中山，

扼杀咽喉要地；又有李继隆、石保吉分别领兵于两侧布成大阵，控制左右要冲；再加上各方援军陆续抵达，陛下为何还生疑虑而不敢前进呢？”寇准见自己陈说利害、促驾前行势单力薄，故退下找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商量。寇准问高琼说：“太尉深受国恩，今日何以报效国家？”高琼回答：“我是军人，愿以死殉国。”寇准很高兴，便把自己的想法说给高琼听，然后两人一起去见真宗。寇准说：“陛下对我的话不以为然，何不问问武将高琼的意见？”高琼立刻抬头上奏说：“寇准的意见是对的，望陛下采纳。”寇准不等真宗开口，又对高琼说：“机不可失，应催促皇帝马上出发。”高琼便命卫士备好车辇，于是真宗渡过了黄河，来到了澶州北城的门楼之上。远近的宋军望见帝辇的华盖，无不欢呼雀跃，军威大振，其声音数十里之外都能听见，而辽兵听到宋军的欢呼声，个个面面相觑，惊愕不已。

真宗到澶州后，委托寇准全权处理军务大事。寇准治军号令严明、处事果断、指挥有素。士卒既畏惧又心悦诚服。不久，辽军数千骑逼近城下，寇准命令士卒出击，斩杀活捉了一大半，扭转了被动局面。后来，辽军统帅萧挾凛亲临战场督战，宋军威虎军头张瑰守用床子弩，一箭射中挾凛前额，挾凛中箭身亡，辽兵只好退去。宋真宗回到行宫，留寇准在北城之上坐镇指挥。过些时候，派人去看寇准在干什么。但见寇准正在饮酒、下棋，歌声、戏谑声、欢呼声，不绝于耳。真宗得知后，高兴地对左右说：“寇准如此从容镇定，我还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

辽国损兵折将，损失惨重，无力再战，太后只好派使前来澶州，请求罢兵议和。辽国提出要宋朝把关南的土地让给它。宋真宗说：“辽国使臣所说割地一事，毫无道理。若只索要金银玉帛，对朝廷大体倒无甚伤害。”但寇准却不愿给辽国金银玉帛，而且还提出要辽国向宋朝称臣，并献上幽、蓟二州的土地。他向真宗献策说：“只有这样，才可保边境百年无事，否则数十年之后，戎狄又起贪心了。”真宗急于求和，对寇准说：“数十年后自然有

守土尽责之人，我不忍心百姓生灵涂炭，姑且按辽国提出的要求讲和算了。”并立即派曹利用前往辽方谈判。真宗对曹利用说：“实在不得已，就是百万钱也行。”寇准得知此消息后，召曹利用到帷幄之中，对他吩咐道：“虽有圣旨，但你答应辽国如超过三十万，我就砍你的头。”曹利用到了辽国，最终以白银十万两、丝绢二十万匹为代价与辽方达成和约而还。辽国派遣阁门使丁振带着盟誓条约来宋，以兄礼事奉宋真宗，引军回北方去了。这一次，寇准虽然未能彻底改变宋朝给辽国输送金银玉帛的结局，但却保住了宋朝的北方领土，并且使经济损失控制在一定的限度。

澶州之战，宋军大胜辽军，首功当归寇准。宋真宗对他特别厚爱，寇准也十分得意。但王钦若因当初请驾南迁一事，当众遭到寇准痛斥，故对寇准怀恨在心，总想借机谗言陷害寇准。一天，真宗召见群臣，寇准未等散朝先走一步，真宗目送着他离去，久久地看着他的背影。王钦若一看时机已到，便乘机进言说：“陛下如此尊敬寇准，那您看他是不是匡扶社稷之臣呢？”真宗说：“当然是了。”王钦若说：“澶州一战，陛下不以为耻，反而还把它当成寇准的功劳，这是为什么呢？”真宗不觉愕然惊诧，忙问其中缘故。王钦若说：“城下之盟，《春秋》以为奇耻大辱，而陛下为万乘之主，与虏订盟于城下，还有比这更耻辱的事吗？”真宗愀然不乐。王钦若又进谗言说：“陛下知道赌博吗？博者赌钱非输光不可，常常罄其所有以做抵押，这就叫‘孤注一掷’。陛下您成了寇准的‘孤注’了，这是很危险的呀！”真宗听了无耻小人的谗言，逐渐疏远寇准，罢了他的宰相之职，降为刑部尚书，外任陕州去了。

寇准，作为一名忠臣良将，才华出众，刚直果决，他有勇有谋，能为国家效力，有胆有识，能为百姓造福，堪称国家股肱之臣。但他终于没有逃脱忠臣遭谗、良辅被贬的厄运。除了遭王钦若的谗言，被贬陕州外，他又被自己的门下参知政事丁谓毁灭，连连被贬，最后死于雷州。丁谓起初对寇准十分恭谨，有一次，

寇准在中书省吃饭，胡须沾上了汤羹，丁谓看到后，赶紧站起来给他轻轻擦拂，寇准笑着说：“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邪！”丁谓甚为惭愧。后来，寇准对宋真宗说：“丁谓是个谗佞之人，不可以让他辅佐少主。”宋真宗听纳了。此事本来别人都不知道，但寇准自己有一次喝醉酒泄漏了出去，让丁谓听到了，于是丁谓竭力罗织罪名，挑拨是非，不断向皇帝进谗言，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结果，寇准被罢相后，又相继三黜，再不得复起。

寇准于贫病交加、心情抑郁中去世后，宋仁宗调任他为衡州司马的诏书才下到雷州贬所，可惜寇准再难从命赴任。其妻宋氏请求将寇准尸骨归葬洛阳，宋仁宗准奏。在寇准灵车北归洛阳的路上，沿途官府百姓都设祭哭拜，并在路旁遍插竹枝，上面悬挂着纸钱。一个月之后，插在路旁的竹枝上都生出新笋，百姓纷纷议论，寇公之死，感天动地，插竹生笋，乃是寇公高风亮节感化上天所致。为此，百姓又为寇公修祠筑庙，并年年按时祭奠。